

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  
文化運動叢書

# 中國戰時學術

孫本文等編著  
正中書局印行

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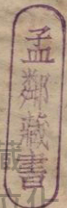
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  
文化運動叢書第八種

中國戰時

孫本文等

國家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 序

在一般人的想像裏，我國抗戰了七八年，因交通的阻塞，印刷的困難，國外資料的難於獲得，學術上必將退步，然事實恰與此相反，我們有見及此，特約全國專家學者將學術上的各部門作一總檢討，其結果使我們意外地興奮，我國的各種學術，不但沒有退步，而且有着長足的進步，較之數十年來的學術進展有過之無不及。謝幼偉先生在檢討七年來之哲學後說：「我們不要以為這七年來的抗戰把中國哲學的進展阻礙了，實際上，這七年來的中國哲學，比起中國任何一時期來講，都不算是退步。相反的，作者可以很自信的說，中國哲學是進步了。這七年的抗戰，可以說是中國哲學的新生。」郝景盛先生檢討自然科學的結果說：「在這七年中，我們的科學家，爲了國家之富強，民族之生存，社會之建設，真是個個都能守着崗位，埋頭苦幹，無論生活環境困苦到何等地步，仍按步就班，在那裏努

力工作。所以這七年間科學進步與貢獻，比起過去三十年來，在實在量皆有增無減」。盧于道先生關於科學的成就更具體地說：「在近二三年來，一方面由於國際及國內之助力，又一方面由於時代關係，略有進展。在古生物學界有陸豐龍及原始哺乳類動物之發現，在植物學界有橡膠植物（薛荔）之發現，昆明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製造各種鏡頭，皆是聲大者；至於內地礦產之發現，雖開採有待，對於國家皆為抗戰期中之重要科學收穫。在醫藥方面，嘉定一帶瘧疾流行，今聞同濟醫學院杜公振教授已獲得治療方法，若然，這也是重要貢獻。至於工礦界近年來大小發明有三百起，在將來工業發達後，未必每件發明都有價值，但亦不失為今日科學界的一番努力。」至如在社會學，政治學，教育學，法律學，經濟學，地理學，心理學，史學與文學沒有一種學術不在進步。我們祇要詳閱各專家學者的報告，就可瞭然。

需要為學術之母，中國這七年來固然在被封鎖的現狀之下，而仍能繼續發展者，就由於需要。孫本文先生說：「抗戰以來，全國社會學者幾乎全數來到後方從事於教學或實際

工作。雖則戰時圖書設備略感欠缺，而同人研究精神並不稍受影響。且因戰時關係，多數學者除從事於學理研究外，更能對抗戰建國的理論與實際問題，作多方面的檢討。故七八年來，全國社會學界顯然表示一種新的趨向：就是大家注意於社會學應用的研究，尤其社會問題，社會事業，社會行政與社會建設的研究。」瞿菊農先生對近七年來教育之進步也有同樣的意見說：「七八年來的抗戰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的大事。在這七八年中，中國社會結構與生活方式正在加速的變動。在此變動之中，各部門的學術研究都不能不因需要之不同，條件的變換而受影響。教育學是與人生關係最密切的學科之一，亦不能不受此種大變動的影響。當此種動盪的時代，教育學不得不一面適應當時的要求，為實際的設施求得理論的學術的基礎，為實際上發生的問題推求解決，一面更要對過去與現在有批評的檢討，重新估定其價值。」我國其他戰時學術的進步，莫不因這「實際的需要」而來。以大體論，中國的戰時學術可以說達到了蔣主席在「中國之命運」裏所指示的「務使學術切於人生的日用，文化歸本於建國的基礎」的目的。

我國戰時學術在進步，且這進步由國家民族的需要，這是我國學術的轉捩點，這轉捩點將為中國新學術的基石，所以我們很榮幸的將這部「中國戰時學術」一書貢獻給讀者。不過因各專家學者分散各地，約稿密時，又因印刷困難，以致出版時間上不免延遲。好在本書內容並無時間限制，這是要請讀者原諒的。

張道藩序於渝

# 目次

- 抗戰七年來之哲學.....謝幼偉（一）
- 七年來的中國抗戰文學.....王平陵（一九）
- 抗戰七年來的教育學.....瞿菊農（三七）
- 七年來的社會學.....孫本文（六四）
- 七年來之政治學.....程仰之（七七）
- 抗戰七年來之法律學.....陳盛清（九〇）
- 抗戰七年來之經濟學.....夏歲德（一〇七）
- 抗戰以來中國史學之趨向.....徐名璠（一二二）
- 抗戰七年來我國的地理學界及其出版物.....陳獨行（一三五）
- 抗戰以來的心理學.....蕭孝臻（一四七）

目次

抗戰七年來之科學界

盧千道（一六五）

抗戰七年來之科學

鄭景盛（一八一）





## 抗戰七年來之哲學

謝幼偉

在烽火滿天，四郊多虞之際來談哲學，這是中國哲人的常事，也是中國哲人的本色。王陽明在討賊剿匪的時候，並不停止他的講學，反而，他似乎還講得更起勁。普通人也許以為哲學的思索，必在四顧寂寥，萬籟無聲的環境內，方能產生；但中國哲人則以為「境寂我寂，已落一層」。必境不寂，而我能寂，才算顯出了哲人的本領。所以作者提起筆來談「抗戰七年來之哲學」，並不算希奇。我們不要以為這七年來的抗戰，已把中國哲學的進展阻礙了。實際上，這七年來的中國哲學，比起中國任何一時期來講，都不算是退步。相反的，作者可以很自信的說，中國哲學是進步了。這七年來的抗戰，可以說是中國哲學的新生。

我說，「這七年來的抗戰，可以說是中國哲學的新生。」也許有人會懷疑作者這一句話。有人會認為作者這一句話，未免過於誇張。但假如我們明瞭中國哲學的過去，明瞭中

國哲學的傳統，同時又能把這七年來中國哲學界的主要譯著，細心理會一番，我想他或可以同情作者這一句話。所以作者本文的任務，一方面在把中國哲學的過去，略加說明看其優點何在？及缺點何在？另一方面才把這七年來中國哲學上的重要著作，提出介紹，而指明其進步之所在。這樣去把中國哲學的過去和現在對比一下，即能顯示作者這一句話是有根據的。

談到中國哲學的過去，這當然不是三言兩語所能說明。但作者的目的並不是要把中國哲學的過去作詳盡的論究，而是要把中國哲學的過去所表現的主要特徵作概括的敘述。這樣便有簡略的可能。

中國哲學的過去，其主要特徵，作者認為第一在重體驗或重力行的精神。中國哲學家從不把文字語言當作哲學，至低限度，中國哲學家決不認為寫了幾本哲學書，即算盡了哲學之能事。孔子即主張無言之教，所以他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則為哲人者，又何必多言呢？孟子也是一樣。有人說孟

子好辯，孟子即回答說：「子豈好辯哉！子不得已也」。因此，他們縱有所言，縱有所寫，他們都是不得已的，決不是認為他們的哲學，即在文字語言上。他們都可以說是拿他們的生平和人格來代表他的哲學，來實現他們的哲學。他們的哲學都是從體驗，從力行而獲得的。孔孟這種重體驗，重力行的精神，歷代哲人，皆繼承而勿失。例如，以宋明的理學家而論，他們的著作，似乎很多，可是他們的著作却大部分是以語錄和書札為主，這可以證明他們的著作，都不是有意的，也都是不得已的。他們講哲學，一方面要自己體驗，要自己力行，一方面也要他人體驗，要他人力行。哲學的終極目的，自中國哲人看來，全在養成我們自身以及他人的人格，而上躋於聖賢的領域。哲學不能達此目的，則這種哲學是浪費的。這種態度，這種精神，和西洋哲學比起來，可謂恰恰相反。西洋哲學是重文字，重理論的。作者可以引一段現代英哲柏烈得萊(F. H. Bradley)的話來加以證實。柏氏說：「一切哲學的任務，是在「理解存在」，而道德哲學的任務，則在理解存在的道德，不是去製造道德，或指示方針去製造道德。像這種設想（按即製造道德的設想），簡直是可笑。

一般的哲學不是在預期各種科學的發明，也不是在預期歷史的進化。如宗教哲學，不是在創造新宗教，或宣傳舊宗教，而只是去理解宗教的意識。如美學，不是要產生美術的作品，而是在將所發現的美加以理論化。如政治哲學不是要參加對於國家的陰謀，而是在理解國家。一樣的，倫理學也不是要造成世間為道德的，而是在將世間流行的道德構成爲理論。〔見所著：倫理學研究，原書二版一九三頁〕換句話說，一切哲學都是理論的，而不是實踐的。試問中國過去的哲人曾贊成這種主張嗎？他們會說，或敢說，他們的倫理學，「不是要造成世間為道德的」嗎？這是中西哲學的根本差異處也是中國哲學的唯一優點。

中國哲學的過去，作者認爲第二種主要特徵是在其方法。中國哲學的方法是直覺，也可以說是武斷的。中國哲學缺乏一種思辯的精神。缺乏一種邏輯的訓練。過去中國哲人對於他們所提出的主張，很少用理論去加以證明，也即是很少提出他們的理由來說明他們的主張。他們只是武斷的肯定他們的主張。例如，易經上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但爲什麼天行是健呢。下面就沒有說出理由。又如孔子說，「逝者如斯夫，不捨晷夜。」

「這是對於宇宙日新，刻刻變化的主張，但也沒有說出其所以然來。即在宋明儒者，依然沒有拋棄這種態度。周子太極圖說，開口就說，「無極而太極」。然爲什麼是無極而太極呢？無極和太極的論證在那裏呢？我們也找不到。所以，中國哲學差不多可以說，只是一套武斷肯定的言論，而沒有或絕少，理論上的證據。他們的哲學，恃他們的直覺。可是直覺不一定可靠，也是常常不一致的。有時的直覺如此，有時的直覺又如彼。結果他們的言論便極不一致，往往自相矛盾而不知。他們對於思想系統的完整，對於理論的嚴密，對於分析的精細，都不十分注意。隨他們的興之所之，東說一句，西說一句。有時說雖說對了，却沒有說出理由來。這是直覺法的缺點。恃直覺，而沒有邏輯的控制，作者認爲是不夠足的，有時且是危險的。因一人有一人的直覺，若我直覺得是這樣，而他人直覺得是那樣時，不特邏輯，便沒有方法去批評他，而他人也不會心服的。明代王學末流的放蕩，主要原因可以說就是恃直覺所造成。因此，我們不能不說，這一特徵乃是中國哲學的缺點。

第三種中國哲學的主要特徵，作者認爲還是在它的態度。中國過去哲學的態度是一種

宗教的態度。這話我想有不少人會加以否認，會認為在中國傳統思想上根本就沒有宗教這一回事。中國營學家自始就對於宗教不感興趣。如何能說中國營學家的態度是宗教的態度呢？但作者的意見是，不管中國傳統思想上有沒有宗教這一回事，也不管中國營學家對於宗教有沒有興趣，可是中國營學家的態度始終是宗教的。這話自然須加說明，方能使人信服。作者所謂宗教的態度，是指一種衝道的態度而言，指一種「言必稱堯舜」的態度而言。宗教家對於他們的教主是絕對尊敬的，對於教主所說的一切是絕對不懷疑的。因此宗教家對於他們的經典和教義，只有注釋，只有說明，只有發揮，而決不許批評或反對。有時宗教家縱具有個人獨創的見解，明白和教義不同，但他總不敢說明是他們自己的見解，反而必引經據典，以自行表明他的見解是得自經典和教義的。他們不這麼做時，他們即會有「異端邪說，離經判道」的罪名。他們每一人都是以衝道者自居，都是根據經典和教義去發表自己的見解和批評他人的見解。這就是宗教的態度。明白了這點，便不難看出過去中國營人的態度是不是宗教的。這種態度可以說是即自孔孟開其端，而秦漢以後為最甚。孔

孟之言必稱先王，法堯舜，就是這種態度。明明是自己的「道」，而必說是先王之道，明明是自己的話，而必說是堯舜文武周公之言，這不是宗教態度是什麼呢？至漢注唐疏，專以解釋經典爲事的，更不必說。到了宋明理學家，他們本來有不少是自己的見解，可是他們也不敢說是他們自己的見解，而必託諸四書，託諸孔孟。他們彼此間的互相批評，也不是就各人見解，本身的正確與否來判斷，而只說，你的話不是聖人之言，或他的話不是聖人之言。甚而，他們明明對外來的佛教，已有所採納，却不惟不肯承認，反扳起面孔來「阿佛罵祖」，去作其衛道的工作。這不顯然是宗教家的態度嗎？作者並不是認爲宗教態度完全不對，但自哲學來說，這總是一種缺點。

總括的來說，中國哲學的過去，其精神是力行的，其方法是直覺的，其態度是宗教的。這其間有優點，也有缺點。現在我們可以轉而看看這抗戰七年來的哲學，究竟有沒有保存過去哲學的優點或改正其缺點。這樣就可以知道這七年來的哲學，究竟有沒有進步，或可不可以算是新生。

抗戰七年來，中國哲學上最值得注意的一件事，就是二十八年三月十五日蔣主席的一篇演講。這演講名叫做「行的道理」或「行的哲學」。這是一篇極重要的演講。這是抓住了中國哲學的精神而提出加以發揮的演講。這篇演講，主張以力行爲哲學的中心。認爲「人生自少至老，在宇宙中間，沒有一天可脫離『行』的範圍，可以說人是在『行』的中間而充實了人格，而提高了人格，一切聖賢豪傑，革命志士，因爲有目的，有決心的去行，所以能達到他們的志願，完成最高尚的人格」。然什麼是行呢？「所謂行祇是天地間自然之理，是人生本然的天性，也就是我所說的『實行良知』。易經上『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話，就是這種哲學的根據。因爲天體是運行不息的，而人和天，並非異物，天的本性，即是人的本性，所以人當法天而力行不息。一個人若認識了自己的本性，他便能行乎其不得不行，以行去實現他的人生。惟行才能認識宇宙，亦惟行才能實現人生。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孫總理的知難行易說，都是認識了這點才提出來的學說。他們的意思都是要叫人去力行。」蔣主席提倡力行哲學，可謂有根據，有淵源，而決不是杜撰的。



蔣主席「行的道理」發表之後，國內哲人起而參加討論的自然不少。但其中最具有價值的一本書，對力行哲學確有認識，確有發揮的，實為賀麟先生所著的「知難行易說與知行合一說」。這部書係去年十二月青年書店出版的。國內學者對於這一部書似乎還沒有十分注意。實際上，這是研究力行哲學的最好一部書。賀先生從純哲學的立場，把知難行易說和知行合一說，加以一番理論上的證明和闡發。他指明前說不惟和後說沒有衝突，而且前說實是後說的一種新看法，且有所補充的。他認為孫總理也可承認知行合一，但「他要達到的知行合一，顯然不是道德修養上的王陽明式的當下直覺的知行合一。他雖說反對兼理論家實行家於一身的不知分工的辦法，但他決不會反對求知行合一的努力，決不反對致良知」。結末，賀先生乃提出蔣主席的力行哲學，而加以解釋。他認為「蔣先生的行的哲學，乃是於王陽明的哲學，及中山先生知難行易說，灼然見到其實澈契合處，加以融會發揮而來。」他重指出蔣主席之所謂行，在知識論上來說，是包括知在內的。「換言之，行乃知行合一之行，非離開知而獨立之行，非盲目冥行之行。」在本體論上來說，「

則行是經常的，必然的，自發的，不息的，無有不善的本體或實在。」行既爲一種本體或實在，則這種本體是怎樣一種本體呢？賀先生認爲這是體用合一的，知行合一的，動靜合一的本體。行是本體也是工夫，是動，也是靜，雖是行，也包括知。我們可以說，行是無所不包的。卽誠和仁，也與行結合爲一體。「仁誠行在 蔣先生思想中是三位一體的東西。當他說行時，已包含誠和仁在內。不仁不誠之行，乃虛妄不實之盲動，決不能說是行，亦決不能說是有善無惡，經常不息，必然自發之行。就行之直純專一，永不退轉而言，便謂之誠；就行之生生不已，爲生而行，爲救人而行，爲增進人類全體之生活，爲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而言，便謂之仁。仁也，誠也，行也，其實一也。亦可謂爲同一本體之不同的說法，不同的方面而已。」我們看賀先生這種解釋，可謂得到了力行哲學的真意，對於力行哲學之提倡是有莫大的裨益的。力行是中國哲學的精神，也是中國哲學的優點，他們兩人的著作是把這優點保存了，或至低限度，是在力謀保存這優點的。

抗戰七年來的中國哲學，我們已見其自有保存中國哲學的優點的趨勢。但是有沒有改

正中國哲學的缺點的趨勢呢？作者認為是有的，而且表現着蓬勃的氣象，很值得我們樂觀。這七年來中國哲學上的著作，在量的方面來講，雖不算多，但在質的方面來講，則遠非抗戰前所能望其項背。我們知道，一切的著作都是重質不重量的，尤其是哲學的著作，更要拿質來決定。英哲亞歷山大（S. Alexander）嘗說：「一兩的獨創見解，勝過一噸的人云亦云的見解。」哲學者有所創獲，無所創獲，雖多亦不足貴。抗戰前的中國哲學，似乎很少有見解新穎的著作，可是抗戰後，便極為不同。抗戰後的哲學著作，不論在那一方面，都顯示特殊的色彩。這些著作總有某一點是和前人不同的，總有其可以永久存在的價值的。在這些著作中，作者認為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一為熊十力先生的「新唯識論，語體文本」，（全書已於本年三月在商務印書館出版）一為賀麟先生的「近代唯心論簡釋」，（三十二年獨立出版社出版）一為章士釗先生的「邏輯指要」，（三十二年時代精神社出版）。其次，如馮友蘭先生的「新理學」，（廿八年商務印書館出版）金岳霖先生的「論道」，（廿九年商務印書館出版），此書未流入內地，作者尙未見到。以及沈有鼎先生新近在「哲學評

論」發表的「意指分析」的兩章，都是哲學上極有價值的著作。這些著作，自不能一一加以敘述，作者只能把前述的三種，略加提示，而說明中國哲學進步之所在。

先以熊十力先生的「新唯識論」來說。熊先生這部書，不僅保存了中國哲學的優點，而且改正了中國哲學的缺點。第一，我們不能不承認熊先生的哲學精神是體驗的，是力行的。「新唯識論」開始即曰：「今造此論，爲欲悟諸玄學者，令知一切物的本體，非是離自心外在境界，及非知識所行境界，唯是反求實證相照故。」所謂「反求實證」，就是體驗的意思，就是力行的意思。全書主張體驗，主張力行的話，不知多少。這種精神的看重是可以無疑的。第二，我們也不能不承認，熊先生的哲學方法，特性智，也特量智。他不僅運用他的直覺，而且也是運用他的邏輯。我們雖可以說熊先生這部書都是體驗的話，可是體驗有得之後，他却能以一種嚴格的邏輯表達出來，這部書系統的完整，說理的圓融，思想之深入而謹嚴，不是於邏輯有極好的訓練的，決不能寫。他提出來的主張，都有理由，都有論證，而決不是武斷肯定的。這點我們不能不說，熊先生是把中國哲學過去第

缺點糾正了。第三，我們更不能不承認，熊先生的哲學態度是哲學的，而不是宗教的。他在這部書內嘗說：「吾人論學，到真是所在，即古人已先我而言之，更要先後互相印證，無可與古人立異。但古人有所未盡者，應當加以發揮或修正。學問之事，期於求理之是而已。」又說：「我以為真理是不遠於吾人的，決不是從他人的語言文字下，轉來轉去，可以得到真理的」。這種不立異，不苟同的態度，實為哲學家應有的態度。所以，他雖談唯識，却對於唯識之說有所批評，雖談儒學，也對於儒家之說有所補充。他不像一般佛教徒，信了唯識之說後，即視唯識之說為天經地義，不敢有所懷疑。他也不像宋明理學家，要做什麼衝道的工作，對於外來的任何學說，必視為異端而加以排斥。他只站在真理的立場上，而求理之是。這無疑的是哲學的態度，而不是宗教的態度。無疑的，熊先生也是把中國哲學的過去缺點糾正了。至熊先生這部書的主要意思，則全在闡明體用不離之一義。這體是本體；而本體必顯現為無量無邊的功用。用是體的顯現，體是用的體。「無體即無用，離用元無體。」其陳義甚精，惜作者不能在這裏加以詳述了。（作者曾將是書寫了一篇

書評，見「思想時代月刊」第十三期，讀者如想節省時間的話，可以參閱，否則，即宜將是書細心全讀。）

次以賀麟先生的「近代唯心論簡釋」來說，賀先生這部書也和熊先生一樣，一方面保存了中國哲學的優點，一方面也改正了中國哲學的缺點。這我想用不着作者來再加以說明。賀先生的重力行，重體驗，已有明白的表示。這在前面提及的他的一本書可證，即現在的一本書內，他也有「論宋儒思想方法」一文，對宋儒的直覺法頗表同情。不過，他所同情的直覺，不是前理智的直覺，而是後理智的直覺。所謂後理智的直覺，也即是經過邏輯洗禮後的直覺。所以賀先生的哲學方法，不用說也是兼有直覺法和思辯法之長的方法。至他的哲學態度之不是宗教的，那更不待言。賀先生和熊先生之間，如有不同，只是他們彼此間的思想淵源，稍為不同而已。熊先生的思想淵源，一部分是來自印度，而賀先生的思想淵源，則一部分來自西洋。我們可以說熊先生的哲學是中印哲學交流後的最佳作品，而賀先生的哲學，也許可以是中西哲學交流後的最佳作品。自然，作者並不認為賀先生這

部書是賀先生的代表作，（不久的將來，賀先生必可有系統較為完整的著作發表），然賀先生思想的要點，則不難從這一部書而窺見一斑。賀先生是想把西洋的正統哲學和中國的正統醫學加以調合的。他所主張，或所同情的唯心論，不純是西洋的，也不純是中國的。他是從這兩方面的哲學，體驗有得，而自行提出來的他所持的心物觀，最能表現這點。例如，他說：「嚴格說來心與物是不可分的整體。為方便計，分開來說，則靈明能思者為心，延擴有形者為物。據此界說，則心物永遠平行，而為實體之兩面：心是主宰部分，物是工具部分。心為物之體，物為心之用。心為物的本質，物為心的表現。故所謂物者非他，即此心之用具，精神之表現也。」這是賀先生思想的根本，其中有中西哲學的淵源，是識者所能共見的。

末以章士釗先生的「邏輯指要」來說。作者在前面曾謂中國哲學缺乏邏輯的訓練，這不是說中國無邏輯。中國是有邏輯的，但中國哲學却實不注重邏輯，也並不自覺的運用邏輯。這是無可諱言的事實。所以要從中國舊籍整理出一部系統完整的邏輯來，實不是容易

的事情。西洋邏輯之輸入中國，不為不久。自「名理探」到嚴又陵所譯的「穆勒名學」，再由嚴譯到抗戰的開始，任何一段時間，都不能算是短促。可是，這其間我們都不見有「以歐洲邏輯為經，本邦名理為緯」而寫成的邏輯書。這種邏輯著作恰恰在抗戰中出現，不能不令人興奮，而感覺到前途的無限。章先生這部書，雖對於邏輯的本身，較少積極的貢獻，可是這部書的最大貢獻，乃在證明中國亦有邏輯，「尋邏輯之名，起于歐洲，而邏輯之理，存乎天壤。其謂歐洲有邏輯，中國無邏輯者，警言之。其謂人不重邏輯之名，即未解邏輯之理者，尤妄說也。」章先生的目的是想解除中國無邏輯的惡名，乃在我國舊籍中找到了不少邏輯上的說明和例證。差不多西洋邏輯上所有的原理或法則，都多少可在我國舊籍中找到。這至低限度證明了中國是有邏輯之理的，只不過沒有意識的組織成爲邏輯之學而已。經過了章先生這一番探討的工夫，一方面使讀舊籍的人可以有進一步的認識，另一方面也可使研究中國哲學的人可以明瞭中國哲人無意中所運用的邏輯。這不能不算是章先生的功績。



我們從上面簡略的敘述中，知道這抗戰七年來的中國哲學確是有進步的，確是可以樂觀，但還有一種更可樂觀的現象，作者不能不附帶述及的，就是關於西哲名著的介紹。我們知道中國哲學最盛的時期爲先秦諸子，秦漢以後，便呈衰敗，而到了宋明理學，便又顯示着中興的氣象。這宋明理學的中興，一部分的原因，不能不算是由於佛教思想的吸收融化。然宋明理學家所以能吸收融化佛教思想者，我們又不能不歸功於唐代玄奘所主持的譯經工作。沒有他這種譯經工作，佛教哲學便不能系統的介紹到中國來。所以系統的翻譯介紹外來的思想，實爲一種不可缺少的工作。抗戰前，我國哲學界並不是沒有把西洋的哲學翻譯介紹過來。可是以前翻譯介紹，不是漫無系統，就是惡劣不堪。沒有哲學訓練的人，只要懂一點外國文，便也提起筆來翻譯哲學名著。譯者對於所譯的書，自己沒有懂得透澈，他怎樣能表達原書的真意呢？結果這些譯品便有不少是錯誤百出的，或則是晦澀難解的。這是有目共見的事實，然抗戰前却沒有人設法加以補救。直到抗戰後，這種工作纔由中國哲學會負擔起來。兩年前中國哲學會組織了一個西洋哲學名著編譯委員會，由賀麟先生

主持。目的是在系統的翻譯介紹西洋正統哲學的名著。所譯的書都是經過選擇的。所請的譯者，則不惟是哲學專家，且是該一類書的專家。譯者每譯一書，都得寫一篇長序來說明是書的內容。譯言有難解之處，還須加以注釋或按語。譯成之後，且須經過另一哲學專家的校閱，才能出版。其工作的程序，是非常欽慎的。現在由該會主編出版的，已有賀麟先生譯的斯賓諾沙『致知篇』，及作者譯的魯一士的『忠之哲學』。（皆由商務印書館承印出版）在印刷中的，還有好幾種，在翻譯中的則更多。作者不敢說，由該會譯出來的書使一定好，然這是有計劃，有系統的譯書工作，也是合乎理想的譯書工作。作者深信這種工作繼續下去，將來是一定會發生莫大之影響的。這豈不是抗戰七年來中國哲學界的一種好現象嗎？

中國哲學是進步了，中國哲學是新生了。這七年的抗戰，並沒有阻礙中國哲學人的思索，反而，使他們的思索更為敏銳了。我們對抗戰之前途樂觀，我們對中國哲學的前途亦樂觀。

## 七年來的中國抗戰文學

王平陵

二

從八·一三到現在為止——即神聖的抗戰因戰略退出淞滬，由淞滬退出南京，武漢而至陪都以後，以時間論，已是滿了七年，邁入第八個年頭了。在這一段長長的過程中，我們的文學工作者（除極少數沒落的作家外）無不爲了民族的生死大戰而效忠。這一次日本軍閥他竭五十年來儲蓄的力量，全部用來試驗我們，一切受試驗的人們，都明白攔在肩仔上的責任，是非常艱鉅的，我們所走的路途，比任何一代都要辛苦。東方有許多小國，太平洋上的羣島，中國廣大的領土，無不先先後後受到獸蹄的蹂躪，變成了一片荒涼的廢墟，東方各民族所蒙受的災難，自然是前史所未有。在千鈞一髮，危幾四伏的關頭，中國

獨能擋住日本軍閥的獸蹄繼續前侵，制止他們的野心，貪而無厭地發展，使我並肩作戰的盟邦，有從容準備的時間，到今天竟能發揮排山倒海的力，陷侵略者於死地，還給侵略者以應得的懲罰。在勝利快要到來的前夕，盟國的當局與人民，無不深切明瞭中國的犧牲決不是白費的，他們並不以為中國由於抗戰最久，拖得十分困乏的窘狀，減輕四強之一的重量，相反的，正因為我們即到了抗戰八年的此刻，猶在努力克服困乏，積極準備反攻的緣故，却更得到全世界的同情與援助。中國的抗戰，能收得這樣偉大的收穫，要歸功於英明的統帥及其統率的鬥士們所表現的戰績；是多數勞苦的工作者與民衆，充盡了「有力出力，有錢出錢」的義務；但平心而論，所有的文化工作者——尤其是一般文學作者，實已耗盡腦汁，用盡心血，表現了宣傳的功效，如果，在這一場大戰中，缺少文學作者的參加，我相信在強調戰志，激勵民心，宣揚主義國策……等等的工作上，必然會感覺莫大的影響，關於這，我們祇要看看七年來的作家們在文學上所提供的質與量，便不難得到一個比較具體的說明。

在這裏，我們必須騰出一塊空白，把七七事變將要發動的前夜，中國文學界所顯示的姿態，繪出一個淺略的輪廓。

九一八以後，文學界正同全國民衆的見解一樣，對於不抵抗而坐失東四省，說不出的憤慨，而對於不甘屈伏，揭竿而起的義勇軍，咸抱盛大的熱懷，祈禱勝利，像這一種傾向，表現在戲劇的，有我和歐陽予倩合寫的「苦鬥」，田漢的「回春之曲」；見之於小說的，有張天翼的「反攻」，蕭軍的「八月的鄉村」和我寫的「期待」；用詩歌，散文的形式來表現的，那就更多了。東北淪陷後，關外的作家們出奔關內的，有舒羣，蕭紅，蕭軍，羅烽，白朗，李輝英，端木蕻良……這一羣，他們嘗够了流亡的痛苦，熱盼祖國的義師，總有一天掃平關外的狼煙，回歸自己的故土，這傾向，在蕭紅的「生死場」，舒羣的「沒有祖國的孩子」，羅烽的「呼蘭河邊」，都有沉痛的描寫。東北作家羣中，也有直接參加義軍工作的，像詩人金劍嘯曾在黑龍江一帶的森林裏，號召同志，武裝民衆，與日寇週旋，他在上海專讀過書，「興安嶺的風雪」是他一首魄力雄偉的長詩，寫義勇軍的艱苦奮

門，使人感動，可惜他在一九三五年被黑龍江的日寇殺害了。

這時期，全國上下無不期待第一次戰後的和平機構——國際聯盟，能用合法的手段，解決中日的糾紛；及國聯威信掃地，盟約全被侵略國撕碎時，又加深了國人的悲憤與失望，文學作者當然是不會例外的；因此，在作品中便充分流露着被損害者的悲哀，並響應領袖所號召的「自力更生」的主張，向民眾們作強有力的暗示。

兇惡的日寇，是得步進步的，到一二八勒逼我們撤退淞滬駐軍，激動十九路軍的英勇反抗時，國人在極度苦悶的氛中，忽然感到無限的興奮，特別是文學作者無不以懇摯的熱情，讚美反侵略的抗爭，那時候，南京出版的文藝月刊，上海發行的小說月報，現代文學月報，都連篇累牘，刊載前線訪問記、戰歌，以及有新聞價值和歷史意義的報告文學。

當局關於打擊敵人的工作，已在避免敵人的注視下，有計畫地進行着。同時，蘇聯發覺日德意的暗算，即暫擱階級意識的宣傳，拚命打銷防共陣線的形成，便一面參加國聯，

一面執行其領袖的主旨；「以共產主義的形式，宣傳民族意識的內涵」，改變一貫的宣傳政策。中國一部分號稱前進的作者，也突然落後了一步，在作品中爭先反映「民族至上，國家至上」了。當日寇急謀向中國強索攻蘇的防地，求與德意呼應，東西夾攻蘇聯時，他們對於愛國主義的發揚，甚至比一向服膺民族文學的作家們，好像還要起勁而熱心，無非是要提早促成中國的抗戰，緩和蘇聯的危機，讓蘇聯可以努力於五年計畫的完成。正在臥薪嘗膽的中國，雖被無量數的愛國志士們，以及毫無作用而具有深識遠慮的學術界所深深明瞭；然有些血氣方剛的小伙子，給這樣的宣傳所鼓動，總疑心政府害了「恐日病」，而政府又無法把國防大計和預定的國策，提早公開，遂使全國民衆在七七前夕，沉淪於鬱悶的深淵。當時，戲劇界在京滬一帶演出的劇本，如：夜光杯，賽金花，武則天，黑地獄，羣鴛亂飛等等的作品，或則借歷史的舊事，諷刺政府對異族的叩頭，或則暴露日寇的罪行，冀以奮激國民的公怒，遷怒忍辱負重的政府；或則絕不寬假地鞭策傾軋嫉忌，惟利是圖的政局。這一類的意識，同時也反映在電影上，表現在一切的文藝作品中，鬧到羣情洶湧

，莫衷一是，人心浮躁到極點，幾有外患相侵，內亂齊發的危險。附和者的動機，雖不惡劣；但策動者的用心，是又當別論的。直到二十六年的七七，蘆溝橋的炮聲響了，領袖在廬山之巔，發出有名的「廬山談話」，大家知道這便是進軍的號音，長期的民族大戰，是不可避免的；於是，全國的作家們爲了中國的復興而獻身，多數的作家們看到國家有前途，一變其冷譏暗嘲的作風，而爲熱烈的歌頌與鼓勵；然也許有極少數的人目擊中國的抗戰果然提早爆發，因爲任務的貫徹而深覺慶幸的吧？實則中國的政府，決不會站在防共集團的一邊，失信於素以平等待我的民族，自貽伊戚的。到了最後關頭，中國民族爲了生存和獨立，一定是不顧一切，奮起抗戰，與破壞和平的敵寇，誓不兩立的。

◎我所以約略地追敘七七前夜的史實，是因爲這些史實，與七年來的中國文學，有着種種不可分離的關係。第一；東四省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火藥庫，全世界爲了這一場大戰所付的代價，可說都是導因於東四省的被掠。今當勝利在望，我們應該從記憶裏，從一切的文藝作品中，再度喚起久已疏遠了的關於東四省的印象了。我們決不可忘記那大豆高粱的



故鄉呵！第二；中國大部份的文學作者能够不計個人的利害，拋却文學的宗派，放棄成見及偏見，克制不必要的糾紛和誤會，大家團結得很好，在事變以前。由於抱着一致對外的決心，已肇其端倪了；第三；戰前文學上的表現，未能配合國策，作一致的發展，出發於愛國的善心，幾乎製造禍國的事實，這是今後文學作者爲了執行反攻的任務一個最好的借鑑；第四，事變以來，中國抗戰最久，犧牲最多，因戰爭而喪失的生命，世界各國無出其右；戰後的復興大計，需要有計劃，有步驟，同心協力，齊頭並進，到那時候我們決不會感覺人手太多，可以容許一部份人休息，或坐視有人滅消建設的力量；所以，站在時代前面的文學作者，是永遠不能分離的，必須盡可能地發揚團結的精神，工作的實效，作民衆的示範。第五：兇暴的日寇，尙在瘋狂地掙扎，這必有一場辛酸的惡鬥，擺在面前，就在這刻，我們的文學作者，萬不能看見大功垂成，當局更不能當作「秋扇可捐」，任其「投閒置散」，就此罷手，還得要發揮最大的努力，響應進軍的號音，爭取最後的勝利。

## 二一

七七前，那偉大的進軍的號音——「廬山談話」公佈以後，舉國文學作者無不歡欣鼓舞，衷心共鳴；即向無政治興趣，頑固的學究式的作家們，也都站在擁護政府的立場，試作富於宣傳性的作品了。八、一三滬戰爆發，全面抗戰繼續展開，京滬一帶的文學作者，都踴躍參加各種抗戰的集團，紛赴前線，幹着救亡的工作，慰問火線上的戰友們，盡量搜集戰地的資料，競寫詩歌，雜文，報告文學一類的作品，刊登京滬各報及戰鬥性的文藝刊物，歌頌英雄們的戰功，他們都是出於愛國的至誠，頗備把自己的一切，獻給苦難的祖國的，即無形式上的組合，精神是奮發的，一致的，不分彼此你我的；這時期，沒有人閉門寫作了，都覺得在砲火連天，血肉橫飛的大戰中，用文藝來宣傳，已不是必要，作家們能常到前線的後方去，就是幹着輕而易舉的慰勞工作，也比寫十萬字的抗戰文學，更有益於抗戰，因此，那時期，並沒有大批的抗戰小說，詩歌，劇本……等等的作品，接二連三

地出版。可是偶然散見於報紙及刊物中的零篇斷簡，都充滿着真實的感情，純粹是爲了抗戰而寫的文藝，決不是利用抗戰的資料，爲要竊取『國難名』而寫的作品。

當滬戰激烈進行的階段，有些在戰前即在舞台上現身說法，高唱抗戰殺敵的戲劇工作者，都停止演劇，紛紛離開上海，連袂來京，向主持中央宣傳工作的邵力子先生請求資助和名義，率領演劇第幾隊，深入內地，跑向陝青甘新的偏僻之地，宣傳抗戰；也有人覺得不必都向內地深入，出國宣傳，也是十分要緊，於是，他們就請求先到香港，看戰局的演變如何，再赴南洋演劇，發動僑胞來抗戰。邵力子先生認爲內地和國外，能有劇人的先去做一點工作，總是需要的，他便微笑地答允了他們的要求。實在說，那時候在淞滬苦戰的鬥士們，知識水準極高，就缺少精神的食糧，一般鬥士們並不願意他們在大戰正酣的時刻，紛紛離開上海。

民衆們由於一、二八之役，知道鬼子們吃到十九路軍的打擊，誰都肯定日寇不足懼，也有人以爲鬼子們再度吃到中央軍的打擊，自覺侵略中國之不易，就會知難而退，趕早議

和的；因此，誰都沒有逃難的準備。想不到抗戰三月的淞滬，竟告淪陷，敵寇長驅直下，旬日之間，即喊出保衛首都的呼聲，昔日的江南繁華，一時風流雲散，民衆們都傾家蕩產，狼狽西上。各地的作家，亦追隨抗戰的政府，雲集武漢，詩歌，小說，戲劇的作者，真是『過江名士，其多如鯽』，大家在患難中相逢，格外親切，時在黃鶴樓上煮菜飲酒，縱論時局，大有新亭對泣，中流擊楫之感。忽傳首都棄守，人們倍增憂惶，預料無惡不作之日寇，隨時可以溯江而上，武漢必非樂土，急謀西上重慶，南奔香港。這時候，中央的主力，正和裝備堅強的大敵，決死戰於台兒莊，日寇已承認是最後的一戰。台兒莊大戰，吸引着國人深切的關注。來到武漢的作家們，目觀戰局的緊張，恍於『國存與存，國亡與亡』的危殆，都不念舊嫌，重結新好，向着『團結禦侮』的大路，走擁來了。向爲中國文學界推重的邵力子先生便站在宣傳崗位上，登高一呼，要求作家們打破過去『文人相輕』的前例，爲了國族的存亡，組織全國性的協會，統一在主義和國策的領導下，同爲抗戰而努力。籌備了一月之久，這在文藝史上的劃時代的大結合，竟於抗戰第二年的三月二十七

日，正式成立於武漢，全國作家，濟濟一堂，大會宣言，着重在呼號團結，清掃魔障，透示希望，穩定動盪的民心，肅滅奸偽的言論，激昂慷慨，熱情充沛，會譯成各國語言，由駐華外籍記者義務拍致國外各大報，武漢輿論界，以及將近十五種文藝出版物，均發行專刊，特刊，各報並撰寫社論，多方策勵，文學界精誠團結的熱烈氛圍，極盛一時，震動全國。「積不相能」的文學作者，果然能團結一致，大家認為奇蹟。是不是熱情的感應呢？台兒莊空前的大捷，就在那一天傳來，炮竹聲，歡騰聲，充溢於整個的大武漢。

由戰爭中興起的文學界大結合，戰爭給予文學的影響，如同魚和水，人與空氣那樣密切。台兒莊的大捷，奠定大武漢抗戰的基礎，同時把大時代的新文學，注入新鮮的血液。作家們都有自我檢討的勇氣，從善如流的虛懷，抗戰必勝的信念，覺得與其互相推諉，彼此抱怨，不如各就自己應負的責任，做到無可批評的地步。於是，積極方面，要求凝聚一切的力，獲致戰爭的勝利，消極方面，根除潛伏的好偽和其破壞團結的陰謀，便成了台兒莊大捷以後反映在中國文學上的主潮，也就是那時期的文學作者共同坦負的責任。

## 三

敵人妄想以勝利結束中國的抗戰，不惜以全力侵佔武漢，逼着我們的抗戰司令台西移重慶以來，大部份的作家們遂於二十七年的秋天，相率來渝。雖有一部份的作家，因工作上的便利，職務上的關係，奔赴各地；但『文協』本來留渝的同志，就有很多，而以前不在武漢，新由各地來渝的作家，亦復不少；所以，我們的文藝陣營，正同我們愈戰愈強的士兵一樣，不但沒有減色，反較武漢時代更充實了。

二十八年四月九日，『文協』在舉行第一次年會時，在大會上通過了一件議案，就是由戰地黨政委員會的資助，組織作家前綫訪問團，派遣十五作家，在團長王禮錫同志的領導下，出發東條山，慰問艱苦卓絕的戰士，並搜集寫作的資料，歸來後，曾有戰地訪問叢書十五種，在中國文化服務社出版，以應前後方軍民的需要。可惜禮錫同志病滯洛陽，竟致不起，是文藝界最大的損失。

這時期的文藝定期刊，除「中國文藝社」的文藝月刊，「文協」的「抗戰文藝」繼續出版外，「文協」與成都分會合辦通俗讀物一種，應中宣部政治部之委託，寫士兵讀物若干種，又與香港分會合辦英文版「中國作家」月刊，以實踐在第一次年會中所號召的文章人伍，下鄉，出國的三大工作。

不久，中國文藝社社長葉楚傖先生繼邵力子先生主持中央宣政，葉先生是南社的創辦人之一，有名的詩人和小說家，對於文藝運動的重視，並不下於邵先生。自伊重長宣傳部的第一件工作，就命令中國文藝社舉辦大規模的抗戰軍歌的徵選，聘全國最優秀的作曲家，製成名曲十三種，此刻如「民族至上」，「歡送」，「軍民合作」，「凱旋」，「擁護領袖」等等流行的軍歌，便是在葉先生之領導下徵得的作品。

二十九年四月，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成立，聘推張道藩先生為主任委員，潘公展、洪蘭友二先生副之。中國文藝社隸屬該會的系統下，另設編輯委員會負責文藝月刊的編務。

「文協」遷渝以後，限於經費，也無所建樹；不過，一般會員們對於自己的寫作，並沒有鬆懈，我們看到散見於各報及雜誌的文藝作品，便是最可靠的證明。

三十年度的春天，爲多數人未經覺察的暗影，向着穩定的生活突然襲擊，那就是由於米價的跳躍飛漲，牽引百物和人力同時沸騰，使多數人立刻失却生活的保障，陷於空前的困窮——尤其是全靠賣稿度生的作家們。於是，在文藝上便把這一個嚴重的病態，作爲寫作的課題，一面鼓吹生產，一面開始和囤積居奇的奸商，短刀相接，進行肉搏的鬥爭。其攻擊的猛烈，實尤甚於對汪傀儡以及一切賣國賊的誅伐，大家認爲物價飛漲的危險性，比敵僞的禍國，又有過之而無不及；無奈，作家們的口與筆，一直攻擊到今天，這一重破壞抗戰的難關，還在變本加厲，危害國族的生存。汪傀儡是死滅了；而一羣混水摸魚：趁火搶劫的奸商，豈但未遭顯戮，猶在趾高氣揚，驕奢淫佚，自以爲「天之驕子」呢！因爲有這樣一個難關，始終在作祟，好像永遠無法克服似的；所以，大家都喟然浩嘆說：「今天最不痛快的事實，就是伴隨了七年抗戰所創造的一切進步，不足以抵償由於物價的飛漲，



在有形無形中所帶來的退步。「物價！物價！是多麼一個枯燥的主題？但作家們爲了國族要存在，抗戰要勝利，即明知道無效，還是不得不寫。

最三年來的文藝工作，受着物價的影響，逼着出版界不能不爲了吃飯問題，顧惜自己的血本；然却有一個反常的現象，出於大家的意外，即屬於文藝性的作品和出版物，並沒有減少，大約是生活苦悶，急於想逃避苦悶的緣故。因此，如果站在出版界所抱定的「賺錢第一」的角度來觀察，關於書的銷路，哲學不如科學，科學不如文學。文學之中，詩歌不如小說，小說不如劇本，而以運用文學的技巧所寫出的「成功秘訣」，「新裝一束」，「交際之道」，「處世經驗」，「關於女人」……等等的穢書，其行銷之速，在所有的出版物之上。如果站在「量的角度來觀察，就我所知，在重慶的文藝定期刊，有文化運動委員會主辦的「文藝先鋒」，全國文協的會報「抗戰文藝」，青年寫作指導委員會主辦的「文學修養」，青年書店出版的「民族文藝」，時興潮的「文藝副刊」；在成都，「筆陣」是成都文協分會的定期刊，在昆明，「文藝崗位」是昆明文協分會的定期刊，在桂林，

曾經有過茅盾主編的『文藝陣地』，王魯彥主編的『文藝雜誌』，司馬文森主編的『文藝生活』，熊佛西主編的『文學創作』及『當代文藝』，蕭鐵主編的『新文學』，胡危舟，陽太陽主編的『詩創作』。還有文獻出版社發行的『文學譯報』。此刻的桂林，已暫陷敵手，這些文藝定期刊，不得不因戰事而停刊，留在那裏的作家們也祇好和自己耕種的園地，揮淚告別了。

關於文學的園地，除了文藝定期刊，報紙的文藝副刊之外，公私出版界無不努力於文藝叢書的印行。這一種趨向，肇端於四年前香港商務印書館『大時代文藝叢書』的出版。其種類包括詩歌，小說，劇本，報告文學，散文和雜文，都是大時代忠實的記錄，早為讀書界所珍視，今天還在繼續中。這以後，叢書風行了，在重慶就有上海雜誌公司出版的『每月文庫』，中國文化服務社發行的『戰地文藝叢書』，文藝獎金保管委員會主編的『中國文藝叢書』，中央黨部出版的『劇叢書』，此外，互生書店，文林出版社，國民圖書出版社，良友出版社，獨立出版社，正中書局均有成套的文藝叢書先後出版；在桂林有

文獻出版社主編的『野草叢書』，今日出版社主編的『今日叢書』。

七年來，多數的文學作者，無不運用他們擅長的技術，從事於文學各部門的寫作，誰都沒有休息過，實在說，爲了應付日常的艱苦生活，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下，抵拒奸商的剝削，也不容許他們放下自己的鞭子。自從敵寇像襲珍珠港，擊沉英國的威爾斯親王號，挑起太平洋大戰，自掘葬身的墳墓之後，中國抗戰不孤，和全世界擁護民主，維持正義人道的盟邦，站在一條戰線，彼此真忱合作，互相觀摩，使我們警覺到生產落後，民風閉塞，必須急起直追，迎頭趕上去；然欲求速效，就需要大多數的民衆切實負起抗建的重担，有機會貢獻自己的能力，因此，政治民主的呼聲，便高唱入雲，文藝界也有漸漸把這一個課題，形成主潮的傾向了。儘管實現民主的方式和程序，是執政者的工作，而作家們在其作品中，渴望進步，渴求光明，期待中國文化昌明，科學發達，統一強大，總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

戰時或戰後，世界門戶洞開，天下一家，誰都不容許腐化和落後，也無法諱疾忌醫！

遮蓋自己的錯誤，文飾自己的弱點，祇有坦白地承認，勇敢地改造，努力向人家看齊，并且要人家向我們看齊。

德國崩潰了，日寇的喪鐘響了，舊金山的大會開幕了，實現永久和平的第二個大時代，無疑的已經開始了。中國的文學的作家們將如何發揚真摯熱血的情操，發動浩瀚壯闊的波瀾，高舉光明的火炬，歡迎第二個大時代的到來呢！

### 三 抗戰七年來的教育學

瞿菊農

七八年來的抗戰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的大事。在這七八年中，中國社會結構與生活方式正在加速的變動。在此變動之中，各部門的學術研究都不能不因需要之不同，條件的變換而受影響。教育學是與人生關係最密切的學科之一，亦不能不受此種大變動的影響。當此種動盪的時代。教育學不得不一面適應當時的要求，為實際的設施求得理論的學術的基礎，為實際上發生的問題，推求解答，一面更要對過去與現在有批評的檢討，重新估定其價值。並且要從教育的本質上，再研究教育的意義，對教育作綜合的，一貫的研究。

抗戰以來學術研究的條件，極度缺乏。不特學人生活，十分窘苦。即圖書設備與實驗準備亦極度困難。學術性質較強的著作不易完成。即使完成，亦不易刊印問世。我們見聞當然有限。以交通之阻滯，印刷之困難，乃至於買書之不易，我們見到的教育學著作不算

太多。相信一定有許多好著作，我們不會見到。但就所見到的若干冊教育著作與若干篇刊物論文，亦可以約略窺見近年來教育學研究的方向。

教育是一種社會的活動，亦是一以社會力量影響個人行為的過程。他的基礎學科，一面是哲學與社會學之類；一面即是心理學與社會心理之類的科學。大體說，前者所涉及的是理想、政策、內容、行政等問題，後者所涉及的則是方法程序一類的問題。關於後者或者在討論心理學的研究上已經提到。我們的敘述，偏於前者。

教育的活動原來具有兩個方面。其一可以說是從教育的本質上研究，亦可以說是教育的永久性，其二可以說是從教育的變形上檢討，亦可以說是教育的時代性。在社會整個生活發生大變動的時候，一方面不要任意變更教育的本務，一方面要能極有伸縮地適應時代需要。抗戰以來，社會變動太複雜而急劇，如何保持教育的本質的社會功能，如何適應配合時代的「挑戰」，其實是近年來教育學研究的根本問題。如何使教育的永久性與時代性得到和諧的連繫配合，是任何社會變動時代的教育學的研究對象。

我們看七年來的教育著作，大體說，頗可以表現此種方向。不過有的偏重教育的永久性，有的特別注意其時代性，有的想採用執兩用中的方式，企圖構成一套便歷史與時代配合的教育。

時間是延續的，若勉強將時間割裂分期原是不甚可靠的作法。何況七八年的時間，實在太短。然而大體說，移都重慶之前可以說是第一階段；移都重慶之後到現在為第二階段；現在正進入第三階段了。

第一階段的研究大致偏重戰時設施的研究。企圖擴大教育範圍，普及民衆，改革當時的一般教育以求與戰時的要求相連繫相配合。當時關於國難教育，非常時期教育，抗戰教育，民衆訓練等著作，出版甚多。惟就教育本身研究者少，就教育的時代效用立論者多。例如袁營先生的抗戰與教育，張佐華先生的抗戰教育論等，大體可入此類。雜誌刊物上此類文字極多，不及一一列舉。為適應此時要求起見，教育上有種種設施，如中華平民教育會之農民抗戰教育團，教育部之社教工作團，民衆教育巡迴施教隊，實驗巡迴歌詠團，

巡迴戲劇教育隊，青年訓練之實施，國立中學之創設等等，以及戰時難民難童教育保育之設施，各省各地的各種巡迴施教，流動教學等等。凡此設施，都充滿了戰時應變的空氣。在教育學的觀點上說，則是擴大教育的範圍，加重了教育的任務，增添了許多與宣傳及組織所用的材料與方法。凡此均對於教育學的研究有影響。而此類研究的內容，大率偏重於教育的時代性一方面。

此一階段的教育活動，顧嶽中先生有中國戰時教育一書，材料搜集相當豐富。惟所搜集者以法令方面為多。一般社會上的戰時教育設施與意見較少。顧先生以為「新時代要求着我們，使全國每一部門的工作，重行修正步趨，來配合着全民族抗戰建國的要求。教育部門自不能不檢討過去，對時需抓住時機，努力邁進。」此序文的幾句話，足以表明當時對戰時教育的要求。最後四句，更可以表明當時教育的研究者和實行家的心境與想法。

依顧先生之意見，戰時教育有其特質，分為八點：（一）戰時教育較平時教育更能針對時需，檢正弱點。（二）戰時教育促成全國教育發生一致的影響和動員。（三）戰時教



育促成許多新型的教育機關。(如國立中學、學生營、中小學教師服務團、兒童保育院、教養院、育幼所以及各種巡迴施教的社會教育組織。)(四)戰時教育產生許多特種訓練學校(如各種訓練班)。(五)戰時教育促成全國教育機關更得到平均的分佈。(指由沿江沿海移入內地，城市移轉鄉村言)(六)戰時教育促成義務教育之普及。(七)戰時教育促成民衆教育之推進。(八)戰時教育更能培養建國的人才。顧先生根據此八點，認為戰時教育的意義爲「介於戰前教育與戰後教育兩者之間的戰時教育，係應戰時環境的特殊需要起見，增加戰時訓練使戰時精神澈底滲透於平時教育中，也就是把平時教育基於建國教育之上，使之戰時化」。申言之，顧先生之意認爲不應將戰時教育與平時教育，打成兩橛；而要就環境之特殊需要求所以適應配合之道。

又如汪懋祖先生討論戰時教育認爲「平時教育與戰時教育是一貫的，並非對立的。……只因爲平時教育基礎不良，現在再提出來抱佛脚。……而戰時教育意見，可分兩層說：(甲)在後方學校系統內的教育有須(一)補充的，(二)須加緊的，(三)須改創的

。……（乙）從戰區退出之兒童教育及不在學校系統內的教育。應該補充加緊的大致是與軍事有關的。而改造的方面，認為如大學中各種社會科學都偏於理論的，西洋的，缺乏中國歷史的，及現實社會的體認。至於技術專科應切實施行建教合作，以應用於國防及生產為主。至於乙項，則特別注意兒童教養院，疏散的教育，各種特殊訓練班，切實施行建教合作，推進農村服務訓練等。總之，汪先生的意見是「在此民族鬥爭極激烈的潮流中，衛國的責任及國防的意義，都應安放在平時教育之內，戰時不過加強其功用而已。」

抗戰初開始的時候，關於戰時教育發表意見的文字特別多。有的亦不免夾着感情，這也是不能避免的事。大體說有的認為原來教育根本要不得，不能適應戰時需要，要澈底的改革。有的認為教育究竟不是宣傳，不是狹義的某種技能的訓練，戰時固然有特殊需要，為一般教育所不能滿足，但可以有特殊的設置與工作，不可將教育的任務或本質變得太多。往長者是學術上與建設上的損失。有的則想將兩方面連貫起來。

從教育法令上研究教育實在是一件要緊的事。（尤其是戰時的教育。）因為法令條文

的背後，最能表現或映出政府或一部分人們的教育主張。而且大體上這些法令都相當是各方面意見的調和綜合，而又相當維持一貫性的主張。所以我們以為戰時教育的法令，實在是教育思想研究的好材料。抗戰各級教育實施方案綱要，青年訓練大綱等都是重要的材料。各戰時教育方針，即提出「三育并進；文武合一；農村需要與工業需要並重；教育目的與政治目的一貫；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密切聯繫；對於吾國文化精粹所寄之文史營藝，以科學方法加以整理發揚，以立民族之自信；對於自然科學，依據需要迎頭趕上；以應國防與生產之急需，對於社會科學；取人之長，補己之短，對於原則加以整理，對於制度應謀創造，以求一切適合於國情；對於各級學校教育，力求目標之明顯，並謀各地之平均發展。至於義務教育，依照原定期限，以達遍及，對於社會教育與家庭教育，力求有計劃之實施」等九條。此九條的內容，實係一方面將一部分戰時要求的抗戰宣傳與直接與抗戰有關的技術的訓練，一部分的社會工作劃分一個界限。一方面則是從教育政策本身，企圖確立其方向。每條背後其實亦都有其戰時的體認。（其他的法令條文，限於篇幅，不具引釋。）

我們現在所研究此一階段的教育論著，似乎有幾點頗影響當時與以後的教育看法。而且有的方面的實際情況，引出了若干教育問題，有的是關於基本理論或基本政策的有的是關於訓育管理一類問題的，有的是關於學術研究的方面與態度的。有所見必有所蔽；有所長必有所短，這也是很自然的。

從教育學研究的觀點上看，似有如下幾點，值得注意。

一、對過去與當時的教育批評。認為過去的教育與現實生活脫節，不能適應國家的緊急需要。不適合歷史的演進。不特不能守常，並且不能應變。亦有特別注意民族復興的教育者。對於民族性與教育的關係，作較為根本的研究。如莊澤宣陳學恂兩先生『民族性與教育』，即是值得注意的著作。中山大學教育季刊的若干篇論文，亦頗重要。

二、擴大對於教育範圍之認識。從前一般心理不免以學校與知識與兒童青年為教育的範圍。自抗戰以來，在教育機構與活動，教育的内容，教育的對象上，範圍都擴大了。教育不僅以學校為範圍，不僅以教學系統知識為限度，而且認為教育的對象實為全民。實

施教育的方法方式。儘可不同，而男女兒童青年成人，都要網羅在教育圈之內。廣義的社會教育，得到新的認識。

三、計劃的教育之注重，抗戰之初，各部門的工作，都感到人與事之不相應。（大家想還記得抗戰開始幾年間各地的各式訓練班。）因之大家感到教育有與國家建設需要密切配合的必要。建教合作，成爲一個有力量的口號。『所謂計劃訓練，是根據國家社會建設計劃的內容與機構，就推行此計劃的各種人才的需要上，實施訓練。有一種工作就準備一種人才。有一人訓練完成即收一人之用。全屬有通盤的設計，各方面有聯鎖的調整』。（拙作計劃的訓練文中語，此係民二十六年所作。）當時要求國家對教育爲配合戰時需要而作有計劃的教育設施的文字不少。此項要求，雖未能有切實的作法，但近年來若干教育上的問題，却亦是由此發生的。因爲這究竟是偏重教育的時代性的看法。假如我們說教育有發展與訓練兩方面，則當時似乎過於重視訓練的方面了。

抗戰的第二年曾作教育建設之原則一文。認爲『此次對日抗戰，對於中國的社會

結構與社會生活必發生極大的變化。……社會上各方面相互間失調的現象，已經充分表現出來。戰後的社會結構與社會秩序，更要有劇烈的變化，這是不可避免的。一國的教育制度與教育活動與社會結構是有聯帶性的。社會發生重要的變化的時候，教育的長處與缺點，亦必暴露出來。當時會將過去的教育作一檢討。並根據檢討分析的材料，試提教育建設之原則。共分八條：即（一）人格原則，（二）國家原則，（三）計劃原則，（四）連鎖原則，（五）組織原則，（六）普及原則，（七）條件原則，（八）建設原則。此八條原則當時是歸納各方教育改革的意見，加以個人的研究而成。附記以作參考。但有一點可以提出來，即祇有第一條人格原則是尊重教育的永久性的。這也是時代的影響！（此文感拙作鄉村教育文錄。）

回想抗戰開始後兩三年間，大多數的教師與學人與青年學生，都大量移入西西北，雖大抵不久都覓定校址，繼續上課；然而設備圖書究竟差得很多。各部門的學者雖在極端困難情況之下，不斷的研究，尤其與軍事直接間接有關係的部門，似更多成就。社會科學

到了西南西北，又進入一新的研究園地，（例如文化人類學的研究等），亦多所發見。但教學上因設備與人事的困難，質量都不免受影響。於是學生程度亦不免受影響。又因多種因素，學風亦受了影響，成爲一個教育上的嚴重問題。

近代戰爭可以說是學術的競賽。戰爭的教訓使教育界感到學術的落後，尤其在自然科學的技術方面，因之有無科學即無國防的口號。工礦科目，顯然抬頭。但同時亦必有人注意到科學技術之母究竟是純粹科學，於是中國純粹科學研究較差，感覺到提倡之必要。中國固有學術，自太平洋戰爭開始以來，國人亦感覺到重新倡導研究之必要。凡此都影響到教育學術的傾向。

因時代的要求方面太多，時代的變動太快，刺激太雜。於是「對於教育理論，有許多爭辯不決的問題。……因爲意見的紛歧，未免產生舉棋不定的現象」。朱經農先生自序教育思想書語）於是許多著作，都是對教育問題重作一番根本的綜合的探討。

戰爭的全體性使大家感覺到這一次的戰爭是全民戰爭。而最大多數的國民的教育組織

成爲大家注意的問題。新縣制的實行，固不問其在地方行政上與地方自治上影響如何，對於教育的研究却是一種新的刺激。

又有若干戰時教育的設施，以向來辦學的傳統及條件與人事等等因素，成效未能如所預期，有的發生了許多問題，更引起「教育改革」的呼聲。亦即是教育如何改造的研究題目。

生活的與經濟的因素，亦頗影響教育的實際。

自國府移都重慶以來，經過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以致今日，教育研究的空氣，與抗戰開始後前兩年比較有一種變動。固然在報章雜誌上，仍時常看見泛論教育的文字，但亦有若干學術性較濃的著作。就閱讀所及，大體有如下之傾向。

- 一、對於教育學術爲根本的綜合的研究者。
- 二、對於過去教育學說與教育大師爲新的研究表揚者。
- 三、就現實的教育問題爲基本理論之探討者。



#### 四、對社會教育與國民教育的理論與實施技術加以研究者。

近年以來頗有對教育為根本的綜合的研究者。所謂根本的綜合的研究，則一面恆注意教育之本質，即前所謂永久性；但亦不忽略時代的要求。或檢討過去之缺點，表揚歷史的優點。或分析現實與以「中正和平的答案」。或對教育全體從一觀點，自成體系。或從文化基礎上討論，或從生活理想上討論。

朱經農先生近著教育思想。其主旨在將「關於自由與紀律之爭；個人主義，國家主義，與民治主義之爭；鬥爭論與互助論之爭；科學與宗教之爭；知識論與道德哲學各種學派之爭；學校與社會間所生關係之爭；藝術修養與職業訓練分合之爭等等……對這些爭辯未決的問題，尋求一個中正和平的答案」。

朱先生的這本書的主旨，其實是將各種主張作一種批導工夫，與以一種理論與經驗兼顧的評衡。將長處抽提出來，將短處亦提示出來。他的態度真如自己所說「是中正和平的答案」。不免有折衷調和的意味。而他數十年辦教育的艱苦，字裏行間隨處都流露出來

。結論上有幾句話，應該引發辦教育的人，起一種戒慎恐懼之心。他說：

教育種下自私自利的因，社會就會產生攘奪貪污之果。教育種下不守紀律的因，社會就會產生擾亂崩潰的果。……究竟我們今天在教育上所種下的是什麼因，將來社會上所要受到影響，又是如何。辦教育的人不能不痛切地自行檢查一下。……天下興亡，辦教育者，不能辭其責。每自省察，時深冰淵之懼」。

經農先生原是要將教育上龐雜的議論，尋求一個愜心適當的解答。而我們這本書最可寶貴的是一種爐火純青，不夾雜感情意氣的自我批評的精神。這是教育改造的初步的亦是主要的條件！

汪懋祖先生的教育學是一本要構成一教育理論體系的著作。從進化的觀點，檢討教育的本原。對於教育理論的各方面，都大略提及，而與以一種解說。汪先生在例言上說：「本書根據『國父之三民主義』、孫文學說，及總裁對於教育方面的言論訓辭，上承孔孟，擬組織新儒家的教育思想」。至於體系本身，則頗參來耿亞力山大一派的層創進化論，陳

立夫先生之唯生論，杜威先生之學說。汪先生的著作有幾點頗應該提出來，因為凡此各點，可以表現一種對於教育的看法；要注意教育的本質，亦注意教育之歷史條件與時代條件。汪先生不特從開始即引用我國的材料，而且特立一章討論中國教育的固有精神。一章比較中國與西洋教育觀之差別，一章檢討中國的新教育。這在一本用為教本的書上，頗值得注意。

汪先生討論中國教育精神認為應以孔子為中心。中國的教育精神有如下之特徵。一為師道，二為有教無類，三為文武合一，四為忠恕一貫，五為學自行始，七為個性與適應啓發，概言之則為人本主義。即以此為準繩檢討中國的新教育，而討論中國教育之新動向。

汪先生檢討中國的新教育認為就教育宗旨說「須有中心信仰為發動之力量」。就學制說，則認為摹倣日本與美法又局部摹倣德國，而皆與教育精神無關。惟謂十八年以後，已入於研究創造時期。其根本態度可用以下數語說明。

建國教育在乎把握教育中心精神。學制自當隨社會的需要加以調整，但不必根本

改造。以往教育之失，只在學制上循環兜圈，未及研究立國之大本。自確立三民主義的宗旨以後，中國的自我精神從此復活……」

至於教育的新動向，則特別提出教育與經濟軍事配合，提高國民道德青年訓練，女子教育，科學技術及生產教育，訓練師資各點。

一般對於教育學的綜合的研究，大致有教育營學，教育原理，與教育概論等名目，其內容範圍，不盡相同。大體說教育營學是從某一營學見地，探討教育的根本理論問題，如教育之價值與意義，教學理論之分析與批判之類。大約一派營學見地，必有其教育的引申或涵蘊。一種教育體系，必有其營學的基礎，在此一點上，馮芝生先生的新理學新原人陳立夫先生的生之原理等營學著作都可以認為有教育營學的涵義。教育概論則不特注重原理原則，亦注重各方面的實際問題。教育學原理則大體是教育本身問題的理論。汪先生的教育學似乎想三方面都顧到的一本著作。

范任宇先生的教育概論是教育理論與實際並顧的著作。范先生原書即分為理論之部與

實際之部兩大部分。前者所討論的爲教育之社會科學的，自然科學的，與哲學的基礎以及教育自身之理論。後者所討論的爲教育形態與機構，制度，課程教材，教育方法，與教師問題之類。大致與通常教育概論的範圍相同，惟編序不全相同。范任宇先生的這本書，在序言上却有幾句頗可以代表一部教育學人的見地，他說：

我國今日教育積弊甚多，要求改革亦急。惟茲事體大，不宜率爾更張；且鑒於往日改革，不獨收效不宏，反而適足益滋流弊。是以當前改革要務不在即刻提供方案，立予實行，而在盡量揭出缺點，檢討缺點發生的原因，及其與他種環境相互關係所在，從此以尋出解決的理論根據。這一理論，將是中國的，不是抄來的；經過批判的研究，然後本此而釐定改革方案。這樣從根本處由質的改造，才可免去零碎的，皮相的變動，日後流弊自少。現今不特有改造的要求，且有改造的機會……

在這一話裏，亦頗表現一部教育學人對教育改造的態度與其進行的方向。

余家菊先生的「教育與人生」確是一本精研深思的著作。而且字裏行間時顯露其教育

者的內心企求與教育者的態度。全書分日新、思索、知止、發育、盡性、環境、文化、中庸、勵志、信行十章。日新、中庸、信行、三章似更爲作者用力所在。從某一觀點言，爲一種新的儒家理論，從另一觀點說，亦可謂爲對杜威先生之學說加重其道德生活的意義，而與以一儒家的理解。不知余先生以此言爲如何。又余先生說：「教育事業，決無失敗。惟其效果有易知有難測，有正顯有反映。其狀萬端，莫可究詰。吾人惟當信仰教育無失敗，以作新民之偉業，行樂育英才之素志。世運興替，教育家實掌握之」。這是何等語重心長的話。值得從事教育者的注意與省察。

錢賓四先生的「文化與教育」論文集，有若干篇討論教育的文字。亦爲一要緊的著作。歸納過去教育之弊爲兩大病，一爲實利主義，一爲模倣主義。針對此時弊，而提出文化教育與人才教育兩點。錢先生說：

中國創辦新教育……始終不脫兩大病。一曰實利主義，一曰模倣主義。……今當針對時弊提出兩口號。一曰文化教育，一曰人才教育。此兩口號亦相爲表裏。乃主以

國家民族，傳統文化來陶冶真切愛護國家民族及能真切為國家民族服務之人才。文化教育可以糾正新文化運動以來之一味模倣。人才教育可以包括時下科學教育專重實利主義之偏狹。

錢先生的意思似乎是特別注重高等教育與中等教育。教育的其他方面，似不在論議範圍。而他對教育的批評，却是一種概括的批評，可以代表一種批評的看法與注重本國歷史文化的精神。

謝扶雅先生的人格教育，雖則是抗戰以前的作品。但二十九年再印，却有其意義。其內容雖則是注重教育本質的研究，而且是偏哲學的；（書中詳列中國印度，西洋三方面的）人格理論亦即是人生哲學。但此時提出來亦有其時代的意義。再版序文上說：「抗戰以來，大家完全看過去所辦的教育根本陷入迷途。抗戰是一條新陳代謝的鞭子……然而國中普遍地在叫苦沒有人才！人荒！人荒！人究竟到那裏去了呢，辦了二三十年的新教育，結果賺得了沒有人才。……本書開宗明義便引堂堂地做個人一句話作為人格教育的真詮。教育是

樹人之業，不過過去教育所追逐的，大概只是「樹」而忘却了所樹之為「人」。既本無意於造就「人」，自難怪今日到處沒有人用了。現在國中應該都已覺悟到這一點，應該知道痛切懺悔，應該洗心革面，力矯前非，而以人格教育為教育的骨幹了！這是何等深刻的自責，或自我檢討！面積極方面謝先生以為「只有人可以造就人，只有人格可以養成人格。……人格教育是否已在推行，要憑一般教師人格的「重生」！這又是何等切實的說法。教育改革的「氣運」確實已在進行之中！

對於教育為根本的綜合的研究者當不止此所提出之若干種，但在此若干種著作，亦未嘗不可看出近年來的教育「思路」。

抗戰初年大家特別感覺到過去教育之缺欠。一方面是事求人不到，而且用非所學；一方面是深刻的感到應用科學之落後。各種幹部訓練除有特種任務者以外，一般的訓練班，不曾說明系統教育與現實之脫節。中國之抗戰既與建國大業不可分，大家不得不想到研討教育的本質。又不能不想到中國過去的教育精神與傳統，以及教育家的言行規範。大家



深刻認識教育的改造，不能忽略文化的傳統。過去大師的言行，實為今後教育之一指針。於是研討過去教育學說與陳述教育大師的著作，頗引起學者與讀者的注意。國立編譯館編選的四朝學案，或者最能代表此一傾向。

張其昀先生的中國歷代大教育家史路當是最早出版的。（民國三十一年初版）張先生說：

古來偉大的教育家，其教育學說都有精密的理論，一貫的教育系統，以構成其教育哲學。其言足為天下法，其行足為百世師……在目前建國時期，教育上許多根本問題，需要研究。從這些遺教中，涵泳體察實在可以得到無窮的啓發和鼓勵。……

張先生提出的是古代十二位教師。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王通、韓愈、胡瑗、程顥、程頤、朱熹、陸九淵、王守仁。

民國三十三年六月羅廷光著中國的大教育家出版。張先生的著作，似乎特別注重此十二位大教育家的「氣象」和精神。羅廷光先生則頗注重各人的教育學說。羅先生所提出的

爲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韓愈、胡瑗、程顥、程頤、朱熹、陸九淵、王守仁、黃梨洲、顧炎武、王夫之、顏元十五位。較張先生多明末清初黃顧王顏四位，減去王通一位。

王榕凱朱克文兩先生有中西教育家一書出版。其編制頗類以教育家爲綱的教育思想史。在中國教育家之部有老子、管子、孔子、墨子、孟子、莊子、荀子、賈誼、董仲舒、揚雄、王充、馬融、鄭玄、荀悅、徐幹、傅玄、顏之推、葛洪、劉彥和、王通、韓愈、李翱、周濂溪、王安石、張載、程明道、程伊川、朱晦庵、張南軒、呂東萊、陸象山、真西山、許魯齋、劉靜修、金履祥、許謙、吳草廬、曹月川、薛敬軒、吳康齋、胡敬齋、陳白沙、馮甘泉、王陽明、劉念台、孫夏峯、李二曲、張揚園、陸桴亭、陸稼書、黃梨洲、顧亭林、顏習齋、李恕谷、戴東原、章實齋、張之洞等五十七位。較之張先生羅先生所介紹爲多。

假使有人不完全同意三位先生的選擇，乃至於各家學說內容，那是可以討論的。但是對於過去教育大眾的精神學說之研究成爲一種思想的要求，是一值得注意的傾向。正如張

先生所說：「國民精神，煥發一新，才知道自己應該是中國人，對於固有的文化，回復自尊自愛的心理。對於外來的思想，復有寬宏接受的雅量」。

正如張先生所說，我們對於外來思想，有寬宏接受的雅量。同時我們的教育亦不能離開世界的潮流。所以介紹西洋教育學說的著作亦有若干種出版。王朱兩先生中西教育家的下編，即是介紹西洋自畢達哥拉斯，蘇格拉底以至於克善西台奈，等德普，杜威等六十人的教育思想。胡梅邨先生的現代教育思潮一書是應該提出的，尤有可以注意的是第五章世界教育思潮與三民主義教育思想的問題之提出。換言之，我們在希望創造新理論，在企圖綜合成新學說。

關於此點，有幾本關於各國青年訓練比較研究的著作，及西洋大教育家名著的翻譯，（如傅任敢先生譯孔米里斯的大教育學李培圖先生譯杜威的經驗與教育等。）以及西洋近來所謂「進步的教育」之研究均值得注意。「進步的教育」運動，國人為系統介紹者不多。拙作歐美的進步的教育，其英國部分已刊成都中央日報，姑備一格。

教育是實際活動；教育的研究亦其勢不能不注重實際問題。近年來此等實際問題最引起注意者一為學風問題，亦可以說是訓育問題，一為學術自由的問題，一為大學中學程度低落問題。一為純粹科學與科學技術問題，一為文化教育與技術教育之輕重緩急問題等等。各報章雜誌時有論文發表。大部是陳說意見的。限於篇幅，不克詳列。

學風問題亦即道德問題，頗有從事根本的研究者。姜伯韓先生（琦）的德育原理是一本極重要的著作。姜先生對於寫作此書之動機，不是針對學風問題立論的，但我們却認為是一種根本的研究。全書分十二章，材料豐富，說理明顯。對道德體系，道德實行政序，與道德之目的，均有闡述。姜先生另外有一本「訓育與心理」亦是值得注意的。

近年來社會教育與國民教育頗引起教育學人的注意。

社會教育方面，大家注意研究的有三項。一是確定社會教育的意義，一是計劃社會教育的行政，一是分析社會教育的內容。提供社會教育的作法。馬宗榮先生的社會教育新論，吳學信的社會教育論叢，趙冕先生的社會教育行政等是成書的著作。馬先生的社會教育

著作，不止一種，此一冊則是抗戰期中出版的。社會教育季刊與國立社會教育學院出版的「教育與社會及社會教育輔導等幾種刊物，關於社會教育之理論，頗多發揮。撰文者有陳立夫、劉季洪、鍾靈秀、陳禮江等諸位先生。本文作者亦有一兩篇關於社教意義的文字。一般的傾向，均認為社會教育以全民為對象，「為學校教育及家庭教育以外所施行的教育活動的總稱」，亦有以團體或集團為社會教育之對象者。社教內容則特別注意禮樂的方面，注重情意的陶冶。而對於社會教育與文化生活的關係，更加注意。

自新縣制實施以來，義務教育與民衆補習教育連合實施，謂之國民教育。政府推行國民教育甚力。關於此類研究大體注重實施方面。如郭有守、劉百川兩先生著國民教育；戴自俺、陳嘯天、孫懷璋三先生的國民教師手冊；楊汝熊先生的國民教育通論；傅志純先生的國民教育；衡濤先生的什麼是導生制與怎樣做導生；均屬此類。國民教育的實際研究似乎是在開發法令的意義，與說明應當如何實施方面較多。中國各地不免有區域性，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實際辦法頗不易得。

教育部國民教育輔導委員會出版的叢刊見到的已有近五十種。在實施上頗有參攷的價值，在研究上亦很重要。

鄉村教育運動爲近二十年來的一重要的新教育運動。抗戰之前鄉村建設與鄉村的教育著作出版甚多。近年來社會教育的動向與國民教育的實施極受鄉村教育運動的影響。在全面戰爭的要求之下，大家更感覺到基礎教育與基礎建設之重要。民衆組訓與縣政建設及地方自治成爲抗戰初年的重要要求。而此兩種要求的對象無疑是鄉村與農民。許多社會教育與國民教育的著作，其重心仍爲鄉村教育。莊澤宣先生的鄉村建設與鄉村教育，金翰海先生的著作，晏陽初先生的農民抗戰與農村建設，均爲有意義的著作。本書作者的鄉村教育文錄，鄉村建設與教育兩書亦是對此一類問題的初步研究。

我們於簡略陳述抗戰開始後七八年來的教育學研究之後，自知見聞有限，不免有許多遺漏與錯誤。或者有着若干極重要的研究，本書不曾提到。但我們希望大體的傾向不會說錯。我們正在對過去與現時的教育作檢討批判的工夫，期望教育能有適宜的改革。我們正在

研究，發現并發揚固有的教育精神，但發揚固有精神，並不一定是寄舊或復古。有生命的必定繼續發展；不適合教育的本質的要求或時代的需要精神，亦必不能保守得中。我們已確認教育與建設有配合的必要，我們已確認計劃教育之必要。但計劃教育當不是將一切教育都變為技能訓練。而是要在有計劃的社會分工建設之下，人人都有完成任務的道德知識與技術。教育的永久性與時代性得到一種動的平衡。國民教育與社會教育的研究，使我們一方面肯定教育範圍的擴大，一方面肯定教育之意義，要使整個社會成為教育化的環境。無最重要的一點是抗戰開始以來，教育學人對於民族民權民生的基本教育方針，已有明確的認識。

七年來的教育研究，在抗戰時期中國難的工作條件下，不能說沒有成績。今後一方面在全世界的新教育 流影響之下，一方面根據戰後本國教育建設的要求，大約教育學的研究，又必走入一新的階段。此將是我們所謂第三階段，我們迴顧過去，使我們對教育有無限的期待。

## 四 七年來的社會學

孫本文

抗戰以來，全國社會學者幾乎全數來後方從事於教學或實際工作。雖則戰時圖書設備略感欠缺，而同人研究精神並不稍受影響。且因戰時關係，多數學者除從事於學理研究外，更能對抗戰建國時期社會實際問題，作多方面的探討。故七八年來，全國社會學界顯然表示一種新的趨向：就是大家注意於社會學應用的研究，尤其是社會問題，社會事業，社會行政與社會建設的研討。茲將此短期間社會學界進展情形略陳如左：

一、社會學理論的研究 七年來社會學理論的研究，可從各方面觀察：（一）普通社會學方面，可以看到注重社會學知識系統化的趨向，如孫本文的學「社會學體系發凡」（三十三年四月）、「社會學的對象內容目的與方法」（三十三年二月）二文，以及「社會學原理」（大學用書增訂本（三十三年三月及九月））可為代表。此外孫氏所著「社會學的基本觀點



」，與「近時社會學上一種新理——與學說」(三十三年八月)二文，亦可補充此種趨向。

(二)特殊社會學方面，可以表明新學說的介紹與注重社會組織的趨向，如文化社會學方面有吳文藻的「論社會制度的性質與範圍」(二十九年)一文，費孝通譯麥凌諾司基著的「文化論」(三十三年七月)及費思著的「人文類型」(三十三年四月)二書，均為介紹功能派的比較社會學理論的，黃文山的「知識社會學與知行學說」(三十二年七月)一文，李安宅譯孟漢著的「知識社會學」(三十三年九月)一書，及岑家梧所著「論藝術社會學」(三十二年九月)一文，均為介紹新興的學說。此外注重社會組織的研究者有童潤之的「鄉村社會學綱要」(三十年)，韓雲波譯的「農村社會學史」，(三十二年)，寶季良的「同鄉組織的研究」(三十二年十二月)，龍冠海的「美蘇少年組織」(三十三年六月)等書。(三)社會營學方面，有姜蘊剛的「社會營學」(三十一年三月)，與陳啓天的「新社會營學論」(三十三年二月)二書。姜氏之書在闡明人類因弱而進化由誤而進步的理論。陳氏之書在說明國家立國根本的共同的國民理想。姜陳二氏均非專攻社會學者

，其言可略備一說。

二、社會問題的研究 抗戰以來對於社會問題的研究，大致可分為三期：初期大抵研究戰前問題，如李景漢的「中國農村問題」（二十六年），喬啓明蔣傑合著的「中國人口與食糧問題」（二十六年），都是根據戰前本國的材料研究的。吳澤霖葉紹純編著的「世界人口問題」（二十七年七月）全係根據戰前各國統計編寫的。稍後大家注意到戰時各種社會問題，勤搜材料，埋頭研究的大有人在。不過戰時各項資料搜集不易，正在研究尚未發表者當必甚多。其已發表者有陳長衝的「長期抗戰中的人口問題」（二十七年六月），吳澤霖的「抗戰與人口政策」（二十七年六月），克爾的「論抗戰以來人口內遷的影響」（二十七年），孫本文的「戰時大移民的重要貢獻及其調整問題」（二十九年十二月），「抗戰建國中之文化問題」（二十七年五月），「戰時社會統制的必要」（二十七年七月），胡鑑民的「中國之結婚年齡與民族生存」（二十九年五月），吳景超的「中國工業區位論」，（三十二年二月）費孝通的「戰時內地農村勞力問題」（二十九年七月），言心營

的「戰時女工問題」(三十一年二月)、陳定閔的「戰時家庭問題」(三十二年)等論文。最近一二年來，因抗戰勝利日趨接近，大家又注意到戰後各種社會問題的研討。中國社會學社第七屆年會，於三十二年二月舉行時，即以戰後社會建設問題為研討的主題。此外如趙晚屏的「戰後人口再分佈」(二十九年六月)，陳定閔的「戰後人口復元問題」(三十三年)，「戰後家庭問題」(三十三年)，及中國勞動月刊徵文研究「戰後中國勞工運動」，當選者有方玉麟周之南譚玉佐等。以上除前三種外，餘均為論文。其討論戰前戰時及戰後各項社會問題篇幅較長範圍較廣者，有孫本文的「現代中國社會問題」一書。全書約八十萬言，內容分論我國四大社會問題——即家族問題，人口問題，農村問題，與勞資問題。每一問題又析為若干小問題，合計全書研討的問題凡四十餘。已往各項比較可靠的調查統計材料，大致均搜羅在內。該書在研究態度方面，是以本國問題為本位，以社會學觀點為中心，以三民主義見地為歸宿。全書凡一千零四十四頁，分訂四冊，先後於三十二年七月至三十三年二月出版。此外統計局編輯的「中國人口問題之統計分析」(三十三年一

月)一書，頗多有價值的統計資料。

三·社會事業的研究 我國社會事業，自抗戰後社會部成立以來，始引起社會學界的特殊的注意。最近三四年來，社會學界同人的眼光，很少不注意及社會事業與社會行政兩方面。就社會事業方面的作品說，有言心誓主編的「社會事業與社會建設」(三十年四月)，馬宗榮的「社會事業與社會行政」(三十一年一月)，王克的「中國社會服務事業」(三十二年八月)，吳榆珍譯著的「社會個案工作方法概要」(三十三年一月)，鄒玉階宋思明合著的「醫院社會工作」(三十三年三月)祝世康的「三民主義與社會保險」(三十二年)，林良桐的「社會保險」(三十三年八月)，柯象峯的「社會救濟」(三十三年十一月)，陳凌雲的「戰時社會救濟」(三十三年四月)，及言心誓的「現代社會事業」，(三十四年二月付印中)等書。這些書本，除最後一種外，雖則篇幅都是很短，亦可以見到這幾年社會學界同人研究社會事業的成績。此外散見於各雜誌的論文，有孫本文的「各國社會事業概況」(三十一年十二月)，方奈何的「中國古代之社會事業」(三十一年十二

月），言心營的「社會個案工作的起源及其發展概況」（三十一年十二月），朱亦松的「社會事業之理論及其目標」（三十三年五月），陳仁炳的「社會事業的意義與分類」（三十三年五月），童潤之的「我國鄉村社會事業的一個重心——農會」（三十三年五月）等。

四、社會行政的研究 與社會事業有密切關係者為社會行政的研究。當社會部於民國二十九年成立時，國內研究社會行政的人，尙如鳳毛麟角。社會部當局曾組織社會行政計劃委員會，羅致國內社會學界同人，共同研討社會行政事宜。由是社會學界同人始加意社會行政的教學與研究。一方面為造就社會事業與社會行政人才，一方面為提倡社會事業與社會行政的研究，故近年來此類書籍與期刊，始漸見增多，如上述馬宗榮的「社會事業與社會行政」一書，比較為最早用社會行政名義刊行之書。其次，有陳續光的「社會救濟行政」（三十二年二月），曾友松的「戰時社會行政研究」（三十三年五月），中山大學社會研究所的「社會行政與社會事業」（三十三年五月），及社會部社會行政叢書第一種「社會行政概論」（三十三年十月）。此數書篇幅均短，惟最後一書內容較為充實。此書外

而標明孫本文等著。內容包括有關社會行政的論文三十篇。實際上係由張鴻鈞氏主編。當民國三十一年十月間社會部召開第一次社會行政會議時，曾由張氏約請國內社會學界同人分別撰寫有關社會行政論文一篇，即在當時各日報發表。此書所集三十篇論文，大都是各報曾經刊載過的。其第一篇「我們對於社會行政的意見」，係張氏主稿，再送由陳達等十人審閱，除其中略有數點經各人建議修正外，其餘一仍其舊。此文對於社會行政的使命，社會行政的基本信念，社會行政的推進條件，有明析的陳說，與張氏所著即本書第二篇「社會行政綱要」互相表裏，可作全書的綱領看。其餘陳達楊開道李景漢毛起鵠劉崇齡吳澤霖謝徵孚王政瞿菊農孫本文陸京士蔣旨昂龍冠海言心營吳榆珍李安宅壽勉成吳文藻范定九喬啓明程海峯陳文僊熊芷潘光旦林良桐喻兆明柯象峯等論文，均討論社會行政有關的一方面。彙合觀察，亦可看出現時國內社會學界同人對於社會行政的見解。

五、實地社會調查 我國社會學者對於實地社會調查推行已久。抗戰以來，後方各省所舉行的實地調查，亦復不少。其中有關於農村調查者，如費孝通的「祿村農田」(三十

二年十二月），張子毅的「易村手工業」（三十二年十一月），蔣旨昂的「戰時鄉村社區政治」，「黑水社區政治」（三十三年），社會部統計處的「北碚社會概況調查」（三十二年七月）等。有關於都市調查者，如蔣旨昂的「成都市社會機關調查」，（三十三年），社會部統計處的「成都社會概況調查」（三十三年七月）等。有關於邊疆民族會的調查者，如柯象峯的「西康社會之鳥瞰」（二十九年七月），吳澤霖主編的「民族學論文集」第一輯（二十九年十一月），吳澤霖陳國鈞的「鎭山黑苗的生活」（二十九年十二月），徐益棠的「雷波小涼山之僱民」（三十三年）等。有關於人口調查者，如陳達李景漢等主編的「雲南呈貢縣人口普查報告」（二十九年八月）等。此外如龍冠海主編的「社會調查集刊」，係由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社會學系學生所做的各種調查報告彙集而成，於二十八年十二月出版。

六、團體活動 我國社會學界的基本組織為中國社會學社。該社自民國十九年成立後，迄抗戰前夕，計曾舉行年會六次。抗戰後，於三十二年二月一二兩日，同時在重慶昆明

成都三地舉行第七屆年會，以戰後社會建設為討論中心。事前擬定「戰後社會建設綱領」，以為討論的根據。該綱領包括基本原則及實施條目兩大項。實施條目又分為社會組織社會福利社會服務，與社會運動四類，每類又分為若干小節。討論結果，以茲事體大，應從長探討，當另組委員會詳加研究，以期完善。

其次，中國社會行政學會於三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成立，係由社會行政人士聯絡社會學界同人組織而成。其主要任務在依據三民主義及國內環境，適應世界潮流，研究社會行政學以配合政府政策，共同闡揚三民主義社會政策，建立社會行政及社會事業等體制，培養社會行政幹部，藉運用社會力量，謀增加福利云。

其次，中國社會服務事業協進會於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成立，以「發揚服務精神，促進社會事業，改善社會生活，完成三民主義之社會政策」為該會中心目標。該會會員大半為從事于社會服務事業人員及少數社會學者。

其次，四川省社會行政學會於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成立，其宗旨為研究社會科學，



普及社會知識，討論社會實際問題，增進社會行政效率，培養社會工作人才，發展社會事業，改善社會風尚等七項。參加該會會員，大抵爲四川省社會行政人員及成都各大學社會學教授。

此外如中國兒童福利協會以研究兒童福利問題並發動社會力量推進兒童福利事業爲宗旨，於三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成立。參加者大率爲國內從事於兒童福利及教育事業的人士，與少數社會學者。

七、期刊的編印 抗戰以來，純粹研究社會學的刊物如中國社會學社的「社會學刊」，業因費絀停刊。三十三年春社會部與該社合作組織「社會建設」月刊社，編印「社會建設」，以研討社會問題，社會行政，社會事業與社會建設等理論與實際爲主旨。創刊號早已出版，第二期亦經付印。其次，爲「社會工作通訊月刊」，係社會部所編，專爲社會行政與社會工作人員交換心得砥礪學問的刊物，故所載材料以討論實際行政問題，報告實際工作狀況爲主。三十三年一月創刊，現已出至第二期。其次，爲「社會行政」季刊，係四

川省社會行政學會所編，以探討社會行政及其有關問題為主旨，於三十三年三月創刊。其次為「社會服務」週刊，係中國社會服務事業協進會所編印，於三十二年二月創刊，以闡揚社會服務及社會問題之正確理論為宗旨，出至第十五期改為月刊。又該會曾於三十一年二月出版「社會服務」季刊一期，惟以後未見續出。再次為中國勞動協會編印的「中國勞動」月刊，專以討論勞動問題為主，於三十年十一月創刊，現已出至第七卷第一期。此外國立社會教育學院所編的「教育與社會」季刊，曾於三十三年五月出「社會事業」專號一期。國立中央大學社會系曾主編「社會學研究」不定期刊，借「時事新報」學燈欄發表，於三十三年七月十一日刊行第一期，十一月二十日刊行第二期，以研究社會學的理论與實際為宗旨。

八、大學課程的修訂 自教育部於二十七年修改大學課程，頒行文理法師四學院分院共同必修科目表，規定社會學為社會科學必修科目四科之一，與政治學經濟學法學通論並重。繼於二十八年頒布社會學系必修選修科目表。復於三十三年十月修正公布，並於社會

學系中設社會行政組以便造就社會行政人才。

九、社會學名詞的整理 國立編譯館以整理科學名詞的譯名為其工作之一。二十七年春會由該館汪少倫氏搜集材料，並特約孫本文氏加以整理與補充。嗣經該館聘孫氏等二十五人為社會學名詞審查委員，審定名詞一千三百七十九則，業已付印。

十、大學專系的增設 七年來因社會部之成立，各大學為造就社會行政與社會事業人才起見，有添設社會學系者如雲南大學是；有設置社會事業行政系者如社會教育學院是；有恢復社會學系者如中央大學是；有與他系合併成系者如大夏大學的歷史社會學系是；有增設社會福利行政組者如金陵大學是；有增設兒童福利組者如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是；有添設社會學系者如貴州大學是。總之，抗戰以來，各大學社會學系殊有振興之象。

十一、總結 由上講來，約略可以看出，抗戰七八年來，社會學不僅未見衰落，反有進步的氣象。第一，社會學知識漸見推廣。以往習社會學者僅限於少數社會學系學生，近則各院各系學生修習社會學者漸多。第二，社會學理漸見系統化。抗戰後一部分學者頗

致力於社會學體系的研究，此為戰前所未見。第三、注重社會學應用的研究。已往研究社會學者大都注重理論的探討，抗戰後，尤其是社會部成立以來，全國社會學者無不注重社會事業與社會行政的研究，即使仍舊重視社會學理論的學者，亦對社會學的應用發生興趣。這可說是我國社會學界的一種新趨向。原來理論與應用，不能分離，只重理論而忽略應用，易流於空疏；只重實際而忽略理論，易陷於錯失。今後我國社會學的發展，自必遵循這理論與應用雙方並進的途徑，可無疑義。

(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 五 七年來之政治學

程仰之

七七事變已起，國族之生存感受威脅。迫於自衛，吾人遂奮起抗戰。吾人境廣民衆，利於久戰，且非久戰亦不可克勝頑敵。是以抗戰啓始，若干主要之學術文化機關遂西遷後方，以期在長期之抗戰中，研究工作不致中斷。自從機關西遷，學人遂分集後方，安心從事於各種研究。即以政治學而論，七年來之研究進展及其新的趨向，頗有足述者。且中國政治學會曾於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六日至八日在陪都舉行第三屆年會，集合各地政治學人於一堂，除專題討論外，并有講演與宣讀論文，各獻所得，各述所聞。斯時適值美國政治學會會員海登教授（J. R. Harden）在華，被邀赴會講演「美國近來之政治思潮」。平時欲集合多數政治學人於一堂以議論攻錯，已不易；今乃於戰時得之，實為學術界之一盛事也。

總觀七年來之此方面研究，約有四端可述。一為中國政治思想之史的研究。嘗考中國之政治思想，一開始便與西方各異其趣。此可就其產生的時代背景之不同而知之。西方之政治思想，創始於希臘。其時之希臘為城市國家，嘗人之政治觀乃面對此現實之世界發揮而成之者。中國則創始於春秋末葉。其時之中國雖列國林立，而宗周一統之局勢尚賴霸者之維持而未解體；嘗人之政治觀實面對此現實之世界抽繹而成之者。其後也，由古代而中古，而近代，西方的天下統一之時短，而分立之時久，中國則反是。故西方之嘗人，自古迄今，所為政論，多從「列國本位」出發，而注意國家主權之發揮，民族獨立之倡導，列國并存之期念，法律制度之尊重。中國之嘗人，則自古迄今，所為政論，多從「天下本位」出發，而想像大同之社會，唱議四海為一家，以尚文非攻為政經，賴人倫道德為治術。兩方着重之問題及其成長之體系既異，則究其發展，撮其精英，必有不可強同者。以前之治此學者，多不解此，而依賴於一己所粗解之西方觀念，以為印範，甚至不惜加以歪曲。觀其成就，而吾人獨立成長之思想系體遂失其內容，全盤西化，且淪為西方政治思想一

派一系之附庸矣。末流更藉此而誤解今日西方之思想，吾人之古昔已有之。於是遂得以放肆其復古之議論矣。夫吾人今日研究學術，方法必採取於西方，然假借他人之貌以圖改先人之容，則大不可。此種卑陋，有識之士近已察及，蕭公權教授即其一也。蕭氏於西方政治思想方面之造詣既深，復研究中國之政治思想甚久。同時對產生此兩大系統之政治思想之背景，亦有客觀的瞭解。故氏之分析中國過去之思潮，遂能深悉其內容，明察其演展，而不致受西方思想觀念之拘束。其所著中國政治思想史長編，拮英撮華，派系井列，自成條理，為斯學樹立一堅固之基礎矣。氏嘗論中國政治思想之起點與分期，雖其說不與吾人之所見盡同，然固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又氏之論中國思想史之明清時期，謂此時期之思想實窮極生變，自不得不另闢途徑，向新方面以前進。然明代以至清初不過略見轉變之端，除舊更新之大轉變，直至晚清，然後發動。蓋明清之初，種族思想以反抗異類之政權而昂揚。而中明以後，自由思想以反對理學之桎梏而發展。然其所據觀點，與含內容，仍自舊學中蛻化而來，終不脫前人之窠臼。雖知革故，未逮鼎新。及至太平天國崛起以後，

遂受西洋思想之直接影響，而與傳統之思想相抗，於是吾國人之思想乃作空前之轉變。雖其新思想中每接受舊學說之一部份，然斷不可因而疑其仍與二千年來之道統完全一貫。良以彼輩之採用舊說，皆按自立之標準。權衡在我，取舍從心。斯論平實而深刻，非歪曲舊說以就新思，或借託新潮而藉復古之倫所可知見者也。

二為中國政治制度之史的研究。清日戰爭既決，以一大帝國而敗於一小國家之手。頹喪之餘，省思其故，始知吾中國之政教亦已落人後。於是變法維新之運動乃起。此運動，由清末之改制開其端，及至民國成立，而改制遂煥然一新矣。現行之改制，大部分乃仿效西方，而一部分乃與前代深有關連。至若行政之實體，庶務之處理，則多習沿過去。是故吾人今日之改制雖為一新物，然亦承沿其舊實。惟不可以其承舊，謂即與昔時之物全同，良以今日之採取，皆按新立之標準而加修正，以適現代國之用耳。

現行之改制既與前代甚多關連，而吾人之前代復悠久，其間所見改制之演變又極複雜。知今觀古，則政制史之研究誠一不可緩後之工作。抗戰以前，已有一二學人試作研究。



近七年來，則參與此種研究工作便較多。其中，雖亦有一二可喜之成就，然多有不明制度與官制之分，不知政治與行政作用之別者，至其他方面之注意更不論矣。良以研究政制，最低限度必須明瞭政制不等於官制，且須打破歷代官制系統之拘束，始能下手。同時，則當着重其作用，而注意其實施。故此種研究工作，實艱難而繁重，非輕易之事，而可由一二人於三五年中草草所能告成也。蓋政制之包含甚廣，問題既多，必須分工，將無數之問題一一作有系統之研究。及至積累既多，認識既深，然後可得撮其大略，試為簡要之著作矣。否則，剽取一二資料，排列比附，舊貫是因，而無新見，雖多編作，有何用耶？

近來國立編譯館從事編輯中國政制史料會要，以期利便初學。此項工作，亦至繁重，然實需要。其編輯之進程序，由簡而繁，由易而難，法律與實施情況并重。先從法律方面下手，着重各級政府各機關之法定組織及其法定權力，而羅集其資料。再由此而深入其實際，刺取各方面之史實，原原本本，列陳比附，成為系統。此編之成，在學術上之價值

如何，現不能預判，然其必有便於初學，則可斷言。

三爲中國行政之研究。吾人平日所談論者，多爲西方之理論與事實，對自身之問題則未能注意。此誠最可恥之現象。所以然者西方之著述衆多，襲取頗易。若討論中國之問題，則不能如此方便。然少數有識之士固已注意及此。錢端升氏嘗與若干同志從事於此項——中國行政之研究。氏知此項工作，至大且繁，良非少數學人所能勝任，更非三五年中所能盡其事。必然由多數學人之努力，積多年切實之研究，始敢期望有所成就。故氏等之所努力研究者，限於各種行政問題之較重要，較易瞭解，較與前代（民國以前）無關連之部分。自期此工作成就後，再研究較艱難而與前代較多關連之諸問題。行有餘力，則更及較不重要之問題。因此氏等遂試作民國政制史。良以着手研究民國各行政問題之始，不能不明瞭民國中央及地方政制之大概也。此書中央與地方並重，舉凡民國二十五年來中央及地方各種制度，無論合法非法，俱有所述及。但亦有從缺者，如蒙藏等等制度，未及；而多年來共產黨在各處所採之政制，亦未及。又所偏重，在其法定組織與法定權力，至其

實際情形，則幾無論及。著者自云，凡此則須待進一步所作之研究中詳言之。惟此書雖屬初步之作，可議之處甚多，然其利便於初學之功，不可沒也。近來陳之邁氏所著之中國政府，亦前書之流亞。至於各種行政問題之提出，作專門之研究，舉凡法律的規定，與乎實際的狀況，皆一一敘述之，則尙待於今後。

吾人既知一國行政之關係於政治，實至重要。必須健全其組織，發揮其效用，然後一國之政治始可達到至善之景象。則今後政治學人應多努力於此方面，不僅爲理論之探討，更須從事於實際之研究，方有益補於吾國之政治也。

四爲民主憲政之研究。當納粹德國縱橫歐洲，英法不能對抗之時，民主政治一度頗受世人輕視。然自美國以拯救此受威脅之民主制度爲目的而加入戰爭，局勢一變。於是民主主義之勢力乃復昂揚，且有新的進展。多數之政治家，思想家，一致承認，欲根本滅絕法西斯主義之勢力，非世界各國均能民主化，實行民主政治不可。彼等以爲此次爭戰，已非帝國主義之爭霸戰，亦不僅限於保衛一國權利之戰爭，實係維持全世界全人類之自由和民

主，反對法西斯主義之侵略與奴役之戰爭，英人拉斯基教授（Harold Laski）曾以「新建設之性質」為題之對華播講中，解釋此次爭戰為一種「偉大的社會革命」。就其所于各國政治社會之影響言之，誠不為謬。此種新民主主義精神之具體的表現，即羅斯福總統所倡導之四大自由。必須每一國家之人民，均能享受此四大自由，然後一切反民主主義之惡勢力始可除根。

新民主主義乃溶化民族的民主，經濟的民主與政治的民主於一爐，而與孫中山先生之理想最相契合。中山先生之民族主義，其精神為兼愛，即今世人士所倡導之民族的民主，視天下為一家，而奴役與侵略之行動不應再有。其民生主義之精神為平等，即今世人士所倡導之經濟的民主，要人人免於匱乏，而剝削與不均之現象不應再見。其民權主義之精神為自由，即今世人士所倡導之政治的民主，把政權放在人民掌握之中，而專制與獨裁之事實不應再生。必須全世界所有之國家，所有之人民，能真實獲得此三種民主，然後各國才有和平實現。吾人由此而對中山先生之建國理想遂更得一種深刻之認識矣。

吾國爲一事事落後之國家。積五十年之不斷努力，始能推翻滿清之統治，始能解除帝國主義之束縛。今後吾人之民族問題已非民族之爭求解放，而爲境內各族之如何達到真正平等。必須在文化上，生計上，扶助各族之發展，而以公道遇之，始可得到真正之成功。關於此種民族政策，國人已多論議之矣。至於政治上與經濟上，則積傳之反民主之勢力仍多存在，未趨消滅。當此新潮澎湃之際，吾人已深受其影響，已據以評判自身之制度，而對殘存之惡勢力積極加以攻擊。吾人之政府已決實施憲政，然今日吾人所祈求之憲政非有其名，務得其實。真實之憲政，不僅在其所賦予人民之基本權利，而尤重在此種權利之得有保證。同時，政府的設施不僅要受人民意志之監督與制裁，而尤重在此種接受之出於誠意。總之民主政治之實行，需此憲法。但僅有憲法而不用，不誠意的用，則仍然不能成爲民主政治。凡此論議，皆證時人對民主政治之認識，已非復如昔日之爭其名，而能求其實矣。經濟的民主觀念比較政治的民主觀念發展爲遲。然在今日此一觀念在民主主義中已變成爲最基本最重要者。凡一國家必須達到經濟上之民主狀態，始可算一真正之民主國家。吾人均知

今日之中國必須工業化。然工業化後，人民之生活不一定皆得到安愉之保證。假若所有產業多集中於自私貪婪之少數人之手，多數人依然生活於貧困失業之狀態中，則此種新社會有何足羨之處？必須人人富足而有職業，必須如何控制產業以利全民，始可使一社會呈現安定和諧之氣象。此皆一現代民主國家之政府所應有之認識，所應負之責任。無論在理論上，在實際上，縱不採取極端之方案，然亦當立有合理之策略，以防止一國經濟畸形之發展，而配合政治上之進步，乃必然之事矣。

五爲國際政治之研究。此次殘酷無情之戰爭，幾徧及全世界，所予吾人之教訓實較上次大戰更爲深切。吾人由此而深知，自由的生存不是一國一族之問題，實爲一世界之問題。世界各族各國不能平等相處，善意合作，共存共榮，則世界之和平不可維持，而任何民族國家皆難得安甯。冀求世界人類之如何和平相處，遂爲政治學人專心致意以研索之問題矣。或據人性立議，或利教育教化，或從思想改造，或樹制度維繫，或藉武力控制，或重經濟合作；意見衆多，而目的則一也。據人性以立論者，謂人類本有合作之良能，是故要

求合作實爲天賦之本性。此可以東西之歷史中所表現之國際合作之事實證之。然在別一方面，則人類亦有自私之欲望，過分重視本身之利益，勢必犧牲他人。此最足以損害人類之合作，而國際間之爭端遂起。所以欲求國際之合作，必須消除人類自私之欲望。而主張以教育達到人類和平之論，遂持之有故矣。彼等謂從教育入手，乃一治本之方法。蓋教育所以化心，人心化一：重公道，棄私欲，善意遇人，誠心接物，則族與族不致妬忌，國與國可能合作。以此爲基礎，而世界始有真正之和平。然重理想之士則謂國際和平之難以持久，實由於納粹主義之作祟。所謂納粹主義乃是一種極端偏狹之民族思想，認定己族爲此世界最優秀之種族，而有奴役與統治世界之權利。此種思想亦非德人所獨有，多數強大之民族皆有之，惟其態度有顯有暗耳。既世界多數之民族皆有此種意念，則其不能接受人類平等相處之理想，乃一自然之勢。是以國際的民主一理想之宣倡，最爲今日所迫切者。所謂國際的民主，係指族與族間，國與國間，必須是自由獨立與平等的。天下爲一家，不論國族大小，皆一律自由獨立與平等，任何國族不能享有特殊之權利，不許有一國族處於其

他一國族之奴役統治之下。此爲一最可醫治納粹主義之思想，應盡力宣倡。如每一民族，國家，能具有此種國際的民主之理想，而後世界之糾紛乃不起矣。或又謂，此種思想之宣揚誠有助於人世之和平，然不樹立一完善之制度以爲維繫，則真正之和平終難持久。此種知見，在上次大戰中已湧興，而國際聯盟之組織卽所以實現此意念也。及此次大戰再起，更深感有此需要，而痛知舊日之國聯組織之不澈底，之不健全。若干人士遂注意於此制度，而力謀其改進。其中有主張加強充實國聯之組織，使成一新國際機構者；亦有主張廢棄國聯，而建立一具有新意念之聯合國者；更有主張完全放棄舊有國聯之意念，而創設一人類政府，形成一世界國家者。凡所論議，或從現實之基礎而推論，或據理想爲原則以申衍，皆能言之成理，足以代表此時代之新潮也。或又謂一種和平秩序之維持，武力是賴。吾人無論組織國際聯邦，或世界國家，必須具備權力，始可約束。而用以支持此約束之權力者，則非武力不可。國際之軍隊與警察之建立，誠不可缺少之物也。或又謂，人類之和平不可持久，其故實由於世界經濟發展之不齊，與乎各國資源分配之不均。一方有經濟高度發達



之國家，一方有經濟異常落後之國家；一方有資源過分豐富之國家，一方有資源絕對貧乏之國家。由於經濟力之有優劣，而優者乃凌劣者矣；由於資源分配之不均，而貧乏者則與豐富者爭矣。故欲求人類之可以平等相處，善意合作，必須扶助劣者，公開資源，使國家免於匱乏，免於恐懼。如此，則雖有野心家，作奴役與統治世界之迷夢，然安能得有機緣以實現耶？

凡此種種理想，不皆由於吾人之自發。然吾人亦頗能盡其所知，而貢其所見。非若從前對國際問題之冷淡，似不足以提起吾人之興趣。此實為吾人之一大進步。而七年來之抗戰，幾經險惡之波濤，使吾人痛感自身之命運與世界實息息相關，有以促成之也。

## 六 抗戰七年來之法律學

陳盛清

抗戰七年了。這七年以來，我們的學術水準，縱令不降低到一個怎樣可怕的程度，然而我們起碼可以不客氣地說：我們的學術水準，並未能隨着時間的演進，進到理想中應有的進境。抗戰七年來的法律學，自然也並無例外。

如果讓我們爬梳一下抗戰七年來的法律學園地，為便於說明計，簡直可以自抗戰第六年初即三十二年一月中美中英新約訂立時，劃分一個界限，這時期以前溯及抗戰初起是一個時期，這時期以後以迄現在又是一個時期。我們且先檢討抗戰初起至三十一年底——即第一個時期法律學方面的情形，次述三十二年以迄現在——即第二個時期法律學方面的情形，再次展望將來，提出幾點對於今後法律學方面的小小願望，然後再下一個簡短的結語。

自從抗戰初起迄中英新約的簽訂，這五年多的時間裏，法律學方面的現象，有如下述：

(一) 法律學之冷落，如果我們不健忘的話，我們總會記得，抗戰初期的立法院和司法院，曾被稱做冷衙閒署，落寞不堪！法律的製造所和執掌司法權的最高機關如此冷落，法律學界的冷落情形，也就不言可知。一般淺見者流，認為「軍事第一」「勝利第一」的大難下面，法律學無補抗戰於毫末，直把法律學當作承平時的點綴品，「治亂世用重典」，那是法律的應用問題，於法律學並非同一事。因此各大學的法律學系，其投考學生之稀少，為其他各系所僅見，即此一例，可概其餘。

(二) 法學界之飢荒，戰爭足以致斯文浩劫，阻塞文化的進步，幾為任何史學家所不否認。特別因為我們開運了燦爛之花的學術園地，滿布在沿海一帶，首先遭受戰爭的摧殘

，許多園丁們忍痛拋棄了辛勤耕作的工具和種籽。狼狽撤退，赤手空拳，回到西南大後方這貧瘠的學術園地，但憑他們這一點可憐的經驗，從事耕作，其收穫也就不難想像；法學界的飢荒情形，說來尤為慘痛。一部齊全的立法專刊，在立法院裏尚且要七湊八拚，居然只是僅有的海內孤本，立法院成立後所議訂各重大法律案的全部關係文書，踏破鐵鞋無覓處！各大學法律系，學生們多憑課室內口授筆記，作為其所研習的學問，參考書之供不應求，參考書內容之貧乏，更屬見慣不怪。某大學學生在數年前曾願出三千元之代價，徵購某刑法教授戰前在上海出版的一部刑法概論，要是在戰前，豈不令人詫為奇談？抑尤有言者，我們無法呼吸着海外法學界的新鮮空氣，更足以加重我們法學界的飢荒，這也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三) 法律著作之無出路，足足有五個年頭，抗戰後的出版界，我們要找一本法律新著作，幾如大海撈針一般困難！關鍵所在，倒不是法律學者停止著作生活，乃是法律著作的毫無出路。抗戰初期，小冊子占領了我們的出版界，法律學方面的小冊子似乎就未能引

起出版界的興趣；迨至小冊子的出版不能滿足一般人的求知慾望時，學術性的具有相當分量的著作，雖然吸引了出版界的注意，然在出版界的風氣這樣轉變以後，法律著作，依然有不勝落寞之感！法律著作無出路，法律著作沒有適當的市場，只好藏之名山，傳之其人，法律學之無進步，豈無故哉？

（四）法學期刊之停刊 抗戰以前，我們法律學的期刊，本來就如鳳毛麟角，不可多見，抗戰既起，連這稀珍的法學雜誌，也停止刊行，雖如中華法學雜誌在抗戰初期四五年間，也曾若斷若續地出了幾期，畢竟未能於過去四五年間，定期刊行，擔當起法學期刊的使命。法學論著，專門性的成分大，未必適合一般讀者的胃口，一般的或綜合性的期刊，因此也就不甚踴躍登載法學論著，欲期一般的或綜合性的期刊刊出法律學論著專號，其可能性更小。這纔使我們一般讀者，幾幾乎懷疑到這些年法律學者到底在做些甚麼，爲什麼看不到他們法學論著的文章？

（五）法學者之旁鶯 抗戰以後，也許因爲法律學者無力解決現實的中國問題吧？在

大時代中，無聲無臭，竟被擠到學術園地的冷僻角落裏，自嘆自樂。爲了物價的繼續增高，爲了收入的微薄，爲了生計的艱難，迫於生活，不能不旁鶩兼營。作爲法律學者代表的各大學法學院教授們，大多不能專心致志法學的研究，若非混身金融機關的大門，也必掛起律師牌從事律師業務，以裕收入。在重慶、在成都、在樂山、在昆明、在貴陽、在桂林……我們隨時見到大學教授們爲了代理當事人出庭或擔任辯護，不能不分割了他們治學的時間，出入公庭。其因生活困難而離開自己的崗位改行者，更且大有人在呢。

(六) 法學研究之空虛 我們很感激教育當局的盛意，抗戰以後，居然於國內各有名大學設置法科研究所五所，使一般大學法律學系畢業生，能有研究高深法學的機會。雖然法學研究生之人數，有如寥落的晨星，然可藉此獎進法學界的新細胞，提高法學的研究，其意實至善。不過我們於美中不足之處，對於這些法科研究所內容之空虛，却不能不認爲未尙盡合我們的理想，例如參考圖書的貧乏，研究生法學根據的平凡，够得上做指導研究教授者的星散各地，在在有待於改善，這是無庸諱言的事實。

(七)法律教育之失敗 法律教育之失敗，其由來也漸，初非自抗戰以後始。然抗戰以後，學校管理之不善，學風之凌替，設備之簡陋，師資之缺乏，視抗戰前固已變本加厲，而法律教育目標的錯誤，抗戰以後則更依然如故！我國法律教育，不脫條文主義的窠臼，法律學系的課程，大半為現行法律條文的註釋，抗戰以後，或以空襲類仍，或以學校播遷，或以教授們外有旁鶩，時時缺課，竟連條文主義的法律教育，猶未能謂為已盡其能事！各門課程，大多講授未半而學年已終，欲使向學諸生，窺知現行法律條文之全貌而不可必得，遑論作法理的研究？如此法律教育，欲期提高法學水準，豈不戛戛甚難？

為什麼抗戰以後五年內，法律學界竟有上述這些現象呢？依我們的分析探討，其原因有六：

(一)反法治的社會環境 戰爭之足以降低道德水準，原屬勢所必至，無可如何。我國自漢以來，獨尊儒家，法學家之言，為士大夫所不屑道，反映在政治社會者，也就是人治禮治而非法治。我國既有不學尚法治的傳統習慣，積重難反，流弊所至，所謂法律，幾

成爲良善者的桎梏，痞棍們的工具！法律只能拘束社會善良之徒，却被一般敗類作爲非作惡的工具。抗戰以來，隨着社會一般道德水準的低落，反法治的社會意識，愈益明朗化，馴至不可究詰！如此社會環境，法律學之冷落，理有固然。

(二) 法律與現實社會之脫節 法律與現實社會脫節，固不自抗戰以後被人覺察開始，然而近三十年來多半抄襲自外國的新法律，其與現實社會之脫節，却於抗戰以後隨着抗戰形勢的轉變而愈顯露其「馬脚」。抗戰以前，一般人的目光，集中在沿海幾個「洋化」的城市，未必盡能有所覺察。抗戰以後，政府西遷，一般人向大後方撤退，居處於這廣大山岳地帶的農村社會裏，這纔深深覺察到法學與現實社會之脫節。法律本是社會的規範，它既與現實社會脫節，自不能發揮其社會規範的效能，又何怪社會一般人之不重視法律學呢？

(三) 出版界之風氣——短視與膚淺 我們對於抗戰後五年內的出版界，決不存心譏罵，然而我們根據過去的事實，却不能不認定那個時期內，出版界一般的風氣，似乎犯着短視與膚淺的毛病。惟其是目光短淺，這纔要投社會之所好，一切以目前營利的算盤爲前



提；惟其是見解膚淺，這纔一度被小冊子占領了整個的出版界，無視學術水準的高低。法律學是專門意味比較濃厚的一種，照當時出版界的計劃，銷路似成問題，這就違背了營利的鐵則，何況關於法律學的著作，分量上又且超越小冊子的範圍，難怪其不能為出版界所歡迎了。

(四) 法學界之風氣——法律技術與法學理論的不合作 法律的技術常是法學理論的前驅，同時法律的技術也常是法學理論的檢證。隔離了法律技術的法學理論，是空虛的法學理論，拋棄了法學理論的法律技術，是跛行的法律技術。惟有法律技術與法學理論相互合作，纔是健全的法律學。可是，我們抗戰以後的法學界，似乎還是走着法律技術與法學理論不合作的老路。研究現實法學者只是鑽向法律技術的牛角尖去；研究理論法學者，又是走向法學理論的虛無鄉去；二者不相為謀，不能配合。終使法律學者在此抗戰的大時代裏不能意識地提供對症的良藥，解決現實的社會問題，而漸漸被人們所忘記。

(五) 文化交流之阻塞 學術無國界，也正和空氣無國界一樣。世界各國學術文化的抗戰七年來之法律學

交流通暢，這纔能誘致學術文化普遍的進步。抗戰以後，尤其是日寇掀起了太平洋戰爭的怒潮以後，我們和歐美文化交流阻塞，再也不能呼吸着歐美學術界的新鮮空氣。爲了外交或國際宣傳所必要，儘管我們可能由政府定購歐美盟國各著名書刊，然而我們沒有極充分的理由，要求政府於極端困難的情形下，爲我們定購歐美盟國各種法學新書刊。我們的法學界，就在這悶的幾乎要窒息的空氣裏，呼吸那僅有的氧氣，維繫我們一線的學術生命。

(六) 戰時經濟之劇變 戰時經濟的劇變，最受威脅與痛苦者，莫過於一般薪水階級。我們的法學者，都是薪水階級陣營中的列兵，對於戰時經濟的劇變，生活上莫不感受着切膚之痛。於是少數人不甘清苦，或則拋棄了學人的生涯改事他業，或則兼營律師業務，或則增加授課時間企圖略增鐘點費，大多數人更不能不分出治學的時間，幫同治理家庭日常瑣務。法學者爲了維持一家最低限的生活水準，於戰時經濟劇變的高壓下，讓瑣務或兼差侵蝕了他們寶貴的治學時間，豈非抗戰所給予學術界不可補償的損失？

民國三十一年一月十一日中英新約的締訂，撤廢了近百年來的不平等條約，

總裁認為是「國民革命的初步成功，即為建國工作真正的開始。」於是乎在「窮則變變則通」的社會發展底必然法則下，法律學界也隨着有一番新的氣象。近兩年來法律學方面的現象，有如下述：

(一) 法學會的重整旗鼓 中華民國法學會成立於民國二十四年第一次全國司法會議之後，揭櫫六大綱領；(1) 確認三民主義為法學最高原理，研究吾國固有法系之制度及思想，以建立中國本位新法系；(2) 以民生史觀為中心，研究現行立法之得失及改進方法，求與人民生活及民族文化相適應，並謀其進展；(3) 根據中國社會實際情形，指揮現行司法制度之得失，並研究最有效之改革方案；(4) 吸收現行法學思想，介紹他國法律制度，均以適合現代中國需要為依歸；(5) 發揚三民主義之立法精神，參證其他學派之優劣

以增進法界人員對於革命意義及責任之認識；（6）普及法律智識，養成國民守法習慣，以轉移社會風氣，樹立法治國家之基礎。隨着抗戰的爆發，剛誕生不久的中華民國法學會也在法律之冷落氣氛裏偃旗息鼓，直到民國三十二年八月間，纔舉行第二屆年會於陪都重慶，選舉第二屆理事監事，辦理會員登記，重振旗鼓。其尤值得稱道者，即於法學會內成立三種委員會：（1）三民主義法理研究委員會，（2）戰後國際法律關係研究委員會，（3）涉外法律問題研究委員會，分別從事於三民主義法理，戰後國際法律關係及涉外法律問題之研究。各研究委員會十五人至二十五人，其人由常務理事會推定之，並推定一人或二人負責召集，每月至少開會一次，必要時得開聯席會議。各研究委員會應於每三個月提出研究報告於常務理事會，必要時得限期提出報告。各研究委員會之任務有二：（1）關於研究問題之研討審查及法律之設計，擬訂事項；（2）關於研究資料之徵集譯述及報告刊物之編纂事項。雖該會理事會訂有各種委員會工作推進辦法，也許因為各研究委員會召集人公私職務過忙吧？各委員會集會的次數，似未能達到「每月至少開會一次」的要

求。然自各研究委員會的委員人選看來，其研究工作之非必能有所表現，似無問題。

(二) 法學書籍的印行 在法律著作無出路之際，據我們所知，曾有某法學院書籍富有學生，擬集鉅資刊印法學書籍，以滿足法律學系學生的求知慾。就在那個計劃尚未實現的時候，我們會發見有不少法律學者自己籌款將其歷年講學稿付印，例如胡元義教授的民法總則和破產法，梅仲協教授的民法要義，李祖蔭教授的民法概要……便是代表。也許是出版界漸漸發覺法學書籍的決非無銷路吧？近二年來，商務印書館既打破了承印十萬字以內書籍的成見，破例接受前司法院法官訓練所主編的各種法學書籍（原係法官訓練所用講義）陸續出版者，已有趙琛氏刑法總則，黃右昌氏民法詮解總則篇，劉含章氏繼承法，余覺氏強制執行法，夏勤氏刑事訴訟法……等。其他的法學專著或法學教科用書，例如吳學義教授的戰時民事立法，龍顯銘君的現行法上租賃之研究，李宜琛教授的日耳曼法概論及現行親屬論，吳傳頤教授的比較破產法……等，亦間有出版。大東書局異軍突起，恢復了出版人固有的業務，聘請梅仲協林紀東二教授主持法學書籍的出版工作，承印中央政治學

校司法官訓練班的法律叢書，陸續出版者已有余覺氏民事訴訟法實用、民事審判實務、破產法實用及劉鎮中氏民法實用價篇各論……等，其他的法學著作或法學教科書，例如朱觀氏的刑事訴訟法要論等亦且先後出版。同時，教育部大學叢書編輯委員會所徵求編定的大學法學教科書——即所謂部定大學用書，亦陸續交由正中書局和商務印書館出版，而其他出版人，如中國文化服務社和獨立出版社亦不無法學佳著問世，例如前者有張企泰教授的中國民事訴訟法論和郝朝俊氏的中國民法總則詳論……等，後者有蔡樞衡教授的刑法學等。可謂琳瑯滿目，美不勝收。至於法律通俗書籍的出版，亦為提倡社會教育普及法律智識所必要，聽說國立編譯館社會組，曾擬定編輯計劃，請由陳願遠氏分別約請法學專家，編輯通俗法律叢書，陸續付印，俾使各種有關法律之規定，能為民衆實際生活所接受，並願以樹立法治的廣泛基礎，此亦不失為法律學界應做的工作之一，自可謂為法律學界的另一種新現象。

(三) 法學雜誌的復刊 中華民國法學會於抗戰第六年復活後，即組織了編輯委員會

，由夏勤盛振爲二氏分任正副主任委員，以中華法學雜誌的復刊，作爲其主要工作。復刊後的法學雜誌，凡登論著，譯述，專載，判解研究，法訊，書報介紹與批評，重要法令及附載八欄，其宗旨所在，除中華民國法學會綱領所指示者外，在目前並應注意抗戰建國期中法治精神之發揚，與法治基礎之確立，以及復員後一切法律問題之探討。就內容言，復刊以來的中華法學雜誌，質量與分量，均相當令人滿意，足證近年來法學界人士的乳囊中，並非吸吮不出品質好和成分濃的乳汁來，只是過去四五年來，我們不會好好利用這可珍貴的乳源，至今想來，豈不太覺可惜呢！我們由於法學雜誌的復刊，對於法學界所引爲美中不足者，即是過去擁有相當歷史的法律評論以及前曾曇花一現的法治週刊……等刊物，過去也曾吸收了若干法學界的讀者，過去也曾使若干培植這些園地的園丁們流了不少汗，終於不再與國人相見了！還有那些可能產生的新底法學刊物，至今尙未與國人見面！難道我們法律學界的乳汁，只能喂養中華法學雜誌這一個獨生子嗎？特別於各法學研究所，我們得毫不客氣地加以責難，爲什麼在我們這些法學研究所中，輕易不讓人們知道一些研究

成績，爲什麼不把研究成績用定期或不定期之季刊半年刊，或年刊的方式與研究所以外的法律學界人士，共相切磋琢磨呢？

(四)法學資料的刊行 法學界的新資料，彷彿法律學園地上改良品種的新種籽一樣，假如法律學園地的一個園丁，不能播種改良品種的新種籽，或已有改良品種而不知，仍然播種舊品種的種籽，將必見笑方家和不能有良好的收穫，自屬當然。抗戰後頒布修改的法律，不下數十百種，這些作爲法學主要資料的新品種，未必爲法律學園地的每一個園丁所熟知，致使園丁們不能利用新的改良種，達到法律學園地增產造產的目的。主要原因，乃緣抗戰後法律案的公布，不能爲一般法律學者所共見共知；登載國府公布法律的國民政府公報，登載立法院議決法律案的立法院公報與立法專刊，登載與司法有關之法律的司法院公報和司法行政公報，專以各機關爲贈閱的對象，未必爲一般國民所能閱讀，何況這些公報，往往出版遲遲，竟有脫期至一年以上待公報與世人相見法律又經修改者，近年行政效率的遲緩，豈不令人痛心！作爲一般國民精神食糧的報紙，限於篇幅，對於新法律案



往往僅能舉其名稱，或連新法律案的名稱，亦割愛於新聞編輯之手。直到現在為止，我們在中央任何機關，找不到一部整齊的齊全的法律彙編，且連一部完全的法律目錄也不易見到，欲期法律學者能窺見法律的全貌，又談何容易？在無可如何之中，大東書局刊行的法令週報，總算給予法律學者以資料方面一部分的滿足，從法令週報創刊時——民國三十三年一月十五日起，嗣後中央及地方政府之各種重要法令，及司法機關之解釋判例該週刊逐期刊載，不失為今後活的六法全書，法律學園地上的園丁們，再也不會不知已有改良品種，仍然播種舊品種那樣的事了。至於司法院解釋彙編和最高法院的判例印編，也經各該機關整理編印，亦大足壓國內法學界喁喁之望。一年來這些法律資料的刊行，我們於檢討抗戰今天之法律學時，確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一件事。

爲什麼抗戰今天的法律學界，竟轉變的如此之快，又是一番新氣象呢？依我們的檢討，其原因有三；

(一) 環境的適應 劃時代的中英中英平等新約，恰巧結束了過去百年的歷史，寫出

了今後新歷史的第一頁。不平等條約撤廢了，領事裁判權和其他特權取銷了，時代給予我們的新環境，我們將如何去適應？把握時權，適應新環境，是全國上下人人共有的責任，法律學界的每一個細胞，尤應率先肩負起來。例如涉外法律關係的研究，便是適應新環境所必要而且刻不容緩之一舉，自非動員法學界人士不為功，要動員法學界人士適應新環境，法學會的重振旗鼓，自屬應有的一件大事。

## 七 抗戰七年來之經濟學

夏炎德

客冬歲暮，嘗爲本刊撰述「中國近三十年來經濟學之進步」一文，載於三卷四期。編者先生頃又以「抗戰七年來之經濟學」爲題，囑就近數年國內經濟學界之貢獻略加檢討，以策勵來茲。用意甚盛！竊思我國抗戰以來，公私大學與經濟研究機關備遭敵人摧殘，學者專家大多流離失所，隨政府轉徙內來，在異常艱苦之物質環境下，對於經濟學術之研究仍能繼續不輟；此種精神良可欽敬，所著成績尤足珍貴！則是篇之作亦感需要，並足以補前篇之闕漏，讀者且視之爲續篇可也。

在抗戰七年之中，經濟學界之研究側重實際問題，於理論部分較爲忽視，此乃戰時環境使然，其他各國亦有類似情形，初不僅我國爲然也。經濟學教本之著作，已出版者有張禹九氏之「經濟學原論」與朱伯康教授之「經濟學綱要」兩書。前書各編說理尙稱明晰，

惟較過去一般教本並無特殊之處；最後論消費時插入經濟繁榮之變動，貯蓄與人口論幾章，有如法儒基特（Carlos Cido）之經濟學，系統似欠整飭。後書以國民經濟學之觀點，注重國民生產力之發展，並重視國家之經濟權力，內容多取材於德儒威伯（Adolf Weber）等之著作，頗受歷史派學說之濡染。劉大鈞先生所編經濟學，聞不久即將脫稿，內容雖未獲窺其崖略，然以劉氏多年學識與經驗之累積，意其必為成熟之作。李炳煥先生正著「經濟學新論」，思以己意建立一經濟學新體系，教育部部定大學用書委員會，年前即約葉元龍先生與著者擔任撰著「經濟學原理」一書，業已表示接受，彼此數經商討，頗擬最近年經濟學上之各種收穫作一總結，以應國內學子之需要，工作正在進行中，以篇幅較鉅，尚須相當時日始克告成。

我國經濟學界之著作，目前固未脫除先進國影響，而達於創造時期。然年來各家取舍，並參酌本國國情，觀點頗多進步。王亞南氏謂國內流行之經濟思想，充滿奧國派之氣氛，以為中國經濟學書籍多承襲美國，而美國書籍多承襲奧國派，殊非知己之論。蓋奧

國派思想在美國既無大影響，而在國內經濟學界握有支配勢力者為新古典派而非奧國派思想也。許滌新氏揭穿德奧全體主義經濟學之奧秘，間接實予國內斯班（Othmar Spann）派信徒以有力之打擊。樊弘先生致力於資本理論之檢討，陳振漢先生從事美國經濟史之專題研究，俱有相當心得，曾在英美著名經濟學雜誌發表論文。李劍農氏之中國經濟史講義，對於史料能加考據工夫，雖本唯物史觀立場，而解釋全憑事實，不泥於刻板公式，頗堪我人稱道。中央研究院余漢昇君在該院集刊發表論文多篇，討論中國經濟史上之若干專題，以極小之問題而集豐富之材料，宜有良好之成績。且以一助理研究員而出此，尤可貴已！

過去國內外經濟學者，對於經濟制度大多忽視，當此世界文明激變之際，各種經濟制度之優劣得失，與夫我國經濟制度應採何種路線，實大有研究之必要。著者有鑒於此，年來頗加致力，所至之處均提倡研究，曾先後於川中數大學設專課講授。同時略以所見草為論文發表。國內學者對此似較前漸漸注意，論著亦時有所見，中以祝世康先生所著尤多。

陳伯莊氏曾一度赴蘇考察，歸後著「蘇聯經濟制度」一書，篇幅雖少，取材甚精，分析亦具眼光，彼回贊美彼邦之制度，但本身仍篤信民生主義，意在節取其方法，以助民生主義之實現。張君勱氏在國內獨樹國家社會主義之旗幟，在其所著「立國之道」第三篇，討論中國經濟建設。對於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兩皆排斥，自己則為一調和派，主張一面確認私產，一面確立公產，均置於國家制定之統一計劃下，由國家與私人分任建設之任務。其他政黨首領，過去單着眼於政治者，今對於經濟制度與政策均甚注意，觀其所發表之言論文章，可以概見。外人之著作：匈牙利瓦爾加（Ludovik Varga）所著「兩種制度」，早由祝百英氏譯，以社會主義者之立場將社會主義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作一比較分析。瑞典作家曼克（Frank Munk）所著「武力經濟學」，徐宗士先生已為譯出，以作者身歷之體驗，揭發納粹經濟制度之黑幕，倍見親切。美人羅克斯（Ludovik）與傅特（Hot）合著之「比較經濟制度」，已有陳瘦竹氏之譯本，比較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與合作主義各種制度，內容蕪雜，供給材料則有之，無中心思想可言。

近年經濟文獻，頗多遊理論，制度與政策揉合討論。一般趨勢傾向於民生主義經濟學之建立。其中最足以代表者莫如蔣委員長之「中國經濟學說」。委座以國家元首之地位，軍政黨務叢集於一身，而復能整暇建樹經濟理論之系統，其用心可謂深遠。此著累萬數千言，由侍從室印送若干份，尙未正式發表。中心意旨在宏揚我國先哲之經濟學問，黜斥國內流行之自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兩派學說，以「樹立獨立自由的經濟思想」。彼之經濟學定義曰：「經濟的原理，就是經世濟物的道理，亦就是國計民生的學理。簡言之，經濟學即致國家於富強之學，……即建國之學」，繼謂經濟學之目的在乎「國家以最小的時間與精力；本於文化的遺傳，依於科學的方法，發揮人力地力與物力，至於極高的限度，用之於民生與國防」。此義似廣而實際，蓋取我國昔儒經濟之義，注重其政治上之運用，作為建國之準繩，彼指出中西經濟學說根本之不同；在乎前者以理性為本源，後者以欲望為本源；前者以全體為本位，後者以個人為本位。彼因見中國產業猶未發達，私人資本家在國際競爭下不易發展，亦無階級鬥爭之客觀條件，故斷言自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

社會皆不可行。彼自己之思想則一本於中國正統的經濟道理，並將此種道理歸納為下列三項：（一）經濟以養民為本位，（二）經濟以計劃為必要，（三）民生與國防之合一。按此三點乃直接繼承中山先生之教義，而中山先生之教義乃融合近代各種進步之學說而成，得之於我國先哲學說者實少。我國先賢於文化哲學方面之創見固多，而其經濟思想之合乎科學而且適用於今日者，誠不可多得。雖然，對於若干只知一味盲從外來成說，而不知本國傳統與環境為何物者，此著所言，終不失為對症之良藥。至於養民，計劃經濟與民生國防合一三點，自屬至當不易之論，可為經濟建國之指導原則，宜以懸之國門使國人共曉，並協力促其實現者也。

在自今經濟學界，從事闡揚民生主義者頗不乏人，中以祝世康先生工作最力。彼為民生主義經濟學社之組織者，發行雜誌出版叢書，對於民生主義似有統系之研究計劃。其代表著作「民生主義與世界改造」一書，內容淹博，條理井然，著者熟習近代社會經濟思想文獻，故能判明民生主義在近代思想與制度中之地位；惟其中嵌入不少中國哲學概念，反



使所言暗晦，並使全書蒙玄學之色彩。趙蘭坤先生認為民生主義經濟學可自成一體系，與資本主義經濟學社會主義經濟學鼎足而三，擬從學理方面加以解釋。立法院中之經濟學者，如陳長蘅，樓桐蔭，吳尚鷹與陳伯莊諸委員，皆為民生主義之信徒，各以闡明並宣傳民生主義為職志；「中山文化季刊」即常刊載此類文字。陳豹隱氏原以介紹馬克思經濟學說馳名於時，今已改宗信仰三民主義，在近作「民生主義經濟學之特質與體系」一文中，列舉民生主義經濟學之基本概念為九點：（一）民生史觀，（二）以養民為目的，（三）從經濟法則出發的計劃經濟，（四）合理的統制經濟，（五）和平的一次產業革命，（六）澈底的錢幣制度，（七）各取所值的社會政策，（八）永久的經濟繁榮，（九）民生與國防之合一。惜此等分類標目，概乏充分之解釋，內容因嫌空泛；且間有錯誤之處，如各取所值係分配原則，決非社會政策。永久繁榮一點，中山先生遺教中並無指示，作者亦未提具避免恐慌之辦法，祇存一空虛理想，實覺不着邊際。上列各家不論所見如何，於經濟學俱有相當素養。而時下有不少討論民生主義之文字，對於經濟理論既無基礎智識，對於

民生主義又未真正了解，徒襲取總理總裁之片斷教言，作空洞之諛揚與宣傳，教條主義流行，非但不能發揮民生主義之高尙理想，反使民生主義成爲庸俗濫調，此種膚淺幼稚之病，亟需予以糾正者！

我國產業落後，經濟建設乃建國中最重要之工作，尤爲各方視線所集中，在戰時此種論文特多。如對於工業與農業之比重，重工業與輕工業建設之先後程序，國營事業與私營企業界限之劃分，節制私人資本與發展國家資本，利用外資，以及應行建立之產業制度等問題，各方咸反覆討論，不厭其詳。國民經濟研究所在劉大鈞先生指導之下，研究中國工業化問題已歷年所，在戰時工作繼續進行（最近已停辦），製有種種調查報告，惜多油印，外間少有流傳，工業化叢書八種，分由專家執筆，則不久可望刊行，吳景超先生以社會學家出身，近年轉而致力研究經濟，雖缺乏理論基礎，但於工業建設則頗有心得，二十七年曾刊行「中國工業化的途徑」一小冊，不久之前又將數年中論文集爲「中國經濟建設之路」一書，內容先檢討過去辦理工業失敗之原因，後提供今後建設之意見，取材與立

論一以事實爲本，無空泛之論，爲其可貴之點。高叔康氏所著之「戰時經濟建設」，對此問題作一般性之敘述，並無特殊見解可言。陳伯莊氏之「經濟五論」，係集討論經濟建設之論文五篇而成，本民生主義之原則，分論農業、工礦、交通等問題，並主張造成健全的士人階級，領導國營事業，以爲新社會之安定力，可謂得其要領，蓋公營事業若無廉能之智識階級主持之，而欲收良好之效果，是直南轅而北轍，烏乎可得？

今日之戰爭爲一總力戰爭，經濟力之強弱更爲決勝之要因，故最高當局有「三分軍事七分經濟」之指示。自此次戰爭發動以來，戰時經濟問題始終爲各方所注意，軍政機關特設研究部分，各大學，各銀行與私人學者，無不加以研究，報章雜誌論文及小冊一時如雨後春筍，不可以數計。討論之方面甚多，要以財政，通貨與物價諸問題爲中心；對於其他國家之戰時措施，可資我借鏡者，亦多報告與介紹。然成本之鉅著則不多觀。吳克剛先生所編之「戰時經濟」，蒐羅材料最爲豐富，全書達四十萬言，內容包括生產，消費，貿易，運輸，糧食，財政，幣制與金融諸部門，幾全取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歐美各國之材料，

此次戰爭之材料，概未列入，蓋此書猶於二十七年出版，時歐戰尚未發生，中國部分亦全付缺如。張天澤氏所著「戰爭與經濟」，篇幅較少，亦以前次歐戰之材料為主。董問樵氏之「國防經濟論」，爲此方面一完整之專著，內容理論與事實並重，上篇論國防經濟靜態，下篇論國防經濟動態，大多取材於德人著作。中國戰時稅制與金融管制，朱僕與鄒宗伊氏各有專書敘述，在此次戰爭中，我國以幣值變動與其他關係，物價問題最爲嚴重，各方討論與獻議亦特多。中央銀行經濟彙報曾就先後所載論文三十餘篇，彙集爲「物價問題叢刊」，重加刊行。伍啓元教授對此頗見關心，曾先後著成「物價統制論」與「目前的物價問題」兩書，並聯絡西南聯大其他教授於報端時有所建白，至爲社會所注意。政府對此問題如不能切實解決，則未來演變頗爲可慮，經濟學界難安緘默，又爲必然之理。

土地與農業經濟之研究，雖在戰時，仍能照常進行。土地問題之研究，以地政研究所爲中心，該所繼任中央政治學校地政學院之工作，主持研究人員如蕭錚，湯惠孫，祝平與萬國鼎諸氏，均爲前該校教授，服膺中山先生平均地權之教義，有志於理論與實施上作

進一步之研究，並促其實現。該所編印之叢刊，除各家土地問題與政策之著作外，尚譯述土地農業之名著。已有數種刊行。「人與地」半月刊，自卅年初發刊以來，迄未中斷，近更擬編輯地政常識叢書，已出「平均地權與土政改革」一種，為各家論文之匯集。祝平氏之「土地政策要論」最近業已出版，此書係根據著者在歐考察與體驗之紀錄，對歐洲各國土地改革多所評介，於中國戰時與戰後土地政策，亦有意見提供。美人伊黎（Richard T. Ely）博士與魏爾萬（G. S. Wehrwein）合著之「土地經濟學」（Land Economics），乃一九四〇年之新著，較舊著（伊黎與Mort-house合著）已面目一新，經由李樹青氏譯成出版。金陵大學農業經濟系在美籍教授卜凱（N. Josiah Buck）氏指導之下，對於四川省農村經濟狀況，作有調查報告印行。農業經濟方面，許璇氏之遺著「農業經濟學」尤稱佳著，著者對於此道頗有素養，書中除學理之外，頗多事實參證，並注重本國農業問題，其所建議之實際政策，亦多獨到之見。可供施政者參考。梁慶椿氏於農業經濟學之提倡與研究，均甚積極，惟發表者多屬短文，成本新著猶未見及。德國被恩大學勃林克曼（Theodor

Brian Knaann) 教授之名著「農業經濟學」一書。英、俄、日諸國均有譯本，茲已由中大劉慶雲教授譯成，不久當可問世。劉氏以農業經濟學雖為一般經濟學之一支，但其本身頗多特殊性，故擬從經濟思想史中抽出農業經濟思想之部分，加以專門研究，並開一專門學程講授，此項工作猶為經濟學界之新嘗試，苟能整理出一體系，實為經濟學上之一種新猷。

財政學方面之鉅製，戰前出版甚多，戰時則多短著，周伯棣之「租稅論」，幾為僅有之一種。貨幣銀行之著作，楊端六教授之一種，內容似較陳舊；褚保一教授所著取材新穎；對時下各派貨幣學說均有述評，惜現祇為油印講義，以著者持重，一時尚不願遽付鈔圖，中國農民銀行近輯各家著述，印為「近代金融學說」，介紹克恩斯 (Keynes) 霍曲萊 (Howrey) 哈葉克 (Hayek) 與克納普 (Knapp) 諸家理論，可暫為讀者補此缺憾；惟缺少斐休 (Fisher) 凱塞爾 (Cassel) 與阿夫達里翁 (Attalion) 諸家理論，則為美中不足。姚慶三氏所著「現代貨幣思潮與貨幣制度之趨勢」，為其數年中心得之作，但後方極少銷行。對於戰後幣制問題，伍啓元教授曾作短著刊行，注重各國貨幣之合作。馬寅

初先生年來息影歌樂山，潛心著述，聞其新著「金融新論」業已脫稿。楊蔭溥先生之「中國金融論」，聞在改訂，程紹德先生之「中外金融市場」一書，編著已久，以氏對於金融理論與實況之賅通，以及著作之矜慎態度，內容當有可觀，甚盼其能早日完成也！

對於國際貿易，褚葆一教授年來致力甚深。其「國際貿易」一書大體已經告成，理論方面除介紹古典派與新古典派外，對於俄林（Ohlin）哈伯勒（Haberler）與瓦奈（Viner）新興諸家學說亦有評述。彼認為保證政策仍有存在之理由，但嫌過去李士特（Lieser）之（*ok List*）之證據不足，另據當代學者羅拜茲（Robinson）與張伯凌（Chamberlin）之不完全競爭或獨佔競爭之理論加以解釋，自較前者為有力。貿易委員會章友江先生，對於此道致力亦勤，時有短文發表，其成書者有「統制貿易制度」與「商約論」兩種，敘述尙稱明晰，惟缺乏獨到之見解耳。

戰事發生以後，經濟雜誌非但不減少，反有增加之勢，此為始料所不及者。中國經濟學社編行之「經濟學季刊」，向為此方面之權威刊物，去年該會舉行年會時雖決定復刊，

惟以經費不易籌措未果。民生主義經濟學社編印之「經濟論衡」，為新辦之綜合性刊物，創刊號內容較為精彩，第二期後質量均不如前，尙有待於努力改進。中央大學社會科學季刊與人文科學叢刊，間有有價值之經濟論文發表。中國經濟建設協會所辦之「經濟建設季刊」與另一種「新經濟」半月刊，皆以提倡中國經濟建設為宗旨，作者與作品尙能維持相當水準。「財政評論」為戰時崛起之重要刊物，內容以討論財政金融為主，已享有廣大之讀者。郵金匯業局發行之「金融智識」，亦為新興刊物，篇幅甚多，材料亦稱豐富。「中央銀行經濟彙報」出版已有十餘年歷史，始終未曾間歇，所出專號甚多精采。中國農民銀行出版之「中農月刊」，注重農業金融。他如四川省銀行與廣東省銀行均有經濟季刊之刊行，以鉅大之篇幅出現。貿易委員會出版之「貿易月刊」注意出口貿易與商品之分析。中國農民經濟研究會出版之「中國農民」，為中國土地與農業問題之專門刊物。去秋成立之中國國際經濟協會，發印「國際經濟彙報」，選載友邦有價值之經濟文獻，為國內唯一之英文經濟刊物。李超英與李炳煥兩氏合辦之「國防經濟」，已籌備經年，最近亦有出



版消息，當此紙張與印刷異常困難之情形下，經濟刊物竟如此欣欣向榮，實令人欣慰不已！

以上所述，以個人之見聞為範圍，滄海遺珠，知所難免，不敢謂戰時經濟學界之貢獻悉備於是，平心而論，以戰時而著有如此之成績，亦可以無憾。在國內各種社會科學中，其進步之速，實未有如經濟學者，歷史、社會、政治、與法律諸學，均瞠乎其後，此蓋經濟問題本身之重要，與大眾需要解決之迫切，有以致之。推戰時之著作大抵平平，其有特殊創見者不可多觀。而一知半解之論，以及似是而非之說，則所在多有，出版界之缺乏鑒別力，學術界之缺少嚴正批評，實為一大原因，同時戰時一般研究機關圖書設備之不完全，外來新書之難得，以及國內正確資料之缺乏，亦為治學之重大障礙，此皆為戰時環境所限，一時無可如何者，然以今日經濟問題之重要，學者之衆多，與研究精神之熱烈，祇須戰事平定，學術機關恢復常態，則戰後經濟學進步之速，必可遠過今日，可斷言也。

## 八 抗戰以來中國史學之趨向

徐文珊

空前的戰爭，造成中國空前的艱難，也造成中華民族復興的契機。由於這次變亂，使一切都得到新生的機會。雖然整個國家民族陷於大患難中，但並不能阻住各方面的進步。學術是民族靈魂的具體表現，同時也是領導民族的明燈，最能表徵民族前途的興衰。我們泛觀整個學術界，雖尚不能達到理想，但已足徵象國家之有救。因為整個學術界都是進步的，且其趨向是一致的。

本文單論歷史。抗戰七八年來，歷史學術頗見進步，其較可稱述者，有左列各端：

### 一 目標趨向於現實

抗戰七年，雖然擾亂了歷史學術正在進展中的步驟和原有的秩序，但新的方向和新的

中心，却因此建立起來，新的作風也就此造成。那就是，一切爲國家，一切爲民族；眼光由故紙堆，或書本上，放開到整個現實上，雖然歷史學術離不開故紙堆，離不開書本，但眼光却必須放開到面前的現實上，目標必須放到國家民族上。這是面前的事實逼出來的進步。我們目擊身受的教訓太可怕了。國內學人接受了這一教訓，殊途同歸，不約而同的自願走向這一個大目標。這是值得高興的一件事。

歷史是一面鏡子，民族遇到空前大難，於是大家想起來照鏡子。這並不是說從前不想照鏡子，而是說，需要沒有現在的迫切，感覺沒有現在的普遍而深刻。因此，中華民族抗戰史（陳安仁，商務）中國歷代興亡鑑（汪嘯凡，拔提書店）中國歷代賢豪傳（教育部編，中央宣傳部印）中國名將傳（王敬，拔提）……等書，如雨後春筍的出現了。這都是站在國家民族立場，極力想從歷史中找尋自救的途徑，掘取更切實有效的教訓和資鑑的著作。更具體點說，假如沒有此次抗戰，這些書是不會產生的。現在我們所珍視的不是限於這幾部書，而是這種心情，這種覺悟，和這種作風。

其實上述事實，不過舉隅。基於這種觀念而蔚成的新的歷史風氣，正不在少。撮舉數要端於后。

第一、傳記文學之發達

有史以來，中國傳記文學的發達，未有過於今日者。無論政府機關，私人著述，出版家，都肯破釜沉舟的大規模編著，印行。文言的，白話的，通俗的，典雅的，綜合的，分類的，合刊的，單行的，……種種不一，各式俱備。舉其較重要的，如潘公展印維廉主編的中國名賢故事集，顧頡剛師主編的中國名人傳，上舉歷代賢豪傳，中國名將傳，以及商務，中華，世界各書局，也都有成大套的傳記叢書。並且銷路均甚暢旺，以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第二、歷史演講之盛行

近年關於史學之演講有兩種作風：第一為學術性演講，各學校機關團體多行之，以中國史學會，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為多，曾合辦史學講座多次。第二為通俗歷史故事演講。

以黎東方先生開先河。黎氏以生動有趣之詞令，講述歷史上之人物或故事，極爲一般人所歡迎。雖演講售票，（由知行學社主辦）然聽衆並不因此而減少，每次皆座無虛席，此固由黎氏之學問博洽，詞令態度饒有風趣所致，但一般人之愛好歷史，以及歷史適合民族需要，亦於此見其一斑。

### 第三、歷史劇之盛行

舊劇固十九爲歷史劇，由來已久。新興之話劇，則一向以現實爲題材，二十多年的話劇史，很少以歷史爲題材的作品。但抗戰開始以後，忽然傾向到這方面，出現不少歷史劇，並且都會上演，極受歡迎。較重要的如楊村彬的清宮外史；吳祖光的正氣歌；胡春冰等的黃花崗；于伶的大明英烈傳；冒舒溼的董小苑；陳白塵的石達開；郭沫若的虎符，金風剪玉衣，……等。這都是話劇用歷史題材的實例。在戰前是沒有的。至於新型歌劇和舊型平劇也有新創作。前者如顧毓琇的蘇武；王泊生之周頌；後者如徐筱汀之陸文龍，收復兩京等。這些劇本的編，導，演出，是否成功，是另一問題，此處不論，我們所重視的，乃

是這一新趨向之形成，新作風之開創。謹在此預祝這一趨向繼續發展，並且更普遍，更深入。

## 二 史觀之漸趨一致與進步

一提到史觀，大家便會想到唯心唯物等等烏煙瘴氣的一大套。其實真理並不是唯心，也不是唯物，而是完整不偏頗的一套。由於抗戰的教訓，以及歷史學術演進的自然結果，逐漸趨於以全民生活為歷史動力的看法，慢慢一致起來。這在歷史學術本身上，是一種重大進步，應當珍視。

此外，從另一方面看歷史，一般的總不免於機械的，固定的看法。認為是無機的，頂多是有機的，但現在則邁進到超機的階段。這並不是說史家在故弄虛玄，出奇立異，而是對這生龍活虎般的歷史，不能用機械的眼光去看，而必須能退出圈子外，去作前後縱貫的觀察工夫，即不只能入而察之，又必能出而觀之，才能得到其超乎有形事物之上的機運，也才能看出它的氣魄和勢派來。讀歷史就在能否得出這種氣魄和勢派來。工夫固必須一點

一演由史料上入手，效用則需要以超機的看法，求其得失興廢之故，以及已然未然的大勢所趨，能這樣超脫的觀察運用，才能真正得到歷史的功用。

由無機的看法，到有機的看法，是一種進步，這是抗戰以前的事。由有機到超機，又是一種進步，這是抗戰開始以後的事。

因為用超機的看法看歷史，所以把歷史當作藝術看。人常說人生是一種藝術，這樣說，便也可說歷史就是藝術。欣賞藝術要放到一個適當距離去看，亦即是說，要退出圈子外去看，觀察歷史，也同樣要放到一個適當距離去看。這種看法，過去是沒有的。現在雖還未能普遍，但却已有相當力量。

### 三 關於民族起源流行觀點之一致

由於地下發現之有力物證，中華民族起於本土說，在戰前已經成立，西來說已失其存在價值。但這一學說成爲每個國人的信念，普遍而堅定，則是抗戰以後的事。

由於中國的地廣人稠，分佈在各地的同胞，受自然條件的限制，有時又加以人謀之不

感，遂致在心理上有此疆彼界的隔膜。又加敵人之挑撥離間，乃真像有甚麼種族上的界限。但這明明是白晝見鬼，在七七以前不久，（若寬泛一點，也可納入抗戰以後了，）傅斯年先生已有「中華民族是一個」，載天津大公報。抗戰初起，又有顧頡剛師「中華民族不可分」載昆明益世報，用熱烈的情緒，正確的事實，喚醒同胞，以剷除團結抗戰的心理障礙。從此以後，史學界的研究方向，更朝這方面努力。等到三十二年 蔣主席撰著「中國之命運」，只輕描淡寫，用「宗族」二字稱謂國內各民族，無形中便把大家心理上隔膜打破，立時覺得親近起來。隨着便被普遍使用，不待解釋而大家都覺得彼此是一家人了。這一舉動，影響歷史學術，也影響民族心理，關係非常之大。

#### 四 史學研究之進展

歷史學術之研究，並未因抗戰而間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都在遷地繼續研究。各大學教授，各地史學專家也都在分頭努力。並且有很多書刊出版。假如不是戰時物力艱難，印刷不易，更將有大量的書刊問世。



歷史研究在材料方面仍不限於紙上，同時亦兼及地下出土的實物。在時間方面則似偏重於古代。作者所見到比較可以稱譽的著作，約略有下列幾種：徐炳昶：中國古代史的傳說時代；（中國文化服務社）黎東方：中國歷史通論（商務）；郭沫若：青銅時代（文治出版社）；翦伯贊：中國史論集（文風書局）……等。此外對於文化的研究，却有畸形發展的趨勢，好像大家對文化問題都感到重要，都有興趣研究，散見於雜誌的論文，數不勝數。專論文化的著作也不在少。以見此問題在今日之重要。

在敘述史實的系統著作中以錢穆師：國史大綱（商務）為最通行，最受歡迎，大家一致認為意識正確，簡明扼要的歷史新著，這是值得稱贊和介紹的。此外的系統著作較重要的，有：繆鳳林：中國通史要略（商務）；費文徵：中國通史（文通書局）；周谷城：中國通史（開明書店）；……等。斷代史則有黎東方：先秦史（商務）；蕭一山：清代史（商務）；鄒鶴聲：中國近世史（南方印書館）……等。

研究的進步，固然有事實的證明，無待深論，但表現研究之進步最明顯而真切的，可

舉一篇文章作代表，即郭沫若的「十年來自我批判」（載羣衆第二十二期）在這篇長文裏，郭氏對他十年前所下的判斷，所用的材料，和方法，乃至所得的結論，無情的予以批判，宛如攻擊另外一個人。把他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攻擊得體無完膚。假如他這部書晚十年着筆，一定不是那樣寫。也不那樣武斷。現在郭氏所用的材料和方法是否十年後再要修改，是另一問題，單就其十年來的進步而論，是值得重視的。郭氏如此，其他諸史家之進步亦可想見。

專史的研究十分發達，七八年來，已出版的著作頗有可觀。茲分別舉要如左：

關於民族的：

羅香林：中夏民族與百越系統考（商務）

張旭光：中華民族發展史綱（文化供應社）

關於政治社會經濟的：

陶希聖：中國政治思想史（南方印書局）

何資生：中國政治制度史（南方，文風，建設出版社）

周谷城：中國政治史（中華書局）

周異斌 羅志淵：中國憲政發展史（各大書店）

陶希聖：中國社會史（文風）

羅仲言：中國國民經濟史（商務）

關於文學及學術思想者：

羅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第一二三分冊（商務）

陳子展：唐代文學史與宋代文學史（作家書屋）

金毓黻：中國史學史（商務）

汪玉璋：中國史學史概論（商務）

侯外廬：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文風）

又 中國近世思想學說史（三友）

抗戰以來中國史學之趨向

## 五 歷史教育尙待積極推進

自民國二十七年 蔣委員長對中央訓練團第一屆畢業典禮訓詞，剴切沉痛的指示過去歷史教育之失敗以後，國人漸知注意，教育部特設立史地教育委員會，負責推動史地教育。但七年以來，成效尙未顯著。一般人對本國歷史知識仍甚貧乏，最顯著的例，即各級學校學生歷史程度之低，有出人意料者。由大學招生考試和高普考等各種考試的歷史成績看，不但令人寒心，並且令人害怕。主考人或閱卷人多慨乎言之！論學校教育，則因受課程標準之呆定限制，國文不能與英文分庭抗禮，國史不能與世界史分出主從，區別人我。在制度上已無法加重國史教育，喚發民族情緒。在心理與習慣上，又都在無形中作着歷史教育發展的障礙。論社會教育，雖漸漸有人注意利用歷史作社教的工具，如上面所述歷史劇之盛行，傳記文學之發展，史學演講之提倡等，但仍乏有計劃的大規模運動。關於這一點，作者謹以最大熱誠，殷切期望於教育當局以及史學專家趕快努力，大刀闊斧，破釜沉舟，以民族中心的教育，喚起民族靈魂，促成民族復興。

## 六 國史編修工作之亟待開展

自清史館裁撤以後，修纂國史的工作便停頓了一個時期。抗戰起後，國民政府鑑於修史之重要，設立國史館籌備委員會準備開始修史工作。但至今數年，仍在籌備中，工作未見積極展開。以論清史，則清史館的清史稿被禁以後，未見改修，至今無國定清史。以論中華民國卅年史，亦無正式典籍，國人欲讀而無書。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有中國國民黨史稿，雖可為國史之助，但未能當國史之任。至於抗戰史，國史館籌備會雖有準備，但未見正式展開工作。西南聯大教授姚從吾開會以學者資格搜集史料，但如此大規模戰爭，豈個人力量所能得其萬一。為承先，為啓後，實在應當由中央領導用全國力量，擔當起這修史的歷史使命。並且要爭取時間，立即開始。

### 結語

我們試將抗戰開始以後的史學作一鳥瞰，則不能不說這艱苦的七年，歷史學術確實有很大進步。這空前的苦難，教訓了我們，迫着我們的學術走入自救的道路。換句話說，也

抗戰以來中國史學之趨向

就是叫我們運用富有民族意味的學術來作領導民族的工作。由於戰爭的毀滅，播遷，使大量的資料，存稿，直接間接的損失，不可以數計，有的更無法求得補償。在研究上，增加多少困難。學人生活的艱苦，印刷條件之困難，在在都是學術進步的阻礙。但學人不屈不撓的精神，奮進不已的志氣，隨時隨地在用人力設法克服，並覓取新機。眼前這點點成績，雖尚未能使人滿意，但這已是多少學人用極大的犧牲爭取來的結果。惟其如此，故足珍貴。在團結合作上，已於三十二年集全國歷史學人組成中國史學會。以求精神之團結，工作之協調。今大難未已，責任正多，大家合衷共濟，互助合作，以求更進，實為歷史學人今後不可旁貸的使命。

## 九 抗戰七年來我國的地理學界及其出版物

陳獨行

戰爭對於學術，有兩種不同的影響，一方面砲火毀滅了圖書儀器，使學者們失掉許多工具，但另一方面，在這次困苦艱難的抗戰中，由於種種實際的教訓，却使國人漸漸認識科學的重要。

我國的地理學界，戰前因得少數先進學者的領導與獎勵，已有相當根基，比較著名的大學，如中央大學清華大學，浙江大學及中山大學等，均設有地理系地學系或史地系，此外更有中國地理學會與中國地理教育研究會等的組織，集合全國地理學者，力謀此一科學的發展，編印刊物，主辦講座，或發表著作，或介紹新知，於是我國的地理學也便粗具規模，我們知道，地理科學與數學物理化學等稍有不同，而與地質生物等較為類似，帶有若干區域性，能下一點功夫，較易取得國際的地位，然而當時朝野人士對於地理科學，並未

抗戰七年來我國的地理學界及其出版物

十分注意，兼以歷史短促，人才有限，因此所能表現的成績不多。就戰前地理學界所出的圖書而論，總數既然很少，而够得上稱「權威之作」的，更如鳳毛麟角。

抗戰軍興以後，學術團體隨政治重心內移，爲了抗戰的需要，學者們無不以所學貢獻祖國，地理科學與抗戰建國，關係至爲密切，例如開闢交通路線，必須有地理學者參加探勘，計劃經濟建設，必須聘請地理學者以備顧問，再若分析國際外交政策，討論戰場敵我得失，也處處需要地理學者的幫助，至此我國地理學界才逐漸受人重視，許多大學添設了地理系或史地系，目前我國設有地理系的大學，計有中央大學、中山大學、東北大學、金陵大學、與金陵女子文理學院，設有地學系的大學，計有西南聯大與西北大學，設有史地系的，計有浙江大學、四川大學、武漢大學、復旦大學、暨南大學、中央大學師範學院、中央大學師範學院、東北大學師範學院、國立師範學院、女子師範學院，設有文史地系者，尚有廣西大學。

大學或獨立學院的地理系史地系在數量上是增加了，但因設備簡陋，師資缺乏，大多



數地理系或史地系畢業生，素質却實在低得令人失望，爲了使大學地理系畢業生有繼續深造的機會，於是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創辦了中國地理研究所，內分自然地理人文地理以及海洋與測量等四組；成績比較優良的地理系或史地系也成立了研究部，目前已經成立的有中央大學研究院理科研究所的地理學部，內分地理與氣象兩組，浙江大學研究院文科研究所的史地學部，內分地理與歷史兩組，此外浙江大學史地系另受教育部委託設有史地教育研究室，東北大學受教育部委託設有東北史地研究室，而教育部因鑑於史地教育的重要，又在部內設了一個史地教育委員會，聘請國內有聲望的史地學者爲委員，除每年召開委員會集議推行並改進全國史地教育外，並擬特約專家編輯史地叢書主辦短期學術演講。

實地調查考察是地理學者必要而艱辛的工作，在抗戰期中，我國地理學界在政府直接或間接的協助下，也派遣過幾次考察團與調查隊，例如前年中央大學與四川省政府合辦的川西科學考察團，去年中央研究院派遣的西北科學考察團，便都設有地理組；至於中國地

理研究所屢次所派遣的考察團，則大多數皆以調查地理為主要目的，此外有些大學的地理系，在假期中也自動組織考察團，但是多為學生實習的性質。

顯而易見的，出版物實是學術界對外貢獻最具體的表現，抗戰七年來，學者們在生計的重重壓迫之下，仍有不少著作或譯作問世，並且知道還有許多作品為了印刷困難而未出版，這確為難能可貴值得欽佩的事，不過我們也無須否認，近年國內所出的地理圖書，大部分還不够標準，由於圖書評論風氣的欠缺，以及出版界審查的疏忽，甚至連不倫不類荒謬無稽的東西也可印出，此類濫竽的作品，在專家看來除了可笑可恨以外毫無價值，對於沒有判別力的初學者却有極大的毒害，因此深感我國的圖書評介制度實應加緊提倡，有了健全的圖書評介制度，則好的作品可得以顯出其價值，宏大其效用，推廣其銷路，壞的作品可因輿論的制裁，減小其危害，或根本不容其存在，這裏，願就一己所知道的，所收集到的，所讀過的最近七年來出版的地理圖書中，分類選出幾種合乎標準值得一讀的作品，（專指單行本而言），列成一表藉資介紹，對於初學地理的讀者及社會上一般愛好地理的

人士，或可不無益處。

(一) 經濟地理

書名	著者	出版處
世界經濟地理	胡煥庸	青年書店
世界經濟地理	傅角今	商務印書館
滇西經濟地理	張印堂	國立雲南大學西南文化研究室
中國經濟地理	胡煥庸	青年出版社
中國糧食地理	吳傳鈞	商務印書館
廣西經濟地理	張先辰	桂林文化供應社
南洋經濟地理	嚴青萍	正中書局
美國經濟地理	胡煥庸	正中書局
蘇聯經濟地理	胡煥庸著	青年書店

抗戰七年來我國的地理學界及其出版物

中國戰時學術

一四〇

(二) 國防地理與政治地理

書名 著者 出版處

國防地理新論 沙學浚 商務印書館

歐洲政治地理 任美鏗 浙江大學史地教育研究室

縮小省區環境與命名之商榷 胡煥庸 中央大學研究院地理學部專刊第六號

太平洋國際地理 任美鏗 浙江大學史地教育研究室

國防地理 胡煥庸 青年書店

中國抗戰地理 王維屏 正中書局

(三) 區域地理

書名 著者 出版處

四川地理 胡煥庸 正中書局

四川地理 胡煥庸 正中書局

叶魯番盆地

童承康

中央大學研究院地理學部叢刊第三號

河西走廊

陳正祥

中央大學研究院地理學部叢刊第四號

塔里木盆地

陳正祥

中央大學研究院地理學部叢刊第五號

宜化盆地

陳增敏

商務印書館

福建地理

林觀得

福建省教育廳

青海誌略

許公武

商務印書館

(四)外國地理

書名

著者

出

版

處

世界地理

胡煥庸

正中書局

日本地理研究

陳正祥

正中書局

印度地理

陳正祥

正中書局

西部亞洲地理

陳正祥

正中書局

抗戰七年來我國的地理學界及其出版物

中國戰時學術

一四二

(五) 地形學與區域地形

書名 著者 出版處

地形學 丁蔚

重慶大學

透視圖繪法

丁嗣陳正祥

中央大學出版部

漢中盆地(地形篇)

王德基  
薛貽源

中國地理研究所專刊第一號

遵義地形發育

丁錫祉

清華大學地學會專刊第二號

(六) 氣候學與區域氣候

書名 著者 出版處

氣候學

胡煥庸

國立編譯館

峨眉山之氣候

胡煥庸

中央大學研究院地理學部專刊第一號

新疆之氣候

胡煥庸

中央大學研究院地理學部專刊第三號

甘肅之氣候

陳正祥

中央大學研究院地理學部專刊第五號

(七) 地圖與圖誌

名稱

編譯者

出

版

處

河西新疆五十  
萬分一地圖集

中央大學地  
理系

中央大學地理系

中國分省新圖  
(第四版)

丁文江翁文  
灝曾世英

申報館

蘇聯作戰力圖  
解

斯吞布里吉  
著季叔亮譯

五十年代出版社

西部各省地理  
圖

胡煥庸主編

青年書店

四川地理圖

胡煥庸主編

青年書店

(八) 期刊與雜誌

名稱

編印者

抗戰七年來我國的地理學界及其出版物

中國戰時學術

一四四

地理學報

中國地理學會編印

地理

中國地理研究所編印

地理集刊

中央大學地理系出版

史地雜誌

浙江大學史地系編印

地學集刊

清華大學地學會編印

邊政公論

中國邊政學會編印

(九)其他

書名

譯著者

出版處

地理學研究法

徐長望葉良輔任  
美鐸合著

浙江大學史地教育研究室

自然地理學

E. Maltorne 原  
著王勤情譯

商務印書館



地理學史

Dickinson, Howard  
合著王勤培譯

商務印書館

中國地理學史

王康

商務印書館

近代人生地理學之發展及其在我國之展望

李旭旦

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十週年紀  
念論文

西北問題

張其昀溫甫任  
美鐸合著

桂林科學書店

中國的邊疆

O Lattimore 原  
著趙敏求譯

正中書局

中國地理新講

賀淵

實學書店

中國地理的特色

易曲宜

天下書店

世界漫遊記

Moss 原著王祥珩譯

桂林文化供應社

上表所列共計五十餘種，約佔我國地理學界最近七年來全部出版物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前面曾經鄭重聲明，本文選擇的範圍是限於筆者所知道所收集到以及所讀過的業已

抗戰七年來我國的地理學界及其出版物

一四五

出版的單行本而言，其他散見非地理刊物的短篇佳作以及用外國文字發表的，概不在內；選擇標準是筆者一己所定的，其主要條件為內容充實，體系清晰，沒有重大錯誤，文字不太難懂，惟所選一二種綜合性的刊物中，仍不免有少數作品會犯重大錯誤，讀者必須留意。至於其他重要著作，或在他處出版，因為戰時傳遞困難，或因筆者見聞有限，以致遺漏未能列入的，則除了應負疏忽之罪外，還請著者及讀者的指正與原諒。

一九四四年六月一日，重慶。

## 十 抗戰以來的心理學

蕭孝 譯

凡注意於我國科學之發展者必能察見一項重要事實，即我國心理學家對於研究工作之興趣與日俱增。此種趨勢尤以在應用心理方面為最顯著，而於抗戰期中遂發展為一種全國性之「人事心理研究運動」。事實上，在此項運動尚未成熟以前，我國已有多種研究與人事心理之問題具有直接或間接之關係。例如陸志韋、廖世承、陳鶴琴諸氏之測驗工作即其重要者也。

人事心理之主要目標在使人有創造自動之能力，熱烈進取之情緒，積極果敢之行動及整齊嚴肅踐履篤實之風氣。其所採取之步驟則為圖謀人事之恰當配合，並調整人與人間及事與事間之關係，俾使各種工作之效率可以達到頂點，而個人與團體之福利均能充分顯及。此為應用科學方法促進心理建設之唯一途徑。就字面之意義視之，人事心理或與美國之

「人事研究」，美國之「實業心理」，德國之「實業心理技術」及「工作科學」，或蘇聯之「合理」概念相類似，而其實人事心理之範圍遠較廣闊。此處所謂人不僅包括成人，而且包括兒童；並不僅包括工作者，而且包括學習者。此處所謂事不僅包括職業與任務，而且包括教育與訓練。茲將人事心理所包含之各種因素分別說明於下。

在人一方面，最堪注意之事實自為個別之差異。人心之不同，有如其面。各人在智慧，情緒及其他各方面皆有顯著差異。就智慧方面言，即在同一機構，同一年級或同一年齡中，其差異之範圍亦極闊大。例如根據作者所編軍官智慧測驗之結果，同一訓練機關之學員在甲種軍官測驗上之分數有低至75分者，有高至85分者；其在乙種軍官測驗上之分數有低至80分者，有高至100分者。又如根據作者所編中學智慧測驗第一種之結果，各年級之分數範圍竟有如下之差異：高中三年級，20至110；高中二年級，10至105；高中一年級，5至105；初中三年級，5至110；初中二年級，5至100；初中一年級，5至85。由此可見同一年級之分數竟如此懸殊，並且根據此種測驗之結果，各年齡之分數有如下之範圍：十三

歲。10至100，十四歲，5至100，十五歲，5至105，十六歲，5至100，十七歲，5至110，十八歲，5至105，十九歲，10至110，二十歲，30至105。其他如小學與大學之結果亦呈類似之現象。

就情緒穩定性方面言，根據訂正個人事實表格第二種之結果，初中一年級至高中三年級之分數範圍大致相同；其分數可低至二十分，而高至八十六分。

在其他人格品質方面，個別差異之範圍亦大。歐洲「型學」(Typenlehre)家常按人類之差異分為各種類型，於是有「循環傾向型」與「分裂傾向型」，「完整型」與「分析型」，「內傾型」與「外傾型」，「動型」與「靜型」之別；復有「無狀態」，「無情型」，「神經型」，「多情型」，「熱血型」，「多淡型」，「多胆型」及「急性型」之分。此等類型之劃分雖未可完全置信，然其所根據之事實已足表示個別差異之顯著性。

就事一方面言，最堪注意之事實乃為各種工作日益複雜之趨勢。在進化之國家中，各

種職業不獨日趨於專門化，而且每種職業之本身亦有分化之趨勢。我國現有之趨勢雖不如此顯著，但其演進之結果必非例外。即就目前之情形察之，各種工作，無論在何方面，已遠較以前為複雜，並且尚須繼續分化至充分程度，始克適應現代之國際環境。例如兵工廠中檢驗子彈與測量子彈兩種工作，自表面視之，似有極少之差異，然而根據心理研究之結果，此二種工作之性質迥不相同。又如駕駛汽車與駕駛飛機兩種工作似乎極相類似，而其實此二者之性質並不一致。又如學校中之政治工作人員與其他各方面之政治工作人員似有極多之類似性，然其所需之條件則大相懸殊。此不過略舉數端，藉以表示極相類似之工作尚有分工之必要。

吾人由上述情形可以察見各種工作人員之預備教育不得不日趨於特殊化。至少在教育進程之某一部分或階段中，此種特殊化之趨勢無法可以避免。

個別差異既如此其多，而各種工作復日趨於特殊化；是故人與事之關係複雜錯綜，未可臆斷。就學科方面言，有人能習此科而不能習彼科，亦有人能習彼科而不能習此科，復

有人能習數科而於其中一種特別適宜。就職業方面言，有人適宜於此種工作而不適宜於彼種工作，有人適宜於彼種工作而不適於此種工作，亦有人雖能担任數種工作而特別適宜於其中之一種。

如欲使工作效率達於頂點，則在預備教育中，每人應習其所最宜習之學科，而在從事工作時，每人應担任其最適宜之工作。此即人事恰當配合之意義。

其次可以論及人與人間之關係。人與人間之關係乃為多種條件所支配，然其中最重要者莫如情感之培植與動機之運用二項。情感之培植自須以人事心理之原則為根據。例如「自居作用」之產生即為培植情感之一法門。所謂「自居作用」係對本身與工作環境（如家庭、學校、或所服務之機關等等）視為一體，於是後者之榮辱乃能視為前者之榮辱。所謂動機正如機器之發動機。機器如無發動機，則不能活動；人無動機，亦無行為。例如工作人員心理狀態中之積極因素（例如自尊心）與消極因素（例如憎惡情感）即其動機所在。如能按人事心理之原則予以有效之運用，則學校中之訓育問題與機關中之人事管理問題不

難解決。

復次可以說明事與事間之關係。此一方面之問題亦頗雜複。茲舉數例於下：就課程方面言，各種學科先後之排列即爲事與事間的關係之一種。此種關係自須以心理發展之進程爲根據。就工作之性質方面言，各種工作之次序應視精力之有效分配而定。例如丕特肯（Pitkin）曾提示五種精力層之區別；屬於第一精力層者爲純粹思想，推理及計畫；屬於第二精力層者爲觀念之表述；屬於第三精力層者爲演說、表演、歌唱及奏樂；屬於第四精力層者爲物件之運用與製造；屬於第五精力層者爲個人與團體之處理。此種排列頗合邏輯。吾人在分配本身或他人之工作時至少必須注意於所需精力之分量，始能維持最高之工作效率。就工作材料所經之路線言，吾人亦須爲每種工作確定一最經濟之路線，始能防止人力，物力及財力之浪費。最後可以提及一種工作在各階層中所經過之手續。此種手續亟宜加以心理研究，俾使時間與勞力均能減少至最低程度，而且可以防止不相銜接之現象。

上述各種因素可以表示，人事心理之範圍幾包括人類之一切活動，而且與純粹心理及



應用心理之研究均有關係，唯後者則較着重而已。

抗戰七年來人事心理之研究可以分爲下列各類：

一、軍警心理之研究

- 1. 軍官智慧團體測驗（A B 二種）  
蕭孝燦 張義堯
- 2. 飛機機械人員之智力常模  
蕭孝燦
- 3. 情報人員之甄別測驗  
蕭孝燦
- 4. 飛行人員之情緒穩定性測量器  
蕭孝燦
- 5. 警官智慧團體測驗（有甲乙兩類各五套）  
申類中每套有測驗八種  
乙類中每套有測驗六種  
蕭孝燦 丁祖蔭
- 6. 普通警察智慧團體測驗（甲乙二類）  
蕭孝燦
- 7. 普通警察智慧個別測驗（十餘種）  
蕭孝燦 丁祖蔭
- 8. 交通警察測驗（二套）  
蕭孝燦 丁祖蔭
- 9. 刑事警察測驗（二套）  
蕭孝燦 丁祖蔭

抗戰以來的心理學

中國戰時學術

10 警政人員生活調查表格

11 情緒鎮定性之實驗研究

12 防空知識測驗

二、大學心理之研究

1. 初編大學心理測驗之完成

2. 訂正塞斯通大學智慧測驗之完成

3. 新編大學心理測驗（共五套）

4. 大學生自由聯想之研究

5. 語數形測驗

三、中學心理之研究

1. 燕京中學成業測驗（A B 二種）

2. 青年心理測驗

一五四

蕭孝燦 丁祖蔭

蕭孝燦 胡先進

倪中方

蕭孝燦 吳江霖

蕭孝燦 吳江霖

蕭孝燦等

蕭孝燦

張德秀

周學章

郝耀東

3. 中學學科測驗
4. 中學智慧測驗
5. 訂正×○測驗B種
6. 個人事實測驗第二種

四、小學心理之研究

1. 黃氏訂正品康兒童心理測驗
2. 燕京小學成業測驗（A B二種）
3. 一二年級用小學智慧測驗
4. 三至六年級用小學智慧測驗

五、發展心理之研究

1. 兒童對於物質因果律之概念
2. 兒童魂靈思想之實驗分析

抗戰以來的心理學



郭爾超  
蕭孝燦  
蕭孝燦  
蕭孝燦

黃覺

周學章

蕭孝燦

徐正穩

蕭孝燦

黃翼

黃翼  
李象偉

3. 兒童連接詞之應用

黃翼 王一明 周文敏

4. 問題兒童之作業特徵

陳立 應炯卓

5. 心理組織之發展研究

陳立 周濯水

6. 心理組織之性別差異

陳立 周濯水

7. 知覺單元之發展研究

蕭孝燦

8. 情緒穩定性與年齡之關係

蕭孝燦

9. 情緒穩定性與年級之關係

蕭孝燦 唐齊安

10. 中美英德「比西量表」訂正本之訂正

蕭孝燦等

六、實業心理之研究

1. 數種德國工業心理測驗與美國機械能力測驗之統計分析

蕭孝燦

2. 技工適性心理測驗之標準化

蕭孝燦 程法泌

3. 塞斯通職業指導測驗訂正工作之完成

蕭孝燦 吳江霖

4. 新編職業指導測驗（共七種，每種有二至三種形式）

蕭孝燦 張義堯

5. 在學習技能時注重速度與準確性之比較研究（共有三種實驗）

蕭孝燦

七、學習心理之研究

1. 中學教學法之實驗研究

艾偉等

2. 全體與部分二法之實驗研究

蕭孝燦

3. 讚揚與申斥對於學習效率之影響

蕭孝燦 張義堯 程法泌

八、其他

1. 中美學生神經傾向之比較

周先庚

2. 考卷校正器之創製

黃覺民

3. 我國職業狀況之調查

潘菽

4. 小學教師能力傾向測驗之編製（共有甲乙二套）

蕭孝燦 曹飛

5. 護士能力傾向測驗之編製

蕭孝燦 姚秀華

抗戰以來的心理學

6. 算術診斷測驗之分析

王書林

7. 各級學員及公務員情緒穩定性之比較

董孝燦

上表所列自難包括抗戰七年來之一切心理研究，蓋在抗戰期中，交通困難，各方研究之報告不易搜集也。然根據平日觀察所得，本文所舉至少可以代表我國抗戰以來心理研究之趨勢。此則無可懷疑者也。

此外亦有從事於行為生理基礎之研究者。如郭任遠氏在抗戰前之胚胎行為研究早已引起科學界之注意，最近復重整旗鼓，創立中國心理生理研究所以繼續其研究工作。又如汪敬熙氏對於活動電流之研究早在抗戰以前開始，並有重要之發現。聞此種研究仍在進行中。此為至堪注意之事實也。

其次可以提及抗戰七年中我國心理學之出版物。茲就所能搜集者約按其出版次序列舉於下：

二、蕭孝燦著 心理問題

三、高覺敷譯 頑童心理與頑童教育

四、鄭沛疇著 兒童行為指導

五、周 漢著 問題兒童研究

六、魯繼曾譯 普通心理學大綱

七、軍訓部譯 軍事心理學之研究

八、蕭孝燦譯 軍事心理

九、林適存繆振鵬著 士兵心理概論

十、唐 鉞譯 心理與軍人

十一、周永耀編 實業心理學

十二、陳雪屏著 從心理學的觀點談人事問題

十三、高覺敷著 青年心理與訓育

抗戰以來的心理學

十四、黃翼著 兒童心理學

十五、徐傑著 護理心理學

十六、蕭孝燦著 教育心理學

十七、高覺敷譯 形勢心理學

十八、汪敬熙著 行為之生理的分析

十九、人事心理研究社編 人事心理考核

此外有作者所主編之人事心理叢書及人事心理論文集，亦為抗戰後之產物。人事心理叢書今已完成十二種。其中已出版者有蕭孝燦著「怎樣領導」與蕭孝燦丁祖蔭譯「德國心理戰」二書。尚有蕭孝燦著「人事心理問題」王震輝著「國民戰時心理衛生」丁瓊著「心理衛生叢叢」張振鐸譯「人事工程學」及蕭孝燦著「心理建設之科學基礎」等書在付印中。在刊物方面有艾偉氏所主編之教育心理研究及作者所主編之建國教育心理專號，掃蕩報軍事心理專刊與新世界實業心理專號。



吾人由上述之研究與著作可以察見我國心理學家之主要特徵。茲略述於下：

一、不偏不倚之態度——我國心理學家對於新學說與新發現皆能採取客觀研究之態度，而不願列於任何一種學派。郭任遠氏或為抗戰前之唯一例外，然按其最近一次由美歸來之言論，其態度似亦趨向於調和派矣。黃翼氏或可視為主張格式塔心理學說之最有力者。讀至此，或有人仍誤以作者為格式塔心理學派之一員，而其實作者所持之見解似宜稱之為心理相對論。就一般情形言，我國心理學家皆有不偏不倚之態度。唯其如此，故能大量吸收國外之新資料而予以迅速之介紹。我國心理譯述著作之多殆以此故。

二、創造自動之能力——盲目崇拜每視為東方之病徵，然在我國心理學界殆無此種現象。例如汪敬熙氏所著「行為之生理的分析」一書即可表示高度之創造性。郭任遠氏最近研究之計畫亦有其新異之途徑。他如「蕭氏共文字智慧團體測驗」之編訂有一事實或可予以注意，即使測驗材料約節省四分之三而仍能保持其原有之效度，且使此種測驗可以適用於各級教育之學員與各界之工作人員。又如應用兩手合作測量器以解決知動學習中一久懸

未決之問題。即在學習技能時，應注意於速度抑其準確性？此種實驗控制方法實為以前所未有者，蓋此不僅為實驗室內之控制，而且為實驗室外之控制也，故其發現自較以前多種研究之結果為正確。此不過略舉數端耳。凡此之例皆足表示吾人並非徒崇拜他人之發現而無創造自動之精神也。

三、抽象理論之興趣——我國心理學家雖漸趨向於實用心理之研究，然其理論興趣並未因此而減低。事實上，吾人之理論常因實用心理研究中之發現而得以修正，且吾人之興趣究以在各種研究之理論方面較為濃厚。此於吾國心理學家之工作中可以察見之。

四、人類福利之動機——吾人之心理研究多為人類福利之動機所驅使。此種事實無可否認，蓋人事心理研究社之迅速發展即其明證也。

至於人事心理應用之範圍，其在各方面之發展情形可分述於下：

一、人事心理在軍事方面之應用——我國軍事心理之工作迄今尚無特殊機構主持之。就抗戰以來之情形言，中央，或局部之軍事心理研究工作多委託於國立中央大學心理學系

或人事心理研究社。其工作之性質或為軍事人員之甄別，或為軍事心理之訓練。

二、人事心理在警政方面之應用——我國警政心理之工作經過去五年之繼續研究已獲滿意之結果。內政部警政司設有警察智力測驗室。其中所編成之測驗已達數十種，並已推行至全國。凡採用此等測驗之機構皆表示極度之滿意。

三、人事心理在實業方面之應用——我國實業心理之提倡遠在抗戰以前。例如在中央大學，清華大學及中央研究院皆早有此類工作之進行。自抗戰後，國防工業心理之研究會委託於人事心理研究社，並有兩批測驗技術人員會由該社予以訓練。最近一年來，技工訓練處沒有專門機構從事此種研究，並有大量測驗之標準化工作已經完成。是項機構尚有擴大之可能。

四、人事心理在教育方面之應用——教育部曾以編製測驗之工作委託於中國測驗學會。所編者有智慧測驗與學科測驗兩類。最近大中小學之智慧測驗已經編成。至小學與中學之學科測驗亦在編訂中。

五、人事心理在醫學方面之應用——醫學心理在我國之發展尚有相當之困難。中央衛生實驗院雖設有心理衛生室，唯其工作則暫限於知識之介紹與個案之調查。最近人事心理研究社與中國心理衛生協會正努力擴大此等工作之範圍。

吾人由以上所述一方面可以察見我國心理研究之健全趨勢，他方面可以明瞭社會人士對於心理學之逐漸認識。此後心理學家將與社會日益接近，而我國心理建設之基礎亦將因此日趨鞏固矣。

## 十一 抗戰七年來之科學界

盧子道

在抗戰未起以前，政府固然預計着戰事不可避免，科學界同人亦看到時代的趨勢是如此。因此在大學裏關於科學方面的教授學生，皆會分別從事於戰事準備。例如戰前北平清華大學，曾先設立了航空工程系及研究室，其用意無非是在企圖增強國防的力量，可是戰事既起以後，北平南京各學術機關，紛紛內遷，準備久戰，圖書儀器，損失過半，外來供應，亦日益艱難，於是政府對於科學界的希望，以及科學界對於服役於戰事的心願，皆未能充分實現，這些幾乎是出人意料之外。

目前抗戰還須努力；除此而外，建國事業，尤待長時期掙扎，在這個時候，我們還是應當反省，過去有什麼失敗？將來的成功應當走那條路線？本文特別着重在過去七年的檢討。

科學與技術有別，它是一種知識，並不是立即可以用在戰場或工廠的工具。惟其如此，所以將這種知識力量，用之於戰場工廠，是另外需要一番努力和一種經驗。在過去七年中，我們坦白承認，這種經驗和努力，都是不夠；而經驗尤為缺乏。發生較晚的歐美戰事，利用科學力量固然很多，即以其和已有科學程度的比例而言，亦較我國為大。這就是說，他們有十分科學力量，已用到了八九分，而我們所有的十分科學力量，却祇用到了二分或三分。其主要原因，還是在我們經驗不足。例如我們顯然可以看到有下列現象：

一、政府說：你們科學家為甚麼不組織起來，貢獻你們的力量呢？

二、科學家說：政府為什麼不將我們科學家組織起來，使我們可以効勞呢？

這種現象，就是政府觀望着科學家，科學家觀望着政府，互相觀望，結果是時不我待，而科學家始終沒有動員。最近雙方皆覺得如此不動，總不是道理，於是雙方略有行動了，但是又發生了下列現象：

一、政府說：我們要國防民生的科學建設，請科學家們起來參加；

二、科學家說：科學理論為國防經濟建設事業之基礎，請政府要特別注意。因此雙方似乎還在海岸吶喊，好像兩個齒輪，尙未配合起來。

下列五種事實，即足以表示作者所說的這種現象。即：一、學會活動，二、科學刊物，三、科學研究，四、科學教育，五、科學思想。我們試分別述之於下。

## 一 學會活動

學會是科學家自動聚集的團體，所以切磋學問，交換研究心得，並推廣科學知識。在抗戰初期，以至於民國三十年，各種學會，凡是在抗戰以前成立者，皆很少活動；有之，亦不過繼續抗戰以前的工作。這些工作，因物力財力缺乏，交通困難，有減而無增。這種情形，我們是不難想像的。因為除中國科學社及中華自然科學社，包含有推廣科學工作之外，其他學會，（並且上述二學會亦是如此），每次開會，主要是在宣讀論文；抗戰起後，這個方式，還是不曾有所改變。然而科學論文，並不是搖起筆桿，三五日內，即能完成

：其內容是要經過半年一載，甚至於更長的時間，在設備齊全的實驗室中，搜集材料，參考文獻，整理結果，而後才能完成。自從戰事起後，我們一向依靠外來的圖書儀器文獻藥品，舊的遺失，新的不能增添，研究工作當然受了極大影響。研究工作，不能積極進行，論文的數量當然減少，論文的數量減少，學會的主要活動，即趨於遲滯。多數學會是如此；惟有少數學會，仍活躍如舊，如中國地質學會，中國生理學會成都分會等是。

不過多數學會之所以不能活躍，除研究設備不足之外，還有兩個原因：第一是各學術機關，在抗戰初期，多遷徙不定。如北大清華南開聯合大學，由北平而長沙南岳，由長沙南岳而昆明；浙江大學由杭州而浙南江西，由江西而廣西，由廣西而貴州，諸如此類。在這樣遷徙不定狀態之下，研究工作，既受影響，而各人心緒不甯，自無暇顧及學會活動了。第二個原因是交通困難。自從各學術機關內遷之後，內地交通情形，多用汽車，而汽車費用既貴，數量亦少，故欲集各處會員於一地，對於私人經濟負擔，殊嫌過重。即使私人財力，可以負擔，而行程時期，亦不能準確。故集會之事，殊不易舉。有此二因，多數學



會，乃趨於沈寂。

惟近二年來，忽然有一個轉機，即各學會，又復趨於活躍，這種現象，是受時代影響。近二年來，圖書機器設備之類，並未增加，交通情形，亦並未改善；但是各學術機關，已不再遷移，這使學會得以開始工作。最大原因，恐怕還不是如上所述的各機關行止已定，而是戰事情形好轉，人心趨於積極。這種情形，特別表現在陪都附近一帶。例如二十九年三十年，川康西北西南一帶的科學調查工作，由學會主持者有好幾次；三十二年下半年，新疆考察團尤有多起。各學會年會，亦有日趨熱烈氣象。各年會近年來之特徵，除宣讀論文之外，又添上一項新節目，即討論經濟建設問題，這是抗戰以前各學會年會所不曾先有的。例如三十一年中國工程學會第十一屆年會，在蘭州舉行年會，有實業計劃之討論；三十二年第十二屆年會，在桂林集會，討論及（一）鐵路（二）水利水力電力（三）鑛冶（四）化學工業等四個問題。三十二年七月中國科學社聯合新中國數學會中國動物學會中國植物學會中國地理學會中國氣象學會在北碚舉行聯合年會，曾討論國際科學合作及科學建

國問題。同年十月間中華自然科學社，在沙坪壩舉行年會，曾討論科學教育問題。三十二年十二月中國化學會在五通橋舉行第十一屆年會，曾討論戰後化學在中國之發展問題。本年五月間，十一個教育學術團體，在重慶舉行聯合年會，亦曾討論世界教育之改造問題。凡此種作風，和以前年會中祇宣讀論文者不同。其討論結果，無論能否見諸實行，多少總可以供政府及社會參考之用。

近兩年來，除各學會年會復趨活躍以外，在重慶附近，又產生了許多新的學會。例如三十一年成立了國防科學技術策進會，三十二年以後，又成立了市政工程學會，中國自動機工程學會，戰後建設研究會，中國工礦建設協進會，中國發明協會等。這些學會，多偏於技術建設方面，並非純粹學術性質。但是在這些學會之中，亦有純粹科學家參加者。倘能在這些學會中，熔理論與實踐於一爐，則科學之效驗既增，政府和社會對於科學之認識，亦必會加強；而上面所說，政府與科學隔岸吶喊之弊，終將演成攜手合作之風。

## 一一 科學刊物

在刊物方面，有關科學性質者，殊未能令人樂觀。例如三十年度出版物中，自然科學佔百分之七，三十一年度亦為百分之七，三十二年則減為百分之四。這種減低的趨勢，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科學刊物印刷困難，如圖表等字，皆非普通印刷者所能勝任；而印刷此種刊物時，論文作者雖煞費苦心，書局則因成本過高，銷路滯呆，亦不歡迎。因此凡有科學刊物，皆不得不由各學術機關學會團體甚至於私人籌資付梓。這些私人團體，莫不叫苦連天。如果這些機關私人，再失去其科學信仰，則科學刊物，可以說行將絕跡。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危機。

科學刊物，成為書籍者，多為教育及推廣之用；至於研究論文，多刊在期刊雜誌上面。關於期刊雜誌，亦有通俗性質者，但多數應當屬於研究性質，此種期刊，在平日亦是不易維持，國內如此，國外亦是如此。因為此種刊物，印刷成本高而銷路少。惟近年來，科

學期刊，在印刷條件極度困難之下，還有八十來種（據作者所見），雖多數印刷紙張，唯標準甚遠，但從此亦可見我國科學人士，還有相當的著作及印刷熱忱，在八十餘種內，可分類如下：

一般性質

十七種

純學術性質（包括地學土壤）

三十二種

農業

十四種

工業

七種

醫藥

十三種

科學教育

二種

以上共計八十五種

從上表可見，純學術性質的刊物，佔三分之一以上；一般性質者約四分之一弱，農業和醫藥次之，工業又次之，科學教育最少。大致情形如此。作者未見及者，當不在少數。

尤其是察昆桂筑以及西北各地，總計起來，當有一百種以上。惟各種雜誌，除科學畫報以外，恐十分之九銷路甚少，行至國外者，恐怕不上十種。

從這種刊物情形看來，其本身在質和量方面，並未足以使我們樂觀，但是在其作者肯執筆，各機關團體肯努力刊印方面看起來，或總括一句在科學界的精神方面看起來，則事有可爲。

### 三 科學研究

我國要科學進步，首重研究，這是我們科學靈魂之所在，吾人須特別注意。研究工作，自二十八年前地質調查所成立以來，至抗戰時止，已略上軌道。惟一般而言，仍未能達到科學家所希望的那種程度。例如專門性質雜誌，當時祇有少數幾種，各大學內，亦未及指導學生寫作合乎博士論文標準之論文，大的權威科學家，爲數甚至於少過晨星。抗戰起後，因圖書儀器之缺乏，大有一落千丈之勢。惟幸多數人員，已往內移，我們可以說「留

得青山在，不怕無柴燒」，祇要這些科學家健在，我們不難復興起來。

任何事業，要求開展，總以人為首要，科學研究尤其如此。因為科學研究，是創造性的；創造性的工作，不在於儀器設備，而在於人的腦子活動。國內科學人才，自從抗戰以後，所增無多，而已有人才，因經濟壓迫，健康失調，心神不甯者，比比皆是；甚至於喪失生命者，亦時有所聞。自從去年以來。美國援華聯合會有教授補助金之舉，對於科學界人士之醫藥及子女教育等費，略有資助，但杯水車薪，難及全國。至於在淪陷區內，除操守不堅，參加偽組織者外，被敵偽迫害者，亦大有人。這些都是痛心之事。今後國內四五萬少數科學技術人員，殊值得政府及社會之資助，使其生活安定，俾對於邦國有所貢獻。

除人才之外，圖書儀器，原是困難萬分。去年英國李約瑟（即尼得漢）教授來華，在這兩方面，略有資助，繼之美國大使館徵集國內科學論文，分別介紹至國外雜誌發表，並酌予稿費，對於科學家們，不無小補。此外美國外交部復惠贈圖書影片，由教育部及中華

教育文化基金會等共同設立國際學術文化資料供應委員會，製造放映機，在非學術中心地，設立圖書影片圖書館。美國大使館復印行美國科學指導，分贈國內各科學機關。凡此對於科學研究，皆為抗戰後期中之重要助力。

我國教育部。自民國三十一年起，有學術審議會，對於國內成績優異之學術著作，其中包括科學著作，分別予以獎金，這亦是長期抗戰時推動科學研究之一種措施。

在近二三年來，一方面由於國際及國內之助力，又一方面亦由於時代關係，研究之風，略有進展。在古生物學界有陸豐謙及原始哺乳類動物之發現，在植物學界有橡膠植物（薛荔）之發現，昆明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製造各種罐頭，是皆舉世大者。至於內地礦產之發現，雖開採有待，對於國家，實為抗戰期中之重要科學收穫。在醫藥方面，瘧疾一帶瘧病流行，今開同濟醫學院杜公振教授已獲得治療方法，若然，這亦是重要貢獻。至於工礦界近年來大小發明有三百起，在將來工業發達後，未必每件發明都有價值，但亦不失為今日科學界的一番努力。

當我們提到科學研究成就之時，雖然在抗戰期中，爲量無多，但在地質地理天文氣象數學物理化學生物生理以及農工醫等各方面，欲從每一門內提出一二，作爲報導，殊有顧此失彼之嫌。若以研究機關而言，昆明之北平研究院，重慶之中央研究院，中央農業試驗所，中央工業試驗所，中央衛生實驗院，中央地質調查所，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五通橋黃海化學工業研究社，以及各學校各部署之研究機關，皆有工作進行。至於各種工作之重要性，除膚淺的表面看法外，殊不能武斷評價。吾人所得而言者，祇是這些研究工作，近二三年來，較之抗戰初期，已更活躍。國家社會，固不可以自滿，尤不可以置之不顧。對於工作，固宜繼續獎勵；對於工作人員，尤宜予以生活保障。這些不上五萬之研究人員，即完全由國家予以贍養，亦不爲過。誠如貝訥兒所云，每一元研究費，其經濟收穫爲八百倍，吾人宜牢記此點；故獎勵研究，不祇是文化上收穫而已也。

#### 四 科學教育



談起科學教育表面上看來，殊令人有寒慄之感。蓋年來圖書儀器，日益困難，科學教育，已極棘手，而青年學子，多為個人畢業後職業着想，在大學裏習純粹科學者其比例少於習農工醫者。習農工醫者尤少於習經濟銀行會計者。故每在一個大學之內，整個理學院學生數目，尚不及經濟系一系那麼多。以整個國家而言，這是未免捨本求末。

在民國三十年，教育部曾兩度向各大學及專科學校，分派美金，向國外添購圖書儀器。自仰光失守後，多數已購之圖書儀器，或中途損失，或未能再來，此亦是一個打擊。截至目前為止，科學教育，多沿用舊有圖書，或略添翻版新書，或由英國大使館李約瑟教授設法略予捐贈，或求之於影片圖書，但皆為涓滴之助，難解目前嚴重之困難，至於大批添購圖書儀器，在短期內，無論運輸力及財力方面，即政府亦難以為助。因為這些緣故，在講堂內所授者，不容易有新材料；至於在實驗室內，電、水、向成問題，遑論其他！因此吾人不可否認，科學教育的水準，有降低之勢。

不過吾人亦不必過於悲觀者，其理由有二：一為戰事時期，軍事第一，勝利第一，任

何教育，除直接有關軍事者外，皆不免受到影響，故科學教育，亦不能例外。我國如此，即在英美等國，亦是如此。英美二國，為爭取戰事勝利起見，人力物力，皆已動員；即使他們可以供給很好的圖書儀器，亦是要打了很大的一個折扣。例如美國大學教育，由四年而改為三年，醫學教育由六年改為五年，至於校內員生，動員為軍事服務，較之我國，尤為普遍。所以他們的戰時科學教育，亦和平時不同。其次在表面上看來，我國科學教育，水準降低；但是理工農醫等所謂「實」科學生，略有增加，有如下表所列。

民國元年

「實」科畢業生

一二九人

二十年

「實」科畢業生

一、八八三人

二十五年

「實」科畢業生

二、九五〇人

三十年

「實」科畢業生

四、一〇八人

故民國三十年在理工農醫方面之畢業生，較之三十年前，增加三十一倍半；不過為數祇四千人，吾人尚嫌其少耳。此外近來教育設施方針，亦略有變更，即由無計劃而趨向於有計

劃。雖然計劃之事，未臻週密，但自從中國之命運一書出版以後，此種企圖，已在進行之中。誠如吾人在上面所說，吾人對於動員科學力量之事，尚缺乏經驗，但既要有此種企圖，吾人亦不必過分消極，種種經驗，自當與日俱增。去年十二月間，教育部二屆學術審議開會之時，陳部長立夫先生，曾報告高等教育與軍事及建設方面之配合，提及下列三端：

(一) 戰時青年學生，自動參加軍事或參與後防勤務之工作，應予獎勵。

(二) 志願學習軍事以外之科學，以期貢獻努力於建設事業者應入普通學校，加緊勤學，毋虛耗光陰。

(三) 無論在學或已畢業之青年，政府如需要征調時，均應命前往。截至目前為止，征調各校學生參加軍事工作者，約八千餘人，招考戰區各地青年，按其志願分發於軍事學校或團隊者約六千餘人。

從上看來，政府將高等教育，和軍事建設相配合，已在嘗試進行，並已動員一萬五千

人左右，至於更進一步之留學深造，亦略有計劃，吾人但期此種企圖之經驗日增。計劃逐漸進步，則科學教育，亦將見樹人之效，為國亦所以為青年，並所以慰國人之期望。

## 五 科學思想

最後作者有不能已於言者，即科學界一燈思想問題，科學家皆熱心愛國之士，惟所研愈專，則學究之氣味愈重，是所謂專才。但專研之後，尤其受十九世紀西洋科學思想之影響，難免有學究氣味，所謂學究氣，即有忽略現實之弊，因忽略現實，則學者和政府社會之間所見略有不同，現實者易於視之過近，而學者易於見之過遠，遠近不銜接。乃有作者所謂隔岸呼喊現象，雙方雖用意相同，而見解分歧。作者之意，吾人總宜以見全局統籌籌劃，集思廣益，交互認識，使齒輪配合，運行而不齟齬，則幸甚矣。

## 十二 抗戰七年來之科學

郝景盛

這是文化先鋒負責人交來的一個難以解答之題目，限五千字交卷，最好不超過八千字，這，將於不善爲文的我，確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第一，科學的內容包羅太廣，上自天文，下至地理山川河海，聲光化電，皆在其研討範圍之內。談到科學之應用，像機械，電工，化工，建築，水利，航空，鑛冶，紡織，醫藥，衛生，以至於林業之建設，農業之進展，等等一切，皆沒有出乎科學領域，我們雖欲盡力將抗戰七年來之我國科學界作一充分的敘述，結果仍是舉一漏萬。第二，在這七年中，我們的科學家們，爲了國家之富強，民族之生存，社會之建設，真是個個都能守着崗位，埋頭苦幹，無論生活環境困苦到何等地步，仍按步就班，在那裏努力工作。所以這七年間的科學進步與貢獻，比起過去三十年來，在質量皆有增無減。第三，因國防上的祕密，交通上的不便，印刷上的困難，我們無

法得到各方面工作者齊全的報告。凡此種種，都是本文寫作上的困難，因此，遺漏或錯誤之處，希望各位讀者原諒與指教。

## 一 七年來應用科學之進步

應用科學包括一切工業之建設，在抗戰七年中，最進步的當推化學工業（參考施在敏之四川化學工業，北大化訊第一期，三十三年三月出版）。茲將應用科學的工業發展，略陳於左：

冶煉工業 這種工業是一切工業的基礎，主要原料，需要煤鐵。誰都知道，大後方鐵礦之貯藏不及東三省，煤炭之蘊蓄不如華北各省，又因煤鐵之產地不在一塊，增加了運輸上的困難，不過因了工業家們七年之努力，已得到了令人滿意之成績，例如在後方各廠裏我們見到的五噸小型煉鐵爐，電爐，塞麥爐，馬丁爐等，製煉大批的鋼鐵。而冶金焦炭的製造成功，幫助了一切輕工業，煉鐵工業，機械工業，電機工業等之發展。最近錫鋼亦有

出品，此外如煉鉛，煉焦，硫磺的廠子亦有設立，以數量計，約佔冶煉總廠數百分之二十。

玻璃工業 因了醫藥衛生，化學試驗等各方面的需要，七年來大後方之玻璃工業頗為發達，昆明，重慶，成都各處，皆有新立之工廠，最著名的如瑞華，義大，長江，科學，中央等廠。瑞華產品，尤為精良，花樣種類亦不少。化學試驗儀器，溫度表，暖水瓶，注射針等，戰前都是來自國外，現在都用國人的手與腦製成了，而且能源源供給。只是玻璃板，光學玻璃等，我們還不能自製，因此筆者曾有光學玻璃廠設立之建議（見文化先鋒一卷七期）。

電工器材工業 這亦是戰爭中新起來的一種極令人注目的工業，最大的廠所為中央電工器材廠，造各種膠木製品，各種膠木粉，雲母板，石棉板，黃臘布，黃臘綢，紙柏，絕緣材料，洋乾漆，電話機，交換機，華業電器廠則出有電解發電機，電焊變壓器，高溫計，各種大小電爐等，在戰前我國的電工業器材十九來自國外，現在呢？電池原料，鋅皮，

錳粉，炭條及鉀鹽等皆能自給。我國電工器材廠計九十八家，其中公營者二十三家，民營者七十五家。中央無線電機廠所製之航空無線電機，經美國駐軍軍隊使用後，已得到好評語。飛機上之通訊設備，亦異於舶來品。北平研究院與中央無線電廠合作所作出的石英振盪片，已獲成功，望能大量供給。其餘如中孚膠木廠亦出有電信電機物品若干，以應社會之需要。

瓷器火磚工業，中央電瓷廠製出的各種高壓電瓷，如各種絕緣子，其品質亦頗優良。天盛陶冶廠之耐酸陶器，解決了好多化學工程方面之問題。中央工業試驗所密萊原料廠試製鉗鍋蒸發皿亦告成功，因後方滑石產量頗豐，所以現有二十家能製造耐火磚。

煉油工業，這亦是值得我們敘述的一種新興工業，最著者為甘肅油礦局，聽說產油在質在量皆甚樂觀。中國機械油廠製造各種機油，如鋼索油，汽缸油，馬達油，齒輪油，擦槍油，錠子油等。至於桐油製成煤油，菜油製成汽油，已成司空見慣之事實，無人再覺驚奇。



液體燃料工業 經濟部礦冶研究所，軍政部汽油廠，把固體的煤炭木炭製成液體燃料，現在試驗雖未十分成功，但成功是必然的。至於木材乾餾，桐油烈化，酒精等工廠，如兩後春筍，應運而生，大有蒸蒸日上之概。此項工業在將來之建國工業方面，最有希望，因我國天然汽油之產量甚少，而且產在與中央相隔遙遠的西北，故欲求自給，非用其他原料製造代液體燃料不可。

電化工業 電解方面有食鹽之電解，金屬元素，如鋅，銅等亦有用電解法得出者。至於煉鋁工業為航空工業之母，用電極多，惟電解用之低壓直流電，尤其直流電機，尚不能自製。我國雖不產天然之冰晶石，但可以用螢石（氧化鋁）製成之人造冰晶石代替。據魏惟誠先生言（見抗戰期間製鋁工作的展望，見北大化訊二期）漸產螢石雖告失陷，但四川及湖南二省還能供應。電熱方面製造品已有電石，炭極石墨，炭化砂。

酸鹼工業 這亦是化學工業之母，但在國營事業中，為最弱的一項。三酸製造關係於整個化學工業之前途。硫酸製造，重慶，成都均有工廠設立製造，江西硫酸廠及雲南磷酸

廠亦有出品。至於鹽酸，用合成法製造成功者已有兩家，新近創設哈力夫斯法，亦已開工，產量尙可觀，只有硝酸工業，仍用土產硝石製造，尙無用固定空氣中之氮以從事大規模之製造者。昆明化工材料廠利用當地芒硝，用魯卜蘭氏法製造酸鹼，每日可出一噸。

氣體工業 氣體液化工業已有瀘州重慶等地製氧，中國煉氣公司製造電石，乙炔，二硫化硫尙在小規模製造中。

機器工業 只渝市機械廠，據翁部長在去年十二月十七日招待記者席上的報告，即有三百六十四家，但其中五十五家歇業，十三家停工，約佔據總數百分之十八。各廠所用的工具機之總數爲三千一百三十五部，屬於歇業及停工者共爲三百六十五，約佔全數百分之五。國營機器廠有六，其中之規模最大者爲中央機器廠，出品頗多，對後方各種輕工業貢獻不小。

製糖工業 據張力田先生之研究，只四川一省，在戰前每年產糖約爲二百餘萬担，民二十九年曾達三百萬担，但後來產量又減少，約一百餘萬担。生產方法皆很古舊，除中國

，華農等糖廠外，其餘數十家皆採用手搖離心機。

**造紙工業** 中央及中元兩紙廠乃後方造紙工業中之規模較大者。道林紙，電報盤紙，雞皮紙，牛皮紙，地圖紙，蠟燭紙，證券紙，鈔票紙，協約紙，捲煙紙，各色各種的紙皆能製造，惟產量太少，是一憾事，其他如銅梁，建國等廠，亦皆能做製洋紙。

**醫藥品製造工業** 麻醉藥品有官廠製造，規模亦大。亞得林，磺胺片之較多生產已獲成功。此外如小蘇達，硼酸，乳酸鈣，阿斯匹靈，葡萄糖，高錳酸鉀等，亦能自製。國產藥材，本極豐富，因時勢所迫，抗戰期中，力求自給，製有大黃精，當歸素，桔梗素，杏仁精，甘草片，桂皮油，薄荷油，海藻精等，為數在百種以上，只重慶一處，已有二十家製藥廠，出品各有不同，惟各家皆不善宣傳，西醫尙少採用，推銷不利，近來有數廠已閉門停製。

**染料工業** 彩色染料，多賴煤膏內提取之蒽基染料，用五倍子亦製出若干鮮色彩料。慶華顏料廠製造硫化青。其餘如鋅白，鉛白，丹黃，羣青，普魯士藍等均能製造，較著之

廠所如建華，同德等。

**酒精工業** 據資源委員會工礦展覽會化工館之統計，後方各省之大小酒精廠，計有二百二十一個單位，其中六十五個分佈在四川，生產量約佔全額三分之二，最著之大廠為資中酒精廠。

**有機藥品工業** 醞之製造，早具規模，現產量更為增加。乙啞已有大量生產，近以磚瓦窯之新設計收集廢氣，對於醋酸，醋酸鹽之生產上亦頗有幫助，丙酮，木醇，草酸，檸檬酸亦均能製造。

**汽油工業** 在後方各省的廠家，大小有九十多個單位，其中有四十八家在四川境內。生產量約佔全額三分之二。重慶動力油廠，為製煉技術成績之最佳者。

談到我國工業的專利品，因為我國科學落後，製造發明，皆不如人，德國專利品約六百餘萬件，美國有二百餘萬件，我國抗戰以來迄今不過五百件，不足德國人的專利品百分之一，而且其中很多所謂專利品，只是一報名一註冊，事實上並未設廠製造。茲據經濟部

公佈國內工業技術及方法，准予專利者有七十七件，其中屬於機械之創製者，有劉克生之五噸小型煉鐵爐，湯仲明之動力機，王景析之輻射式氣缸旋轉壓風機，李耀滋之自動節油器等。屬於化學原料製造者有承紀元之硬脂酸，徐卓卿之氧化銻新型，夏助鐸之鍍化合物新型。王漢曾之用燒碱木屑製造純碱，林一民桐碱製造純碱及松油代柴油，張劍之轉缸式飛機發動機，曾竹儀之照相乾板，袁開基之安息香油。孟心如之硫化棕色染料等。此外因國防科學發明而得獎勵者，為數亦不少。

## 二 七年來理論科學之情形

理論科學為應用科學之基礎，我們看了以上各種工業之發展情形，可以說為中國有史以來空前之盛況，但事實上多系舊法仿製成功的東西，很少為國人發明者，不過這點應用成績，當歸功於抗戰前的幾年理論科學研究進步的結果，否則不會達到目前之境地。

我國科學研究機構，在戰前國立的有中央研究院各所，北平研究院各所，中央工業試

驗所各試驗室，中央農業試驗所各系，皆卓著成績，歷年均有報告（且報告有西文，尤其兩個研究院）。其研究成績，有目共睹，無須筆者多贅。

屬於理論科學之研究貢獻，並不比應用科學方面示弱，在很多科學部門中，尤其地質與生物成績最多，而生物中植物更佔優勢。其他如化學，醫藥，生理，物理等，年年都有若干篇論文發表，在質任量亦頗令人滿意。

茲擇其主要研究貢獻，略舉於次：

天文 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於民國三十年九月二十一日在臨洮觀察日蝕之結果，頗為優良，對天文學貢獻頗大。如臨洮經緯度之確定，見食的時刻，日冕的攝影，日冕的亮度，太陽色球之光譜，由始至終之變化情形，均有記錄。那年筆者適有西北之行，亦有眼福，睹此奇觀。

物理 發明頗多，如吳大猷多元分子振動光譜與結構，馬士俊之原子核及宇宙射線之同子理論，周同慶磁伸縮式自動化記錄迴聲測深儀創製，王恆守浮游選礦劑兩種，北平研

究院物理研究所製造顯微鏡，玻璃水平管，石英振盪片，小照像鏡頭，皆已成功，工作者爲嚴濟慈，錢臨照等。張宗燧之於理論物理，趙廣增之於物質光譜均有研究。

化學 如朱汝華關於分子重排及有機綜合論文，王序胡美之O<sub>2</sub>、 $\alpha$ -氏夾角甲基之製造，士大黃之分析，朱汝華沈澱英之維生素K類化合物之綜合，北平研究院化學研究所製造各種顏料，各種特效西藥，橡膠代替品，化學純藥品等，工作人爲劉爲濟，張漢良，白金博，胡美等。

數學 蘇步青之曲線影射，鍾明來對於幾率論與數論之貢獻，周鴻經之數學論文，祁開智之可積向量函數之幾何特性，徐燮之超越半球等。

地質 抗戰以來地質界學者之工作已偏重礦產，但理論研究方面亦有相當成績，如李四光之南嶺東段地質構造，李善邦之地球旋轉對於大地構造之效果，張文佑之岷崙關花園岩之構造，葉連俊之燧石之成因及其生成環境，李悅言之五通橋黑鹽之勘查及發見，李廣遠之中國鉛鐵，丁毅之四川綦江鐵礦之新觀察，馮景蘭之川康滇銅鐵記要，熊功卿之江西

礦產分析。

古生物 馬廷英有以珊瑚層之生長斷定古代氣候，孫雲鑄有古代地層之劃分。

植物 方文培之峨眉植物圖誌，中國城樹科專誌，郭質良的纖維廢物的發酵利用，施有光之糖化酵母菌，汪發績亞洲蘭科植物之研究，饒欽止藻類之新科新屬，施履吉之於染色粒，湯玉璋之三酸對於植物生長，錢崇澍之櫛寄生科之新屬，高尚蔭之荇子根瘤菌，劉慎謬之雲南植物地理，孔憲武之蘭州植物誌，俞季川之雲南經濟植物，筆者之中國柳屬專誌，中國裸子植物誌亦可居一末位。

醫藥 沈壽春，數種藥品對於腎上腺素之影響，顧學裘之藥劑學，生藥學，平院藥物研究所對於麻黃，延胡索，貝母，三七等有效成分之提取，有效素質之生理作用，以至於麻黃精，止血素，大楓子油露，維他命乙等皆有研究。此外經利彬，石原皋對於國產藥材之藥理研究，亦有若干論文發表。

動物 盧于道之腦的研究，劉建康淡水魚之試養，施白南四川魚類之研究，薛芬之鰱



魚鱗魚之統計研究，朱生葆白鴿腎上腺素之研究，張爾玉，成慶泰等之雲南蛇類，洱海動物，淡水魚在空氣中之抵抗力，滇池食用螺類，雲南淡水產名貴魚類等，均有專著。

國防科學 林文彬的舊橡皮之復原，李運華之合成橡皮，劉鋼之鐵路機車鋼胎之製造，彭光欽之汞素提取，張永惠之防火塗料。

農業 在研究方面，很顯然的，較戰前大為進步。農林部出版之全國農林試驗報告輯要，已出了二卷若干期，每期皆介紹數十種研究論文。中華農學會之會報已出至一百七十六期，每期中皆有若干有價值之論文，在此不能列舉。

林業 研究論文多見於中華林學會出版之林學，抗戰期中，出版了四期。林業在抗戰期中亦比較戰前進步，至少在研究論文之表現上是如此。其餘地方性刊物及機關工作報告亦不少。

去年七月間六個學術團體在北碚開年會，各團體皆宣讀了論文若干篇，印有論文目錄，茲不再舉。

### 三 我國科學界目前之危機與今後應走之途徑

(一) 理論科學與應用科學當大家攜起手來。理論科學常為應用科學之母，它不能發展，不能有所建樹，應用科學只有在人家後邊追，不會產生特殊的發明，而與科學發達的國家並駕齊驅。我們上邊所述的一點科學之應用，以歐美的工業眼光看，十之八九皆係做造成功，並非百尺竿頭的登峯極造。抗戰軍興以來，政府對應用科學不惜用大量金錢，增添若干新機關，這是我們快慰的，不過對於理論科學之研究機關，只是維持現況，上自獨立之研究院，下至各大學之研究院與研究所，多是經濟困難，不能發展，這又是我們引以為憾的。因為結果使一般大學生走入急功近利之途。去年中央大學投考學生計五千九百四十七人，投考工學院者一千八百六十四人，佔百分之三十一，法學院佔百分之二十五，師範與農二院約各佔百分之十二，文學院亦約百分之十，只有醫理二院各佔百分之五，這對國家將來之建設，不無關係。因為我們在十年建國的過程中，需要農工醫等的中上級幹部

人才約二百五十萬，但是這些人才之培成，最初都要有理論科學之基礎。現在運用科學的一些成績，大家不要忘了，是過去理論科學教育的結果。問問各工業部門的負責人，那個沒有受過純理論科學的洗禮？

即以筆者個人來說，我是學植物與森林的，前者是自然科學，後者是應用科學。例如國產藥用植物種類非常繁多，但以現代眼光看，由植物原料到把病人醫好，中間要經過生藥學家，製藥學家，配藥學家，病理家，藥理家，醫生等七個不同的專門人才研究之後，才能進到病者之口。但是在我國這一串專門人才根本為數甚少，而且彼此不能攜手，一方是各藥廠的出品不能推銷，一方是西藥大感缺乏，再則森林由荒山造林起，到木屑樹枝製成衣服，汽油，糖類等止，中間亦要經過若干人之手與腦。就是森林學家與化學工業家共同的責任，而且化學專家們還要多負點責任呢。

(二)國防第一，需要科學，而民衆日常生活的改善上，亦不能離開科學。前方衝鋒陷陣的坦克車與後方田間耕地的拖拉機，在國家立場上看，有同等的重要性。美國一百人

中平均只有十個農夫，生產之糧食還有富裕；我們呢？百人中有八十個是農夫，一年到頭勤勞工作，豐年不過一飽，荒年則不免於飢餓死亡，這完全是科學落後之故，比如近幾天，我房後山坡上一塊稻田無水，三四個農人，每日黎明即開始用籠子或水車向上打水，一直工作了三四天，才能插上秧。假使有抽水機，亦不過是很短時間的工作。羅家倫先生說得好：「民族要生存，生存要生產，生產要機械，機械要科學，這個連環誰也扯不斷的」（見星期評論第一期）。若只科學自科學，讓我們的老百姓仍是自生自滅，雖有新式武器，恐利用起來亦成問題。

（三）要從中小學着手，普遍的推廣科學知識，使一般人的科學水準提高，科學才能進步。筆者嘗與朋友們談到，一個中國大學國學系畢業的學生，他的國學知識，可以相當於一個英國大學生的英文程度。若是一個化學系畢業的學生，或是一個機械系畢業的學生，他的知識程度與工廠經驗恐就不能與外國一個相同科系的大學生相比了。這一點是事實，我們不是自卑。俗云：「水漲船高」，這是一定的，一般人的科學知識增高，我們的科

學研究與發明，定千百倍於今日。

(四)科學論文之寫作，需要絕對的忠實。中國雖則已有五千年之歷史，但我們在歷史上找不到什麼真正的科學教訓，如公輸子之木鸞究如何製造？諸葛亮之木牛流馬到底怎樣製的？書上都沒有按科學方法寫給我們，我們只有空歎賞他們的聰慧，而不能去再造或繼續改良。讀今人科學文章，洋洋灑灑，頭頭是道，但對於何者是著者之獨創，何者是抄襲他人之言，亦往往馬馬虎虎，令人分辨不出。科學的文章，最忌亂七八糟，引證不確切，使讀者對於所寫之某問題發生興趣時，想進一步深追，而感無從去查起。關於此點，筆者曾貢獻過一點意見（見星期評論第三十二期）。

我主張科學文章，不在長短，在言之有物，在引證確切，在有自己的一點研究結果。科學與文學大不相同，科學是物質的，文學是精神的，科學之研究結果是必然的，甲研究的結果，乙若以相同的環境去研究，則結果亦必同，不如此，即非科學。文學呢，則不然，一個命題，十個人來寫，結果是十篇完全不同的文章。所以科學要真實，作起來真實，

寫起來亦要真實。

(五)我們要急起直追，迎頭趕上。抗戰前我國理論科學已有進步，戰後應用科學亦蓬勃向上，但是我們不能引為滿足，若與那些科學發達的國家比起來，實實在在還相差太遠。因為我們的工業正在萌芽，各工廠的製造品，在質在量遠都趕不上舶來品，而且有時成本比外國來的還要高。不過為國家建設前途計，為國家科學發達富強計，不管它質量好壞，不管它價錢高低，政府當賠本去作，民衆當採用自己的出品。因為七年來我們用血換來的國際地位提高，與英美蘇各盟國立在一條戰線上，眼看勝利在望。可是勝利以後我們更應當上下如何努力來建設一個科學化的新中國，才能迎頭趕上我們盟國的科學呢！

中華民國五拾零年八月十日

贈

蔣夢麟先生遺書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滬初版

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  
文化運動叢書第八種

中國戰時學術

全一冊 定價國幣三元

(外埠酌加運費國費)

著  
作  
者

謝幼偉 程仰之 陳獨行  
王平陵 陳盛清 蕭孝鑾  
瞿菊農 夏炎德 盧于道  
孫本文 徐文珊 郝景盛

發  
行  
人

吳 乘 常

印  
刷  
所

正 中 書 局

發  
行  
所

正 中 書 局

(2095)

著者 孫本文等編 書碼 128.5  
Author Call No. 8346  
書名 中國戰時學術  
Title

登錄號碼 123025  
Accession No.

月日 Date	借閱者 Borrower's Name	月日 Date	借閱者 Borrower's Name

國立中央圖書館

書碼 128.5  
8346

登錄號碼  
123025



國家圖書館



000123025



籍

1.00.

058